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此岸到彼岸～

從中小企業產業外移，看頭家娘角色轉變

From here to there～

the changing roles of "Boss's Wife" in relocated

Small-Medium enterprise

指導教授：夏曉鵬博士

研究生：邱玉珍

2002.12.23

目 錄

謝誌	1
寫在論文之前	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背景	7
一、緣起	7
二、研究背景	8
三、「頭家娘」興起背景	9
四、頭家娘的多重角色	10
五、研究目的	13
第二節 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	14
一、傳統女性地位 v.s 工業化女性角色	15
二、不同女性主義的觀點	17
三、婦女與階級流動	19
第三節 分析架構	21
第二章 研究方法	23
第一節 研究方法	23
一、名詞界定	23
二、研究場域	23

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限制	26
一、研究過程	26
二、研究限制	28

第三章 緣起_爲何前往大陸打拚	30
第一節 中小企業的協力網絡—羊群效應	34
第二節 生產成本降低	37
一、勞力便宜，要多少就有多少	37
二、廠房租金	39
第三節 小結	40
第四章 頭家娘角色轉換	41
第一節 移居頭家娘的角色轉變	42
一、每天不用再像陀螺一樣打轉	42
二、公司由「人治」管理走向「制度」化	43

三、頭家娘的煩惱	46
四、移居「頭家娘」仍掌握財務大權	50
第二節 分偶頭家娘的角色轉換	52
一、爲什麼留在台灣	52
二、杯酒釋兵權	54
第三節 小結	56
第五章 生活起了什麼變化？	58
第一節 移居頭家娘的生活變化	60
一、家務勞動有人代勞	60
二、生活苦悶	62
三、移居頭家娘精神壓力	64
第二節 女人撐起半邊天	66
一、頭家娘爲打發時間，學習才藝	66
二、扮演親善大使	69
三、解決分偶家庭問題	70
第三節 隱憂	72

一、移居頭娘的憂慮	73
二、分偶頭家娘的憂慮	75
第四章 小結	78
第六章 我在研究裡發現了什麼？	80

【參考文獻】	85
【附錄一】	91
【附錄二】	92
【附錄二之一】	93
【附錄三】	94
【附錄四】	95
【附錄五】	96
【附錄六】	98
【附錄七】	99

謝 誌

人生總是充滿一連串的意外及驚嘆。能夠繼續升學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意外；當記者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個意外；唸研究所則是我人生中的第三個意外。而我人生的第一個驚嘆號，則是八十八年自立早報停刊；人生中的第二個驚嘆號，是九十一年勁報停刊；人生中的第三個驚嘆號，則是完成論文。

打從意外進入社發所後，我就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能夠順利畢業。當初想唸社發所是想以不同視野、角度觀察社會現象，有助於自己日後在看新聞角度上的面相能更廣；進入社發所唸了之後，我覺得苦不堪言，因為所有的理論教材內容對我來說，就像剛開始學習英文一樣，分開來看得懂，合起來就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腦中總是呈現一塊塊的拼圖，但又找不出合適的位置拼出一幅完整的圖像。

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唸書的料，尤其當我在課堂上聽到老師們對於社會現象總能馬上口若懸河說出問題根源時，更讓我沮喪，總覺得為什麼我唸的書無法像老師一樣消化成自己的話說出來。因此，我開始懷疑唸社發所的目的及意義在哪裡，這張文憑對我有什麼意義，這兩年來我一直在想這些問題，也不斷地在思考朋友問我的問題：「為什麼要唸社發所？畢業後妳可以找哪方面的工作？」

說實在，這兩年多來，我一直沒有想出個答案。完成論文也只是因為失業爲了給自己一個交代而寫。但當我在撰寫這本論文時，腦海中一直憶起年少的生活經驗，記憶不斷地將過去的生活點滴淘出來，輪廓愈來愈清晰，我突然像被電擊到一樣，終於明白唸社發所的意義在哪裡了。我在「頭家娘」這本論文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是我唸社發所最大的收穫，當然還有很多收穫在此無法一一詳述。

在此我想與所上老師們分享一件事，也是讓我覺得唸社發所最大的收穫。有一天，我與一位朋友在談論現在媒體角色問題，我說我總覺得媒體記者似乎已被公關所操控，公關知道怎樣的新聞記者會寫，怎樣的新聞記者不會寫，也懂得如何讓自己的新聞見報。從事新聞工作這麼久以來，雖然我們都知道新聞議題是被創造出來的，也是可以被炒作的，但從沒有人去省思這個問題。當我把我的想法及觀點告訴這位朋友時，我的朋友覺得驚訝我能從大的面相去探索這個議題，我告訴她，這是唸兩年社發所給我的啓發。

我不知道我的觀點及想法在這朋友身上能激起多少漣漪，但我覺得透過我與她的對談，她看到我的改變，她也開始省思自己的角色，也開始質疑一些東西。我可以用不同的視野觀看事情，這些都要感謝前所長露茜、信行、益仁、志弘及曉鵬等所上老師們，對我這種「差強人意」的學生的指導。尤其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曉鵬，對我這種「資質駑鈍」學生總是很有耐心地引導，並逐字逐句地幫我修改論文，讓我得以順利通過口試；我還要告訴曉鵬老師一句話，妳對於弱勢族群的付出讓我很感動，我常在想，為什麼妳可以為他們做這些努力及付出，而我不行，我與妳的差別在哪裡？我現在可以告訴妳答案，我想我還是無法擺脫資本物質的誘惑。

另一位要感謝的人是政大勞研所所長劉梅君老師，劉老師不認識我，也沒看過我的論文計畫書，當我向她提出請她擔任我的口試委員時，她一口就答應了。原先我以為劉老師不會答應我，當她答應我時一則喜一則憂；喜的是劉老師願意擔任我的口試委員，憂的是聽聞劉老師很嚴格，我很擔心自己被批得滿頭包，也害怕丟曉鵬老師的臉。幸好，劉老師手下留情，讓我得以順利拿到學位，在此我要跟劉老師說一聲「謝謝」，還好妳沒有要求先看論文計畫，不然妳可能不會答應擔任我的口試委員。

感謝老師外，還要感謝幫助我完成論文遠在東莞的「頭家娘」們，如果沒有妳們的幫忙，我無法完成這本論文。尤其是古香園的老闆吳宜璇小姐，如果不是她熱心接待我，我可能無法順利到大陸進行訪談，真的很謝謝妳。另外，還要謝謝一些關心我、幫助我及鼓勵我的朋友。在撰寫論文時，剛好我失業有一段時間，而前往大陸進行田野需要一筆經費，我怕往後的生活費沒著落，正在煩惱到底該不該為了一本論本花錢遠渡大陸進行田野時，幸好守得伸出援手幫我渡過難關，如果沒有他的支持，這本論文可能會難產。

當然還要謝謝黛嫻、雅君、淑楓等在精神上給予的鼓勵，尤其是雅君及黛嫻經常被我騷擾，聽我訴苦。更要謝謝一群好友的關心與加油打氣，雖然在過去及唸社發所這兩年多來，在我生命成長過程中，充滿挑戰與艱辛，但我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幸運，因為妳們總會在我艱困的時候適時伸出援手幫助我，給我鼓勵打氣，當我的心情垃圾筒。我不善表達自己的感情，現在，我想透過這本論文謝誌告訴你們，謝謝你們陪我走過生命中的每一段歷程，分享我的喜怒哀樂，你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最後，我要告訴雅君及淑楓妳們不用太擔心，我可以完成論文妳們也可以。在妳們撰寫論文時，我非常樂意當你們的心情垃圾筒。

寫在論文之前

前陣子，「專櫃小姐變總裁夫人」的新聞羨煞不少女孩子。很多女孩子在年輕的時候，也曾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從麻雀變鳳凰，當然包括我在內也曾有這個想法。從高中時候開始，我就常夢想自己有一天能飛上枝頭，擺脫勞工階級，往中上階級流動。會讓我有這種想法，與個人的成長背景有關。

來自於屏東農村鄉下的我，父母親以務農及幫人家蓋房子養活一家七口。在童年的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到哪裡玩，而是到田裡割草、插秧，或是充當父親的「小工人」搬運磚頭、砂石。記得小時候，當看到同年齡的玩伴騎著腳踏車玩耍時，在內心總是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無憂無慮過著快樂的童年？」

印象中，童年裡我並沒有暑假、寒假，即使有也必須到市場賣菜。我第一次賺錢是從國中一年級開始，每年寒暑假不是到皮包工廠就是到食品加工廠打工賺學費及零用錢；升上高中後，雖然不用再到工廠打工，每天下課後，不像其他同學回家看電視、休息，而是到菜市場買菜煮晚餐，等候爸媽回家吃飯。所以小時候，我總是很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可以像姐姐一樣離開家到外面賺錢，這樣就不會有做完的家事與農事。

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境及父母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我無法再繼續唸書；便與其他同年齡的女孩一樣，到電子工廠工作，雖然工作固定安穩，但乏味無趣。工作一年後，我實在受不了工廠機械式的工作，我想再繼續升學，幾次與家人溝通，得到的答案是：「繳不起學費，想唸書自己想辦法。」對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孩來說，一個月薪水扣除給父母所剩不多，怎可能自己繳學費唸書，況且還要生活費。

三番兩次被父母打回票後，我已經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念頭。記得有一天在工廠裡，我正在工作，收音機正在播放節目，節目主持人說了一段話：「人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個地方，必須讓自己不停的轉動、學習，才有成長的空間。趁著年輕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的夢想，即使頭破血流也無所謂，畢竟你曾嚐試過。」這句話深深打入我心坎裡，當下決定要再給自己一次唸書的機會。

我決定再唸書時，距離高中畢業已有四年，教材改變了不少。於是我花半年的時間準備，在準備期間，白天上班，晚上到補習班補習。也許是上天眷顧我，讓我考上了世新大學編採科，從此告別了女工的生活。畢業後，進入新聞圈工作，由於我的年齡比一起跑新聞的同業還大，常常有同業問到「之前妳是在哪裡工作？為什麼現在才進入新聞圈？」

對於這樣的提問，我總是含糊帶過，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曾經是個「女工」。因為我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或許應該說：「我自己在身份轉變時，爲了突顯自己與『女工』是不同的，所以刻意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並與『女工』行業劃清界線。」這個祕密一直在筆者心中隱藏了十幾年，直到我在撰寫本「頭家娘」論文時，猛然發現，竟能在她們身上找到自己心結的影子，對自我身份有了認同，對自己的過去，開始釋懷。

嫁個老闆老公，當個「頭家娘」，是很多農村父母對女兒的期望，他們認爲，這是女人擺脫農村勞工階級的唯一途徑。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想法，誠如首段所述，我與許多農村少女一樣，也做過這樣的夢，盼能當個「頭家娘」，藉婚姻讓自己的階級往上流動，雖然，我最後是以「教育」的方式達到目的，但也不斷思索，對選擇婚姻的農村少女而言，當上了「頭家娘」，美夢是否與自己的想像一樣？這也是我選擇「頭家娘」作爲本論文研究對象的原因。

在台灣「頭家娘」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名詞，街頭巷尾幾乎都可以聽到有人叫「頭家娘」，如麵店、服飾店、水電行等行業老板的太太都被稱之爲頭家娘。相對地，在強調個人自主意識的歐美社會，「老闆娘」是個連在字典上都找不到的字眼(高承恕，1999)。相對於我國這種「無怨無悔、以夫爲貴」的老闆娘精神，歐美的女性恐怕很難想像如此的思想與行爲(卓越雜誌，1996)。

其實，在西方也有所謂頭家的太太，但這些老闆的另一半大都沒有參與先生企業事業的經營，其意義也僅止於「太太」的角色，而不是我們所講述的「頭家娘」(高承恕，1999)。而本論文所指的「頭家娘」是指中小企業主的另一半，她們同時兼顧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與一般勞工階級婦女一樣，除要兼顧家務、養兒育女等職務外，還要直接參與勞動，但她所扮演的生產角色又與勞工階級婦女扮演「生產」角色不同，還要扮演老闆與員工之間的橋樑、公司總管、掌管公司財務等職務，而當公司趕貨缺工人時，還得捲起衣袖充當臨時工。

爲了企業的生存她們必須扮演「校長兼撞鐘」、「打雜」等多重角色。她們如此甘心情願無非是有一天事業做起來之後，自己也能享福。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書中提到，頭家娘的角色位置會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而有所改變。近幾年來，國內經濟環境受到整體環境變動的影響，一些依靠廉價勞力生存的傳統中小企業無法在台灣生存，必須將產業移往大陸；可以想見，過去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及家庭場域的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也將面臨改變，而這正是本研究的關注所在。

要探討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外移而產生質變，必須先要了解頭家娘的興起背景；而頭家娘的興起必須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面來看。1960年代後期以來，台灣一直扮演著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代工生產製造基地的角色。早期由於缺乏資本、技術與國際市場的掌握，台灣產業是以 OEM 的方式生產外銷(陳介玄，1998；周添城、林志誠，1999；谷浦孝雄，1992)。這種零細化的產業結構帶來了「黑手變頭家」的機會，也使得勞動者自行創業的「業」有多樣性(謝國雄，1989)。

也正因爲在國際分工下的 OEM 生產方式，不需要太大的資本、太高的技術、太多的管理及眾多的行銷人員，每個人都有自立門戶的機會，這也是中小型企業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原因，而「頭家娘」的稱呼也在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頭家娘可以說是台灣工業化的產物。但頭家娘的角色位置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動，在工業化之前，頭家娘只是代表照管家務，並未創造出屬於自己事業的一片天。從農業社會轉型爲工商社會之後，「頭家娘」才具有意義(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李端悅和柯志明，1994)。

60 年代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從 70 年代開始，由於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環境的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條件的轉換，原作為國際分工下的代工製造已愈來愈難立足生存，中小企業正面臨著空前的鉅變(高承恕，1999)。中小型企業不得不轉型或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大陸等地區爲產業找尋生機。國內相關論述指出，中小企業草創期頭家娘佔有一定的位置，但隨著企業的發展、轉型，頭家娘不能再扮演大小事一把抓的「打雜」角色，必須專職於企業某個部門(李端悅和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暇 1997、2001)。

在中小型企業裡，頭家娘雖具不可取代性，但當中小型企業轉型時其角色也將產生變化，可能退居家庭相夫教子，或是不再參與直接勞動，只扮演管理者(manager)的角色(李端悅和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暇 2001)。由於過去探討頭家娘角色的經驗都侷限於台灣，但當產業外移後，因爲土地、勞力成本的降低，工廠規模勢必比台灣大，而企業組織規模的變大，頭家娘的角色一定會產生變化。

在台灣有關頭家娘的相關論述中指出，「頭家」在創業期是缺少不了「頭家娘」的，因為她可以隨時充當補充勞力。產業移外大陸之後，頭家娘是否會因企業組織的改變，無法進入企業經營的場域；而在時空隔離下，頭家娘原本的社會網絡也因此而斷裂，頭家娘是否因為這些因素也無法在企業裡發揮她的功能。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本論文主要是在探討在資本國際化下，頭家娘在企業裡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的外移而產生變化，而頭家娘隨資本移至大陸，其在家庭事業中角色地位將產生什麼變化？再進一步分析其在大陸的生活處境及社會流動是否有向上流動，而父權體制又如何壓迫這些握有經濟支配權的頭家娘。這些改變代表著她地位的上升還是下降，將在本論文後面幾個章節陳述。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架構

一、緣起

本論文研究計畫，源起於一份「性別與發展」課程的期末報告，筆者在收集資料與初步與前往大陸投資的頭家娘(老板娘)接觸訪談過程中，得知平日穿著光鮮亮麗的老板娘，事實上卻比一般家庭主婦、職業婦女承擔更多的責任與工作。在國內諸多相關研究中指出，當產官學界肯定中小企業為台灣締造舉世稱羨的經濟成就時，把所有的功勞歸功於精明勤奮的老闆，卻忽略了老闆娘在此成就背後的辛勞。

這令筆者想起好友的親身經驗。在傳統價值觀裡，女性最好的八字是擁有美好的歸宿，如果能嫁給一位做生意(指小商品生產)的男性，就表示自己脫離勞工階級，不用再過著「吃人頭路」的日子。筆者國小一位同學因為嫁給開小型模具廠的老板，而成為左鄰右舍談論的話題，婚後這位朋友每逢過年過節回家時總是穿得很體面，而且還開進口車，煞羨不少未婚女性。

有一次筆者剛好回南部到她家坐坐，一進去她家，映入筆者眼簾的是：一個身材驕小的女性，正在做連男性都覺得吃力的模具塑形工作，而且是在鐵皮屋下需忍受高溫的烘烤，只見她汗如雨下。看到筆者的到訪，朋友立即放下手邊的工作，倒了杯水給我喝不好意思地說：「明天剛好有一批貨要出，人手不夠必須幫忙，所以無法陪我。」當時我問她，自己當老闆這麼辛苦，又賺不了什麼錢，為什不把工廠收起來，吃人頭路呷輕鬆。

當時她回答筆者：「剛開始創業本來就比較辛苦，這麼辛苦無非是希望有一天先生能爭氣，等事業成長、有錢有閒了以後，就可以喘一口氣，那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從筆者朋友的心聲，對應於李悅端和柯志明(1993)、高承恕(1999)、趙蕙玲(2000)、呂玉暇(2001)等對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很多中小型企業的頭家娘在參與中小企業勞動時，除非是以女性技術為主的行業類別，不然通常不在乎先生從事的行業和自己原來的學識經驗是否符合，凡事以先生為優先，而自己則是從頭學習摸索。

國內很多如鋼構、燈管、自行車加工、模具加工、飾品、五金製品、鋼板、化學原料製品、熱熔膠等傳統產業裡的頭家娘，就是屬於此類型：婚後，爲了與先生一起打拚事業，常犧牲自己原有的專才，而從事從未接觸過的產業。而這些爲協助先生創業而犧牲自己專才的頭家娘，其在企業裡所扮演的角色位置，卻常爲一般人所忽略。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一書中對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有深刻的描述，書中指出，頭家娘穿梭於家庭與企業之間，從母親、妻子，到打雜、主管，因應環境的需要，扮演著彈性與多重的角色。

人人稱羨的「頭家娘」並非如外界想像，每天穿著光鮮亮麗、開著車、與朋友喝下午茶，她們爲了企業的生存必須扮演「校長兼撞鐘」、「打雜」等多重角色。她們如此甘心情願無非是有一天事業做起來之後，自己也能享福。「老闆娘絕不是老闆的附屬，也不是企業主的影子，她是幕後的得力伙伴。」(卓越雜誌，1996，頁 40-49)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在企業裡絕對有她的位置，她的功能在中小企業裡具有不可取代性(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

二、研究背景

在台灣「頭家娘」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名詞，街頭巷尾幾乎都可以聽到有人叫「頭家娘」，如麵店、服飾店、水電行等行業老板的太太都被稱之爲頭家娘。相對地，在強調個人自主意識的歐美社會，「老闆娘」是個連在字典上都找不到的字眼(高承恕，1999)。相對於我國這種「無怨無悔、以夫爲貴」的老闆娘精神，歐美的女性恐怕很難想像如此的思想與行爲(卓越雜誌，1996)。

其實，在西方也有所謂頭家的太太，但這些老闆的另一半大都沒有參與先生企業事業的經營，其意義也僅止於「太太」的角色，而不是我們所講述的「頭家娘」(高承恕，1999)。而本論文所指的「頭家娘」是指中小企業主的另一半，她們同時兼顧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頭家娘的存在是因爲她的丈夫是企業主，而且同時跨越經濟場域與家庭場域的行動者，她的角色至少包括妻子、母親、媳婦與頭家娘，而且這些角色同時匯集於同一個場域(趙蕙玲，2000)。

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書中提到，頭家娘的角色位置會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而有所改變。近幾年來，國內經濟環境受到整體環境變動的影響，一些依靠廉價勞力生存的傳統中小企業無法在台灣生存，必須將產業移往大陸；可以想見，過去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及家庭場域的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也將面臨改變，而這正是本研究的關注所在。

三、「頭家娘」興起背景

要探討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外移而產生質變，必須先要了解頭家娘的興起背景；而頭家娘的興起必須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面來看。1960年代後期以來，台灣一直扮演著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代工生產製造基地的角色。早期由於缺乏資本、技術與國際市場的掌握，台灣產業是以 OEM 的方式生產外銷(陳介玄，1998；周添城、林志誠，1999；谷浦孝雄，1992)。此類產品的生產與行銷固然可以透過韓國式的大公司來經營，但也可經由台灣式的中小企業及其聯繫起來的協力網絡¹完成。

這種零細化的產業結構帶來了「黑手變頭家」的機會，也使得勞動者自行創業的「業」有多樣性(謝國雄，1989)。也正因為在國際分工下的 OEM 生產方式，不需要太大的資本、太高的技術、太多的管理及眾多的行銷人員，每個人都有自立門戶的機會，這也是中小型企業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原因，而「頭家娘」的稱呼也在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頭家娘可以說是台灣工業化的產物。也就是說，頭家娘是台灣近三十年來，特定的歷史背景、制度環境、文化心態共同形塑的現象(高承恕，1999)。但隨著經濟發展頭家娘的角色位置也會產生變化，工業化之前，頭家娘只是代表照管家務，並未創造出屬於自己事業的一片天。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之後，「頭家娘」才具有意義(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李端悅和柯志明，1994)。

60年代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從70年代開始，由於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環境的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條件的轉換，原作為國際分工下的代工製造已愈來愈難立足生存，中小企業正面臨著空前的鉅變(高承恕，1999)。中小型企業不得不轉型或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大陸等地區為產業找尋生機。台灣產業外移最早可溯自70年代中期以後，在傳統的國際市場上因受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產品競爭威脅日增，不利於台灣製造業產品擴大出口；另一方面台灣地區投資環境改變、勞力短缺、勞工成本及地價大幅上漲等問題，不利於傳統的勞力密集加工產業在台灣發展(高長，2002)。

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中小企業從70年代中期開始前往大陸投資，但真正大批投資熱潮則是自80年代政府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之後，到了90年代更是達到高峰；前往投資的產業起初以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為主，近幾年來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軸。依據投資中國雜誌最新調查發現，自1991年至2001年年底，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總家數為62,351家，台商投資總額高達1394.13億美元(網路，

¹所謂的「協力網絡」生產方式是指將生產流程中不同部分、不同步驟交由無數的小工廠來達成，然後再由接單的母公司組合出貨，直接或間接地行銷於國際市場(陳介玄，1998)。

2002)；投資產業別以中小型企業中的鞋類、成衣、塑膠產品、玩具、皮包、製傘和機件零組件等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為主(林美霞, 2002)。投資的地點則集中於華南地區一帶，包括福建、廣東、海南地區為主，至 2001 年底單單廣東省的台商家數即高達 14,136 家(網路, 2002)(見附件一)。

從上述統計數字發現，過去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為求生存紛紛將產業移往大陸發展，尤其是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更是把大陸視為最佳的人力供給站。雖然台灣中小型企業內主要成員絕大都是家族成員所組織，但這種以家戶為主的經濟體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展，其成員在組織內的角色位置也將產生變化，而原本在家戶企業組織裡擔任重要角色位置的「頭家娘」的角色也將產生質變。

四、頭家娘的多重角色

如前所述，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必須同時扮演生產與再生產角色，與一般勞工階級婦女一樣，除要兼顧家務、養兒育女等職務外，還要直接參與勞動，但她所扮演的生產角色又與勞工階級婦女扮演「生產」角色不同，還要扮演老闆與員工之間的橋樑、公司總管、掌管公司財務等職務，而當公司趕貨缺工人時，還得捲起衣袖充當臨時工。也就是說，頭家娘必須扮演著廉價勞工、無酬家屬工作者，和無酬家事勞重者的多重角色(成露茜和熊秉純, 1993)。在中小企業裡身兼多重角色的頭家娘，在馬克思的階級論中為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ie*)²，雖然握有生產工具，但隨時仍須充當臨時的補充人力。

²馬克斯的階級觀中，強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方式創造了資本家及勞動者兩大階級。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下，大資本家資本累積的結果，創造了壟斷性的資本。小規模資本的生產方式較無法與大資本規模生產方式競爭，故小規模生產的活動及其資本累積創造出來的階級關係，較被馬克斯的階級所忽略。

馬克斯學派的學者 Wright and Perrone(1977)後來將生產組織的擁有權與經營權，及資本主義簡單商品生產方式均考量進階級關係的測驗上。而小資產階級的定義是具有生產工具，沒有購買他人勞力、沒有控制他人勞力，也沒有出售自己的勞力。Wright(1977)對小資產階級的定義是強調這批人的生產方式及所擁有的生產工具，祇能生產簡單的商品，小資產階級多半是自己為自己雇用少數人，也能累積一些剩餘價值(Scase 1982, 引自熊瑞梅、黃毅志, 1992)。

Poulantzas(1975)更認為小資產階級是生產工具的擁有者，也有分配資源的自主性，但擁有較少的勞動控制力。

在台灣處理階級結構大都採用 Wright 的定義(許嘉猷, 1987, 1990)。小資產階級是居於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階級，在日本及台灣存在相當多，祇是西方經驗未凸顯此階級的特殊性。

Bechhofer(1982)認為小資產階級始終存在，是因為此階級展現了某種意識型態功能(*ideological function*)。小資產階級因自己是老板，故具有獨立及自主權的特質，同時，小資產階級為了自己小小的事業，必須更加倍努力工作，成為創造加倍生產力的勞動者，如此才能掌握自身向上流動的機會。可見小資產階級獨立、勤奮的意識型態，壓制了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生存機會差距，增加了社會流動的空間，因此也使得社會機會的分佈較公平合理些，故小資產階級存在於社會階級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熊瑞梅、黃毅志, 1992, 頁 2)。

國內相關論述指出，中小企業草創期頭家娘佔有一定的位置，但隨著企業的發展、轉型，頭家娘不能再扮演大小事一把抓的「打雜」角色，必須專職於企業某個部門(李悅端和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暇 1997、2001)。而穩健發展的中小企業老板娘，若沒有婚姻問題，那麼她們有錢、有閒也有實權，可以充分享受多年來辛勤的果實。但公司如果要再進一步擴充，老板娘的角色定位就必須有所調適。「因為企業壯大後，高學歷人才或專業經理人進來，他們有最新的管理知識，更襯得本來缺乏專業背景的老板娘，在員工眼裡顯得落伍。」(光華雜誌，1994，頁 46)

在中小型企業裡，頭家娘雖具不可取代性，但當中小型企業轉型時其角色也將產生變化，可能退居家庭相夫教子，或是不再參與直接勞動，只扮演管理者(manager)的角色(李悅端和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暇 2001)。呂玉暇(1996b)針對台灣 54 個小型家庭企業的研究中也發現，隨著家庭企業規模擴大後，妻子由實際參與勞動過程轉為行政管理或監督，有些家庭企業制度化發展後，廠務及業務部門都有專人負責，頭家娘仍須看頭看尾及掌管財務(呂玉暇，1997)。

顯見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地位在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變化，不管變化如何，她一直是家庭事業中不可或缺的。Greenhaph(1991)針對六個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發現，

女性在非正式部門的工作並未提高其家庭或社會地位，因為隨著家庭企業的發展及規模的擴大，妻子的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提高，反而退出家庭企業返回家庭，因為家庭企業有能力雇人取代妻子的勞力，而妻子由於以家務角色為主的性別角色規範亦使她不願繼續留在家庭事業中工作，因此妻子的地位隨著家庭事業的擴張而漸漸不重要(引自呂玉暇，1997)。

Greenhaph 研究中所指的非正式部門工作女性應是指中小企業頭家娘，因為她們雖然工作辛苦，但因沒有領薪水，所以其勞務常不列入計算，屬於非正式部門。Greenhaph 把中小企業的另一半歸類為非正式部門的一員，他認為這些女性當企業壯大時，反而會退居企業返回家庭擔任賢妻良母的角色。但事實並不一定如此，在高承恕(1999)及呂玉暇(2001)的研究中提到，頭家娘在企業組織裡的位置不一定會隨著企業擴大、轉型而產生變化，這得看頭家娘所採取的是哪一種制度。

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一書中指出，企業壯大後，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所扮演的角色位置視她自己本身採行「家計邏輯」(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彼此間的信賴)，還是「事業邏輯」。如果頭家娘採取家計邏輯，其角色並不會因為企業的發展而產生質變；反之，如果頭家娘轉變自身的行動邏輯，切實納入企業體系中的分工制度，頭家娘的角色則可能「隱匿」或「消失」在家庭事業中，只扮演總管或是財務大臣的角色。

此外，國內相關研究也指出，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和位置，應該隨著企業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改變，否則調適不好，自己不快樂，公司也會被拖累；亦即，頭家娘最好「用」的時候是創業的時候，而最不能「用」則是在轉型以後(高承恕，1999)。

由上述相關論述中得知，中小企業發展至某階段，要朝大公司努力，首先就是要建立制度、專業分工，頭家娘不能再靠以前人治、情治的管理模式來經營企業，否則會面臨無法定位問題。也就是說，家庭企業是否能順利轉型在於頭家娘在企業裡參與的模式是否能脫離量入為出的「家計邏輯」，採取合理使用的「事業邏輯」。小型企業的管理通常依賴人際信任的運作策略，在這種制度下，頭家娘將成為企業內重要的「自己人」，受到老闆完全的信任而擔任監督管理的重要責任。但隨著企業的擴展，頭家娘不可能再從頭到尾參與，可能需要發展正式的制度來規範僱傭關係以及工作活動的協調與控制(呂玉暇，2001)。

五、研究目的

如前面陳述，中小企業草創期頭家娘佔有一定的位置，但隨著企業的發展、轉型，頭家娘不能再扮演大小事一把抓的「打雜」角色，必須專職於企業某個部門。由於過去探討頭家娘角色的經驗都侷限於台灣，但當產業外移後，因為土地、勞力成本的降低，工廠規模勢必比台灣大，而企業組織規模的變大，頭家娘的角色一定會產生變化。

在台灣有關頭家娘的相關論述中指出，「頭家」在創業期是缺少不了「頭家娘」的，因為她可以隨時充當補充勞力。產業移外大陸之後，頭家娘是否會因企業組織的改變，無法進入企業經營的場域；而在時空隔離下，頭家娘原本的社會網絡也因此而斷裂，頭家娘是否因為這些因素也無法在企業裡發揮她的功能。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故本研究試圖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 1.在整體產業結構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條件也在轉換的全球資本脈絡下，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會產生怎樣的轉變？完全退出家庭事業晉升少奶奶？亦或是將自己過去累積的經驗，晉升為老闆階級？而這種角色的轉變代表什麼意義？
- 2.而當產業外移後過去掌管企業命脈—財務的頭家娘退位，這種轉變意味著權力上升還是下降？而頭家娘從多重角色身份隨著物換星移、時空轉變其活動空間又會受到怎樣的變化？改變的可能性和限制在那裡？具有怎樣的正面與負面意義？

第二節 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

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父權體制³ (patriarchy) 與資本主義 (capitalism) 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織，和政府政策，強化了對婦女勞動的剝削。在勞力市場婦女變成了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在家裡她們繼續扮演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的無酬家務勞動者的角色 (unwaged domestic workers)。

成露茜、熊秉純，1993

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女性勞工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1970 年代為使更多的婦女投入勞動力得以參加勞動力市場運作，國家提出「客廳即工廠」的口號。此外，台灣企業組織結構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因其仗著人力調度較有彈性、資本額低等特性，成為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體，而女性勞動力在中小企業體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的角色，更說明了女性對於台灣經濟的重要貢獻(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

工業化雖為女性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但許多女性主義者研究發現，女性投入有酬的勞動市場之後，常因家庭事業的需要而放棄原先的工作，與先生一起打拚。在台灣，許多中小型的家庭事業中的女性(頭家娘)，絕大多數是基於這樣的因素辭去原本的有酬工作，投入自家營業的無酬勞動(成露茜和熊秉純，1993；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由勞工階級轉換頭家娘角色，並不代表脫離勞動生產，反而負擔更多的責任，並扮演多重角色，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與「家庭場域」中。擔任生產與再生產的工作外，還必須承擔經營風險。

以下筆者將從傳統女性地位 v. s 工業化女性角色，不同女性主義觀點及婦女與階級流動等面向，探討婦女角色地位的變化。

³ 哈曼特定義父權體制為「存在於男人間的一套社會關係，它有一個物質基礎，它雖在形式上是屬垂直形的階序(hierarchical)，但它也在男人彼此間建立起或創造出平行的互賴及團結，使得男人因此遂行宰制女人的企圖。」就物質基礎而言，它是存在於男人對女人勞動力的操控中；此一操控則是由限制女性取得重要經濟資源，及不讓女性取得任何對女性 sexuality(尤其是女性的生殖能力)的控制而達成(Tong, 1996, 頁 317)。

一、傳統女性地位 v. s 工業化女性角色

工業化之前，女性的角色定位為隱形的、附屬的角色(Ward and Sorenson, 1989; Cole, 1993; Niehoff, 1987; Gates, 1987; Greenhalgh, 1994)(引自呂玉暇, 2001); Elder(1978)和伊慶春(1982)從經濟面的觀點分析也指出，傳統的社會裡婦女是個依賴者，而其在家庭中的主要角色是妻子與母親(引自高承恕, 1999)。女性被視為應在家庭照顧小孩，而男性則被塑造為「一家之主」的角色；女性則必須善盡作為家庭中的「母親」、「妻子」的責任(李端悅和柯志明, 1994)。

傳統觀念對兩性而言，男性必須負擔起家庭生計提供者的角色，能夠讓妻兒溫飽，不受饑寒，提供良好的物質享受，是男性成功的另一個象徵。而婦女只要扮演令丈夫無後顧之憂的角色，為在社會打拼賺錢的「一家之主」安家，便是人人稱頌的「賢妻良母」(謝秀芬, 1998)。

功能論者(Parsons and Bales, 1953)將家庭內的角色分為工具性和表達性兩種角色。男性擔任工具性的角色，要維持家庭生計以及聯繫家庭及外界大社會；而女性則擔任家庭內統合的、表達的角色，負責謀求成員的統一、精神的穩定、培育子女人格。但隨著社會的變遷「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是否也會有所變動，女性由「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在許多相關的研究上我們可以發現，工商社會確實為女性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家務勞動仍落在女性身上。

工業化機器大量使用後，勞動力市場需要大量勞力，女性因市場需求而進入「公領域」，但相對地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結果卻使得勞動市場呈現出女性勞動「邊緣化」與「去技術化」(張晉芬, 1995b)。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產生了衝突與矛盾，大量機械化的結果讓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公領域，由於女性薪資低，彈性高，怕自己的工作有一天為女性所取代，於是展現其父權威權與資本家對抗，表明資本家若雇用大量的女性勞工，他們將要求女性回到家庭。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協商雙方尋求合作的基點；即是父權讓女性得以進入勞動市場，但卻只能置於勞動市場的邊緣或低劣的地位(葉盈蘭, 2002)。所以，女性無疑是身處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與父權體制歧視與壓迫的環境下(陳素香與鄭村祺, 1991, 引自葉盈蘭, 2002)。

女性進入「公領域」後，平日除了要從事「生產」外，原本「再生產」的家務角色並沒有因為就業而有很大的改變，舉凡一般家務，如預備膳食、整理衣物、照料子女，幾乎完全由婦女負責。其他如督導子女學業、記帳、清掃住宅，有部分家庭是由丈夫或其他男性負責，但大多數家庭仍由妻子負責，只有較技術性及需要體力的家務才由男性負責。婦女就業後，其家務角色仍延續，少有變遷的現象，使得就業婦女需承受工作及家務的雙重負擔(double-burden)。

布拉德和沃夫曾針對婦女就業對家務分工的研究指出，外出就業的妻子所做的家務數量相對而言會較為減少(Abbott and Wallace, 1995)。但也有許多研究指出，家庭內角色分工的型態，隨著時間的變遷並不大，傳統家庭內的性別分工仍然持續著，例如瓦克(Walker, 1970)以時間使用的方法研究夫妻角色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無論妻子是否工作，丈夫投入家務時間並沒有差別(引自呂玉暇 1983)。

在台灣，女性因為社會化 (socialization)的結果，相信做家事是女人的天職(成露茜和熊秉純，1993)。女性所扮演的「再生產」角色雖創造了經濟成長，她們在家裡從事家務勞動，照料小孩，讓先生無後顧之憂地替資本家工作，賺取更多的利潤，但這些家務勞動是不列入國民生產毛額(GDP)計算。Mies(1986)在《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全球父權主義與積累—國際分工中的女性)一書中指出：「女人的勞力付出，被視為一種天然資源，和空氣與水一樣，任君使用。」(引自Fellow, 2002)。經濟學者並認為，女性為家裡付出的勞動，不能創造商品價值故不得視為勞力的一種。因此，儘管女性做家事、托嬰、育兒等，需付出想當多的勞力和時間，但卻因為沒有任何市場價值而不受重視。

工業化前，女性是被排除在資本主義生產行列，女性僅需扮演父權所賦予女性的傳統角色，在家裡扮演不用付薪水的女傭人，昆德—法蘭克(A.Kunaer Frank)將此積累稱之為「無止境的原始積累，因為有了它才能聚集最初的資本。」他說：「假如資本主義沒有婦女的貢獻—其形式是無報酬的家庭工作以及作為必要時受剝削的勞動力後備隊伍—那麼資本主義的累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會困難多了。」(Michel, 1989)。

事實上，家務生產只是婦女從事非商業生產中的其中一環而已，過去在歐美國家在小型企業比勞工更多的年代裡，婦女必須到店裡或是公司充當無酬臨時工，降低生產成本，才能維持生活。Michel(1989)在談論歐美婦女處境時表示，歐美小型企業裡婦女處境是同時立足於家庭及事業場域間，台灣中小企業裡頭家娘也一樣，必須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及家庭場域。

台灣在 60、70 年代正面臨經濟結構轉型，政府爲了配合經濟發展目標紛紛設置加工出口區發展勞力密集性的輕工業，如紡織、電子業等，許多女性也在此號召下投入生產行列。而資本家則靠著在台灣招募女工、加上便宜的土地租金、廠房，從事製造業、玩具、皮鞋、自行車等產業，以外銷出口，因而在當時創造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因此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女性勞工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葉盈蘭，2002)。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然急遽上升但在家庭裡的經濟地位仍屬於附屬地位(Chou1987；嚴祥鸞，1996；引自呂玉暇 2001)；主要是女人常因人家認爲她們的主要角色是妻子、母親，所以她們的事業必須會有中斷，因而女人被視爲是照料家庭的人，男人則是負擔家計者。此外，成露茜和熊秉純(1993)認爲，經濟發展並未減少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主要是因爲以男性爲主的官方機構並不重視女性權益。

女性在家庭裡的地位並沒有因就業而獲得提昇，主要是因爲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一直是屬於「邊緣勞動力」，賺錢只是爲貼補家用，勞動薪資也低於男性，主要是受到「男人要賺錢養家」、「女人只是要賺一點零用錢」等父權意識型態的影響，是爲貶抑女性的奉獻，成就男性。而從資本主義(capitalism)財富積累的邏輯來看，藉由壓低女性受雇者的工作報酬以降低人事成本，可符合雇主的利益。有業者坦承，如果將女性的報酬提高到與男性相同，將會增加他們的成本(聯合報，1995年2月10日，引自林芳玫、張晉芬，2002，頁219)。也就是說，資本家的財富積累主要是來自於對女性勞動力的剝削。

二、不同女性主義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爲，女人的從屬地位一直是一種符合資本主義利益的壓迫形式，所有的女人都受壓迫，無論她們是嫁給布爾喬亞還是普羅階級男子(Abbott and Wallace，1995)。此外，女性在家庭領域中扮演了複製再生產關係的角色；女人之所以被壓迫，主要是因爲女人被排除在公共生產之外，而女人解放戰役乃是無產階級(勞工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重大任務之一。女人所受壓迫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在本質上脫離不了關係，而女人無償地肩負起照顧勞動力與撫育下一代的工作，有利於資本主義的運作。因爲女人回歸家庭負起家務勞動再生產工作後，資本家可以更剝削男人的勞動，而資本主義也從女人的無償勞動中，剝削她們的剩餘價值(Abbott and Wallace，1995)。

但社會主義女性學者認為馬克思女性主義太過強調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沒有認知到性別體制乃是獨立於階級之外。雖然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古巴、中國大陸、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女性在經濟上大體獨立於男性，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性一樣都還身陷於父權體制的掌握，並未自父權體制下翻身。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馬克思女性主義太過強調資本主義，無法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將女性分派於家庭，男性則分派於工作場域的原因(Tong, 1996)。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為女人之所以受壓迫，不只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同時也來自於父權體制的壓迫。法國女性主義者戴非(Christine Delphy)認為女人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階級被男性所組成的階級所壓迫、剝削。雖然每個女人的生活水平有所差異，但有其共同點即是，她們的家務勞動被剝削了，也就是她們失去了自己的勞動，正如男性失去了他們所生產的物器。

基進女性主義則認為主要問題在於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傳統的父權體制)，並認為家庭是壓迫女人的主要工具之一:透過性奴役(sexual slavery)與強迫性母職(forced motherhood)—透過男人對女人身體的控制。她們並強調，幾乎所有權力的通道都掌握在男性手中，如醫藥、商業、法律、政治、學術等；而女性只有兩種命運:一是困守家庭，另一個則是出外工作，但做的是最低層、薪資最低的工作。精神分析女性主義也與基進女性主義一樣，對「公共空間是由男性填滿，私人世界空間則由女性填滿」說明父權體制壓迫女性。

工業發展雖讓女性由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女性仍受到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共同壓迫，主要是因為女性仍受到「成長一步入家庭—絕跡於生產及公共生活—兩性不平等」這條因果鍊所束縛(Tong, 1996)。也就是說，即使女性隨著經濟發展，在經濟上獨立不需再依靠男人，但仍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父權體制的束縛，就像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持雙系論者(dual-systems theory)認為，即使經濟發展讓女性在經濟上已經能獨當一面，甚至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父權體制及資本主義還是會用兩種不同的社會關係形式及兩種不同的利益形式，對女性有所壓迫。

泰諾(Susan Tiano, 1987)認為，經濟「開發」往往使女人的處境更加惡化，女人要負擔生計及維持家庭經濟及生養孩子的責任，而男人為了到外地工作必須遠離家園。當女人加入生產行列的時候，工資普遍偏低，社會開發之後，女人並未因此得到解放，也沒有享受到和男人一樣平等。在都市以及部分鄉村地區，現代化則以一種新的方式在剝削女人，無論是在工廠或農田工作，女人則被視為廉價的、耐用的勞動力。

女人之所以被視為廉價耐用的勞力，主要是傳統認為女人主要的角色是妻子與母親，所以他們的事業必須會有中斷。在國內外研究中也指出，已婚女性的工作目的在於一些「蠅頭小利」(pin money)所以工作在她們的生活中並不太重要，女人最重要的是回到家裡相夫教子(Abbott and Wallace, 1995)。正因為女性不把薪資視為主要工作，在勞動市場上較不計較薪水，對男性往往構成「削價競爭」。男人為保障工作於是要求資本家給女人低於男性報酬，或是提高他們的薪資，讓女人回到家裡照料家庭，男人則可以安心出外工作。而這正是父權體制不讓女人進入工作場域的策略。

依此論述，女人一生都受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所壓迫，而台灣家庭企業中頭家娘的興起也是在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雙重剝削下形成的工業化產物。從表面上來看，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並沒有因為傳統性別分工而限制個人的發展，自家企業也提供了她充實、施展本身能力的地方，不必因學歷、薪資等諸因素，而必須出外工作另謀發展。實際上，頭家娘是在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相結合下，在家庭事業裡需扮演廉價勞工(cheap wage workers)，無酬家屬工作者(unwaged family workers)和無酬家事勞動者等多重角色(成露茜、熊秉純，1993)。

三、婦女與階級流動

結婚吧！任何事情都比在這邊工作好。大部份的女人都會結婚，不是嗎？女人可不是像男人一樣，一生都在工作。這麼說好了，我結婚以後不想再工作。我不認為結婚後女人還得再工作。當然啦！反正也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所以得把位置留給那些真正得自己維生的人。

Pollert, 1981:101, 引自 Tong, 1996

由上述這位女性的對話中可發現，很多女人為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認為靠「結婚」這個機會，是讓自己改變階級的最佳途徑；而男性則可以經由教育改變自己的出身(上野千鶴子，1997)。在台灣，受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傳統文化的影響，大家都想藉由高教育求取高職業、收入及地位；但對於無法透過高教育取得職業、地位的民眾來說，惟有透過創業，才能從勞工階級變成資本家，以達成「黑手變頭家」的願望，也是他們階級翻身的途徑。但女性要改變階級身份與上述工廠女工所述一樣，往往需靠「婚姻」來達到階級地位改變。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階級取決於人們和生產工具的關係——也就是說，基本上取決於是否控制資本，或只能出賣勞力。凡是和生產工具關係相同的人就享有相同的階級地位。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階級，一是資本家和勞工階級。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他們對勞工階級的剝削在於資本家給付工人的報酬少於工人勞動產品的實際價值，並從中賺取利潤。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是以勞資生產關係為基礎，無視於女性與男性勞工的利益衝突問題，也未處理家庭主婦的階級位置，女性無論就業與否，階級屬性都依據父親、丈夫的階級屬性來決定(黃淑玲，2000)。

在傳統社會裡女性要往上流動，通常是婚後另一半需有自己的事業，而女人則須配合男人的事業(Crompton and Sanderson, 1986)。芬奇(Janet Finch, 1983a)指出，妻子的無償勞動對很多男人的重要性在於使丈夫可以專心於事業；卓別門(Chapman, 1984)則指出大部份男人向上流動是爲了讓太太可以有「更高級的」生活風格(Abbott and Wallace, 1995, 頁 43)。

依照前述的說法，部分女人的階級地位要往上流動須依賴男人，在傳統的階級研究中也認爲，大部分女人的階級地位都是衍生的，取決於他們共同生活男人的就業經驗。也就是說，女人的行爲都取決於他們男人的職業地位，而非她們自己的經驗。

但史坦沃茲(Stanworth, 1984)卻認爲，並沒有證據顯示女人的階級地位完全等同於先生的階級。而且以目前的研究來看，女人的階級地位顯然應取決於她自己的職業，在決定家戶位置時，應同時參照夫妻雙方的職業而定(Abbott and Wallace, 1995)。隨著經濟發展女性已能獨當一面，能力上也比男人強，不需再依賴其關係改變階級。所以再談女性階級流動不應從男性的視野來分類女人，應以女人本身的職業來分類女人，這樣才能進一步探討市場與階級的不平等，並同時考慮到男人與女人。如果只是把男人和女人結合目前的階級量表並無法測量出女性的階級地位，因爲女人的工作集中於某些男人很少參與的職業上。

已有愈來愈多的經驗證據顯示，我們不能忽視女人的社會階級地位，或只是根據她們的丈夫或父親的社會階級地位來看待女人的地位(Henderso 等著，2000)。本論文將在此脈絡下，探討在資本國際化下，頭家娘在企業裡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的外移而產生變化，而頭家娘隨資本移至大陸，其在家庭事業中角色地位將產生什麼變化？再進一步分析其在大陸的生活處境及社會流動是否有向上流動，而父權體制又如何壓迫這些握有經濟支配權的頭家娘。這些改變代表著她地位的上升還是下降，是本論文後面幾個章節所要陳述的。

第三節 分析架構

由上述相關文獻論述所構築的基礎，了解到「頭家娘」興起的背景與父權體制及資本主義脫離不了關係，頭家娘在這兩股力量的雙重剝削下，不僅擔負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還要承擔經營者的風險。高承恕(1999)在針對中小型企業頭家娘的研究中提到，「近幾年來，由於整體產業環境在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條件也在轉換，原作為國際分工下的代工製造已愈來愈難以立足生存，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必須轉型或是轉移陣地另起爐灶。」而當企業的規模、型態及技術層面等面相改變時，頭家娘的角色位置也將面臨改變。

如前論及，1980 年代初，台灣中小企業將產業移往大陸，主要是因為環境的「拉力」與「推力」所造成。這兩股力量看似毫無關連，實際上，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為擴大資本積累，在本國資源無法為其積累更多資本時，便往第三世界國家尋求更廉價的勞力及土地；而第三世界國家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如勞力、土地，吸引跨國資本。

而原本在中小企業裡從事生產、再生產及無酬家屬工作者的頭家娘，隨著頭家將資本移至大陸後，因勞力、土地便宜，頭家娘不用再扮演多重角色，變成馬克思資本主義中握有生產工具者的資本家。從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來看，頭家娘隨著資本流動移居大陸後，她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一定會產生變化，至於產生哪些變化？無法單從生活樣貌的改變來分析。Maria Mies(1986)在〈Colonization and Housewifization〉(殖民與家庭主婦及家庭主婦化)一文中指出，婦女家庭主婦化的過程與殖民化是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婦女家庭「主婦」的形象是被建構出來的，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則是此行動中最大的幫兇。

雖然在過去十年的研究有發現，經濟發展或工業化對於女性生活經驗的影響在不同地區、國家、階層間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呂玉暇, 2001)。但 Maria Mies(1986)認為，要探討這些差異，如果僅從歷史、文化脈絡及政經學去分析女性之間的差異，只能突顯表面的問題；她認為要探討女性的角色位置，應從全球資本積累的角度來分析，才能從更深一層結構理解不同地區、國家、階層女性的問題。

依此據論，頭家娘隨先生轉移至大陸發展後，其角色產生的變化，也應從全球資本積累的脈絡來看。從產業外移資本輸出的角度來分析，原本在台灣屬於小資產階級的「頭家娘」，隨著產業的外移移居至大陸後，因為大陸勞工及消費便宜，所以在階級地位有「向上流動」的現象。

雖然這些頭家娘在大陸的生活人人稱羨，但其在精神上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頭家」的生活在資本流動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變化，為展現其權力花錢包二奶，與其說是生理上的需求，還不如是一種對落後國家女體的父權消費。頭家娘在面對如此情境下，在精神上產生了情感上、情緒上及經濟上的依附。

本論文將從全球資本積累的脈絡下，探討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如何聯袂壓抑頭家娘，而頭家娘的角色地位又將產生怎樣的變化？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名詞界定：

「台商太太」一詞，近來在台灣頗為流行。只要是隨先生前往大陸居住或是先生在大陸工作者，都被稱之為台商太太。本研究所指的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也被大家稱之為「台商太太」，與台幹型(指隨先生被派駐至大陸定居之女性)或是自行創業型的台商太太不一樣的是，她們過去在台灣必須是傳統產業勞力密集的中小型產業，而且必須在企業裡參與勞動，扮演生產與再生產角色及無酬的家屬工作者。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是以廣東省東莞市為主，選擇此地主要是因為，華南地區包括廣東省、福建、南海一帶是台灣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最早登陸之地，而位於廣東省南方的東莞市更是目前聚集台商最多之處，也是大陸地區第一個成立台商協會及設立台商子弟學校的地方，在這裡有三千多家台商，居住一、二萬名台灣人(見附件二)。根據東莞台商協會統計資料，目前大陸有三萬多家台商(大陸官方統計包括服務業等有四萬五千家)，廣東佔三分之一，東莞又佔其中三分之一，產業別則以電訊、電覽、塑膠、鞋業、電機機械及傢俱業為主(見附件三)⁴。

三、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將從頭家娘自身的生活經驗探討其在企業裡角色位置是否因資本移動而產生變異。本研究將針對十位隨先生移往大陸發展之傳統產業頭家娘及五位未追隨先生前往大陸，留在台灣照顧小孩之頭家娘進行研究。由於本研究對象係以過去曾參與直接勞動的頭家娘為主，這種型態的產業絕大數以傳統產業居多，但研究者在今年五月初步與幾位台商太太非正式訪談後發現，本研究欲研究對象大多屬於 80 年代即前往大陸尋找生機的企業。

⁴ 東莞台商協會 2001 年統計資料。

這類型的企業，礙於當時政經環境情勢及小孩教育問題，絕大多數的頭家娘剛開始時，大陸、台灣兩地跑，或是留在台灣照顧家庭、小孩。依據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委託中正大學企管所教授呂鴻德(2002)所作的研究發現，台商前往大陸投資大致分為四個波段：第一波是在 1986-1990 年間；第二波則是在 1991-1995 年間；第三波則是從 1996-2000 年間；第四波則是指 2001 年以後。

呂鴻德教授分析指出，從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四個波段來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前兩個波段的產業外移係以中小型傳統產業為主，台商型態以自行創業者居多；後兩個波段則以大型集團的投資為主，台商型態以台幹居多。前兩個波段雖是中小型產業移往大陸投資的高峰期，但由於當時兩岸關係緊張，政經環境不穩，基於安全考量及小孩教育問題，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都是頭家單槍匹馬前往大陸設廠，頭家娘則留在台灣接單或是退居家庭照顧小孩(見附件四)。

故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為過去在台灣為傳統產業，頭家娘有參與直接勞動，並掌管財政大權，平時除了忙於工廠事物外，下班後還要忙於家務、照顧小孩。屬於這類型的頭家娘在此研究中又分為兩種，一是隨先生移往大陸，另一種則是先生一人前往大陸打拚，頭家娘則留在台灣照顧老小。兩種類型的生活情境及所遭遇的困境都不同，在後面幾個章節裡都會有詳細的論述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行方式有以下方式：

一、深度訪談：由於本研究涉及兩個類型頭家娘，一是隨先生前往大陸之傳統產業頭家娘，另一種類型則是留在台灣照顧小孩之頭家娘。因此在初步研究者訪談對象先以留在台灣之頭家娘為主，在尋找符合條件的「頭家娘」個案的過程中，周遭朋友雖然很熱心介紹對象，但因她們把「頭家娘」與「台商太太」混在一起，所以在一堆具有「台商太太」身份的女性中，大都不符合筆者的研究對象，即使同樣具有「頭家娘」身份，也未必符合筆者設定的研究條件。

在台灣對象難覓的情況下，我決定先從大陸著手，前往東莞訪談頭家娘，並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符合條件的受訪者。因受到先前晚晴協會到東莞訪問，回台後對媒體發佈不實消息(指包二奶事件)的影響，當筆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受到一些阻礙，雖然筆者再三表明是某某大學研究所學生，目前正在進行一本有關頭家娘角色地位的論文研究，大多數頭家娘仍拒絕接受筆者訪談，即使筆者再三保證本訪談只限於論文研究之用，也不會將其真實姓名刊登於論文中，還是有很多頭家娘不願意接受筆者的訪問。

筆者爲了表示絕無欺騙，還示出學生證給她們看。但她們還是抱著存疑的態度，認爲怎麼可能一個女孩子在大陸無親無故爲了寫一本論文千里迢迢遠從台灣來到東莞。幸好有些頭家娘見我可憐願意接受訪談，並幫我找尋對象，讓我得以順利完成此論文。

完成了十位移居頭家娘的深度訪談後，筆者以爲分偶頭家娘很好找尋，於是安心這部分的訪談，沒想到要找到等符合筆者研究對象的頭家娘相當少，一般人把先生被派駐到大陸稱之爲「台商太太」以爲是筆者研究對象，很熱心地幫我連絡、介紹。因爲朋友介紹的台商太太並不是以前傳統產業裡的頭家娘，筆者只好透過認識台商太太一個介紹一個方式，一一過濾訪談對象。最後訪談五個分偶頭家娘。

筆者與十位移居頭家娘面對面做深度訪談，係採取半結構式的訪問，在台灣時筆者先設定幾個大方向，其他的問題則從她們的答問中再繼續追問。例如「包二奶」的問題，我並沒有列入訪談主題，但大多數頭家娘有意無意中都會提到這件事；甚至有些頭家娘更是告訴筆者，她先生就是與公司會計在一起而與她離婚。筆者爲了怕碰觸到一些她們敏感的話題，如公司規模有多大，營業額多少等問題，剛開始時筆者先請她們談談過去在台灣的生活情境，等到話題引發她們的興趣，對筆者沒有防備心之後，再聊其他的問題。以下是筆者與移居頭家娘及分偶頭家娘的訪談基本問題大綱：

A、移居家庭(基本資料見附件五)

- 1、爲什麼到大陸來？幾年來大陸的？可不可以談談到大陸的原委。
- 2、以前在台灣從事什麼產業？可不可以談談以前工作的情形。
- 3、產業外移至大陸之後，公司規模有沒有變大，現在有多少員工？廠房多大？營業額比台灣大多少？
- 4、現在有沒有參與工廠事務？擔任什麼位置？跟以前有什麼差別？
- 5、以前擔憂什麼？現在擔憂什麼？
- 6、生活上起了什麼重大變化？

B、分偶家庭基本資料(見附件六)

- 1、爲什麼沒有跟隨先生到大陸？
- 2、以前的生活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 3、現在有沒有掌握公司的財務？
- 4、擔憂什麼？現在擔憂什麼？

二、參與觀察法:透過深度訪談雖然可以了解頭家娘到大陸之後的各種轉變，但筆者認爲，要了解其在大陸的生活樣貌，必須從旁觀察頭家娘彼此之間的互動及生活方式，並真實記錄她們彼此之間的互動、對話。所以筆者除了與這些頭家娘面對面訪談外，也參與她們的聚會(如三五好友一起聊天，或是到其他頭家娘家裡辦聚餐等)或與一些頭家娘到處跑，到公司看她們每天的生活情況，了解她們在大陸的生活情境。

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限制

一、研究過程

在決定前往大陸進行中小企業「頭家娘」角色轉變爲論文題目時，筆者即開始在國內收集相關資料，由於國內報章雜誌所報導的台商太太的生活情境，大都以上海、蘇州的太太爲主軸，而且這些台商太太大都屬於台幹的老婆，與本研究所要探討中小企業「頭家娘」的性質不同；筆者再透過朋友關係，與幾位在台灣的台商太太連絡，並請她們幫忙找尋符合我論文的研究對象。消息發放出去後，很多好心的朋友都幫我找到「台商太太」接受訪問，可是當研究者更深入與這些台商太太交談後，才發現幾乎都不是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範圍。

歷幾經番波折，筆者向跑產業及兩岸的記者求救，詢問他們是否認識將產業移往大陸的中小企業。因爲近幾年來上海熱，所以多數兩岸記者都把焦點著重於移居上海台商及台商太太方面的報導，對於傳統產業中小企業移居大陸的情況並不太了解，而且中小企業移往大陸時剛好正值政經情勢不穩，大多數台商都是單槍匹馬前往大陸，所以頭家娘隨同前往的比例不高。不過，記者同業還是從眾多名片中幫我找到東莞台商協會人員的電話。

筆者以為這樣就可以順利成行了，沒想到記者名片上的這位幹部已經離開，其他人員也不知道她的連絡方式。筆者企圖找協會其他人員幫忙，但相關人員大多數時間都不在協會裡，即使連絡上了，聽到筆者的用意，大都不大理會或是以找不到相關人員回覆。在筆者想放棄的時候，剛好打電話到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剛好找到一位熱心的台商太太幫忙，筆者便與她約定前往大陸採訪的時間。

筆者與這位熱心的台商太太，只通過兩通電話，筆者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筆者，所以當筆者抵達大陸東莞時，很擔心她手機不通或是把筆者遺忘了，那筆者就得一個人流浪東莞街頭。幸好，這位台商太太沒有把筆者忘記，她還很好心地在她開設的茶葉店旁幫筆者找一家旅館，並交代店裡小姐儘量給筆者一些協助。因為在台灣筆者沒有事先聯繫，加上東莞市非常大(見附件七)，全市共有三十二個鎮，每個鎮設有好幾個工業區，距離都相當遠，所以筆者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根本不知從可著手。

這位熱心的頭家娘告訴筆者，可以把頭家娘約到她茶館，如此一來，筆者就可以節省一筆交通費，她也比較放心，而且大陸治安不太好，她擔心筆者一個女孩子四處亂跑，比較不安全。後來因為有好幾位頭家娘無法花一、二個小時的車程到厚街鎮，筆者就以搭公車及計程車的方式到各個工業區訪談頭家娘。

筆者還沒有到東莞之前，在台灣，就有很多人跟筆者耳提面命：「東莞治安很差，很多黑道份子出入，妳自己要小心，注意安全。」原本筆者不以為意，可是聽多了心裡總是毛毛的，抵達東莞的第二天，因為沒有約好訪談，筆者就趁機四處逛逛，但難免心裡還是怕怕的，走在路上總是很緊張，擔心自己被人跟蹤。後來幾天因為習慣了，自然心裡的警戒就沒了。記得有一天，與三位頭家娘上街吃台灣小吃，突然一位頭家娘緊緊拉著我的手，告訴我：「這裡很不安全走路多加小心點。」話才一說完，她又順勢挽起另一位頭家娘的手臂，四個女生就這樣相互挽著手臂排成一排走在路上。

看到這種景像，讓筆者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於是筆者問旁的頭家娘，治安沒有這麼可怕吧！這位頭家娘告訴筆者，平常我們是很少自己一個人走在街上的，為了安全連洗個頭髮也要請司機載到門口。從這些生活上的小細節，筆者感到，所謂的「治安不好」可能只是一種社會建構，也因為這樣讓這些頭家娘在東莞市在精神上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在這裡，雖然她們的生活比在台灣來得好，但她們的精神壓力卻很大，不太敢出門，沒有什麼朋友，沒地方逛街，加上人際網路的斷裂，都讓她們的生活失去重心。

筆者也發現到，除了社會治安讓這些頭家娘感到不安外，先生外遇也是她們最擔心的。台商到大陸包二奶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幾位受訪的頭家娘也明白地告訴筆者，先生到大陸一定要跟著來，不然很容易出問題。雖然話中沒有明白說爲什麼，但從她們的言談之間，可以很清楚地意會到她們話中的意思。幾位受訪的頭家娘認爲，台商包二奶是媒體誇大其詞，根本沒有這麼嚴重，並對晚晴協會說東莞婦聯會⁵(見附件八)成立是爲「掃黃」感到很憤怒。

但筆者從旁觀察，一些婦聯會成員不願面對台商包二奶的問題，是爲男性保留面子，並覺得女性應該展現溫柔婉約的一面，不應把家裡的事攤在陽光下，讓男人在台灣丟臉。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筆者感覺到過去以人情網絡和人際之間信任爲非經濟資本的台灣中小型企業，產業外移至大陸後，這些社會網絡都消失了，頭家娘更是因爲社會網絡的斷裂生活得不快樂。

二、 研究限制

目前國內關於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角色隨著資本流動所產生的變化，並沒有相關研究，也沒有針對中小企業轉型後頭家娘角色的轉換有相關研究，只有在一些報章雜誌上針對企業家夫人的心路歷程有相關專題報導，但也沒有明確地指出，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是否產生變化？而到底爲何轉變？故本研究雖是一個初步嚐試，但在研究過程中也有以下幾項限制：

(一)田野觀察時間太短：因爲時間及財力等因素，筆者原先只想把研究對象鎖定在未隨先生前往大陸之頭家娘的角色轉變；因爲這樣無法看出頭家娘在家庭事業裡的角色是否隨著產業外移而產生變化，所以筆者還是決定前往大陸東莞進行田野調查，因爲連繫上一直不是很順利，所以真正前往大陸的時間是2002年10月初。筆者原預計在此待上一個月實際觀察頭家娘的生活情境，但因頭家娘不太願意外人介入她們的生活，加上大陸交通不便需花費相當多的車資，所以筆者在東莞只進行了十二天田野訪談。時間從2002年10月3日至2002年10月14日。因爲田野觀察的時間太短所以無法明顯看出頭家娘在家庭事業中的角色轉變，只能透過訪談中去分析。

⁵ 附屬在東莞台商協會底下，是台商在中國大陸成立的第一個婦女團體。

(二)只有大陸沒有東南亞:台灣中小企業產業外移地區,剛開始時是外移至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1980年代開始才漸漸外移至中國大陸。而本研究只針對外移至大陸地區的頭家娘進行研究,至於外移至東南亞國家的頭家娘在家庭事業裡角色轉變,是否也與大陸地區的頭家娘一樣,還是因與當地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轉變,因為筆者未進行田野觀察,所以無法進行比較分析。

(三)80年代的熱潮景象無法觀察:台灣產業外移最早可溯自70年代中期以後,80年代掀起熱潮。筆者在進行田野訪談中,從早期即到大陸設廠的頭家娘口中得知,早期到大陸時因為政經環境不穩,加上大陸正在發展,很不方便,有時連一個小小連接器都要從台灣運送過來。除了加工原料不齊備外,婦女在這裡的生活更是苦悶,每天除了面對工廠就是工廠,沒有任何休閒娛樂,而且大部分頭家娘到大陸不到一星期就受不了,就打包行李回台灣。而且這些頭家娘剛開始幾年到大陸時,還是會下場參與勞動,因為這裡的員工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所以頭家娘必須親自下場指導。但目前筆者訪談到的頭家娘幾乎都不再參與生產者的工作了,完全是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第三章 緣起—爲何前往大陸打拚

背景說明

「在臺灣一塊招牌砸下來可以砸到好多董事長、總經理。」這句話主要是在諷刺臺灣社會，人人都喜歡當老板(謝國雄，1989)。之所以那麼多人想當老板，究其因主要是 1960 年代後期以來，臺灣一直扮演著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代工生產製造基地的角色。從產業發展的過程來看，早期由於缺乏資本、技術與國際市場的掌握，臺灣產業是以 OEM 的方式生產外銷(陳介玄，1998;周添城、林志誠,1999;谷浦孝雄，1992)。

代工產品的生產與行銷固然可以透過韓國式的大公司來經營，但也可經由臺灣式的中小企業及其聯繫起來的協力網絡完成。所謂的「協力網絡」生產方式是指將生產流程中不同部分、不同步驟交由無數的小工廠來達成，然後再由接單的母公司組合出貨，直接或間接地行銷於國際市場(陳介玄，1998)。這種零細化的產業結構帶來了「黑手變頭家」的機會，所以在臺灣社會人人都喜歡當老闆(謝國雄，1989)。

而這種原本以勞力密集爲主的代工產業，由於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環境的改變，伴隨著半導體的興起，出現新的國際分工型態，國際市場的結構的變化形成另外一個新空間(Chisholm，1989；Campbell，1991；引自陳介玄，1998，頁 91)。工業技術先進國家如歐美、日本，將商品生產到行銷以全球化及在地化的策略，予以重新分工；臺灣在經所立足的經濟世界也在 70 年代進行國際上的新分工。

也就是說，工業技術先進國爲擴大資本積累將資金流向更便宜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國大陸、非洲、印尼．．等。臺灣中小企業面臨此一鉅變不得不轉型或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大陸等地區爲產業找尋生機。在國內相關研究指出，1980 年代初臺灣中小型企業前往大陸投資，主要是因爲經濟環境中的「推力」及「拉力」所造成。

從「推力」面來看，主要是在傳統的國際市場上受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產品競爭威脅日增，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又相當盛行，不利於臺灣製造業產品擴大出口；另一面，臺灣地區投資環境改變，勞力短缺、勞工成本及地價大幅上漲、勞工運動迭起、環保意識高漲、新台幣升值等問題先後發生，不利於傳統的勞力密集加工產業在臺灣發展。從「拉力」面來看，主是因爲大陸、東南亞等地開發中國家積極招徠外商投資發展經濟(高長，2002)(表 1-1)。

台灣中小企業受到國際資本結構重整的影響，為擴大資本積累，將資本移至中國大陸，尋找更廉價的勞力及土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產業外移的過程是一種產業空間的重整，資本累積是在特定空間發生的。「近來，產業地理學者特別重提空間主體性位置，正是強調資本是否可以迅速累積，與產業活動地點的特性息息相關，而地方特性的重要性不但沒有在全球資本主義中消失，反而更形重要。」(Storper and Walker 1989; Scott and Storper 1986；引自曾熾芬，1999，頁4)具體而言，資本家可以透過資本在全球流動的方式，對正想朝經濟發展的國家進行掠奪、剝削，以擴大其市場及積累資本。

■表 1-1 促成台灣產業外移的原因:

	國內方面	大陸方面
推力	環保意識抬頭、土地價格高、工資上漲、勞動力短缺、台灣投資環境改變、新台幣升值、勞工運動迭起。	
拉力		80 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提供外資各種優惠措施，包括提供廉價的土地及水費、電費；其中便宜的勞動力，則是吸引產業西進的最大原因。

在上述相關論述中提到，造成產業外移的原因主要是環境的「拉力」及「推力」所造成。國內相關產業外移的研究大都以「推拉」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事實上，從更大的面相來看，「推力」及「拉力」的產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了不平等的發展模式，造成了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國際分工關係。

「美、日、歐等核心國家的跨國資本為進一步打開市場與投資園地，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邊陲國家，大規模生產。而台灣，與南韓等新興工業國家，於一九八〇年代起也開始加入南下行列，成為向邊陲剝削的半邊陲國家。」(夏曉鵬，2000，頁162)

台灣資本外移開始於1984年，較明顯的趨勢則出現於1989年以後，是年台灣正式解除外資管制條例(宋，1993；引自夏曉鵬，2002，頁165)。從經濟部投審會統計資料可看出，台灣對東南亞的投資比重，自1990年以後有逐年往上增加的趨勢。1952年至1986年間投資比重以美國(60%)為主，1990年以後，美國的投資比重漸漸減少，東南亞地區成為台灣外資最大外移地區。1992年大陸成為台資的新寵，1993年對大陸(65.6%)的投資比重更是超過東南亞地區，為目前台灣資本主要外流地區(夏曉鵬，2000)。

大部分移往東南亞或是大陸地區的產業，都是屬於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他們將產業移轉至第三世界的跨國資本，就像其他新國際分工體系⁶的資本一樣，是一個極端剝削勞動力的體系，在此體系中，勞動過程的零碎化也使得工作的技術性極低，勞工面臨隨時可以被替換的危機(曾熾芬，1999)。

Lipietz(1987:71)指出，「舊的國際分工是部門間(農業與工業)的「水平」分工，而新的國際分工則是不同層次的「垂直」分工，福特式的大量生產過程中，研究發展與高技術的製造工作仍停留在國內，只有低技術的裝配與操作部份移往海外人工便宜的地方。」(引自曾熾芬，1999，頁6)

台灣中小企業將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外移至大陸，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些過去在台灣擁有生產工具的小資產階級，在勞力、土地成本上漲，生產商品利潤下滑的情況下，將產業外移至提供廉價勞力豐沛的中國大陸。而正朝工業發展的中國大陸，為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迎合外資的需求，除了改造本國的投資環境外，也提出各種優惠措施。1980年代，大陸提出改革開放經濟政策以來，選擇以市場經濟代替計畫經濟的中國市場便成為世界各國資本競逐之地。台灣許多產業也搭上大陸改革開放的列車，興起一波一波的投資大陸熱，前往大陸設廠常駐甚至舉家遷移。

⁶ 新國際分工(NIDL)是指某些製造業向第三世界轉移的世界經濟變化。福祿培爾等人(Frobel et., 1980)對此進一步分析指出，本世紀70年代交通電信的變化，加上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成長和獲利能力都已經減慢，因而使得製造業設置在第三世界有利可圖。最常見的情形是紡織業和電器產品的組裝過程都由跨國公司遷移至勞動力便宜並且在政治上受壓制的國家中去。這類工廠大都設立在進出口貿易無關稅、也沒有其他阻礙的自由貿易區。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出口，因而出現了世界市場的工廠(World Market Factories)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等名詞(引自社會學辭典，1999)。

據統計，截至 2001 年年底，當年最先受到台商投資「惠顧」的華南地區，包括福建、廣東、海南地區，目前台商家數已經超過 2 萬家。華南地區是大陸改革開放的火車頭，80 年代，大陸先後批准了廈門、深圳、汕頭、珠海、海南為「經濟特區」，此舉也啟動了台商投資大陸的熱潮(投資中國，2002)。當年，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因土地、勞力成本上漲而陷入經營困境，紛紛往海外尋求新的投資點，而大陸華南地區所提供的廉價勞動力與土地成本，正好切中台灣中小企業的需求，因此許多業者帶著試探性的心情開始往華南地區移動。

以下本章節將分別從中小企業移廠的原因及移廠後因為生產成本下降，企業規模產生什麼變化？等問題面向進行分析。

第一節 中小企業的協力網絡—羊群效應

筆者在進行田野時也發現，幾乎前往大陸投資的產業都是因為台灣地區投資環境改變、勞力短缺、勞工成本及地價大幅上漲、勞工運動迭起、環保意識高漲……等因素，不利於傳統的勞力密集加工產業在台灣發展；加上大陸、東南亞等地開發中國家提供優惠措施及便宜土地、勞力，積極招徠外商投資發展經濟。基於這些因素，中小企業不得不將整個產業外移至大陸，尋求事業第二春。

廣東地區第一個追隨先先到大陸創業，經營手袋加工業的張姓頭家娘表示，

我們是做手袋加工業，需要很多的勞人，後來因為台灣勞工難請，上游廠商都跑到大陸設廠，為了生存我們在九一年把台灣廠關掉全部移至大陸，小孩則留在台灣唸書。剛開始來大陸時，也是很辛苦，剛開始員工人數也是從一、二百人做起，漸漸地才將員工數增加至一千人以上。台灣產業關係網絡非常緊密，只要你的中上游廠商移往他地發展，工廠也得跟著跑；即使是中上游廠商也一樣會跟著下游廠商跑。

從張姓頭家娘這段談話中可發現，台灣中小企業將資本移至大陸，除了與勞工難請外，與中小企業的協力網絡有極大的關連。同樣也是跟著上游廠商跑的黃姓頭家娘表示，「上游廠商都跑到大陸了，我們還留在台灣做什麼？」經營模具廠的劉姓頭家娘也一樣是跟著上游廠商，將產業全部遷移至大陸，她說，這樣才有生存的空間。

以經營鞋底加工及手袋產業的蔡姓頭家娘無奈地說，

有誰願意離鄉背景到一個治安環境不穩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台灣實在是無法再繼續生存了，我們也不會到大陸。其實我們下游廠商都是跟著上游廠商跑，上游廠商都跑了，我們當然也跟著來，不然在台灣根本不知要做什麼？

台灣中小企業之所以跟著上游跑，與過去的生產方式有關，也就是前述的「協力網絡」的生產方式。企業彼此之間較講究配套，如同一種難以割捨的裙帶關係。一間企業移往異地，其上下游也會跟著移動，就像當年台達公司決定在東莞設廠，結果帶動了上下游 22 家台灣中小企業前往東莞設廠，呈現「羊群效應」（網路 2000）。

在東莞經營電子產業的陳姓頭家則強調，「產業外移」是什麼意思？通常是下游廠商先來，逼得中上游廠商不得不來。上、中、下游廠商一個拉一個移往大陸的特性，主要與台灣中小企業緊密的協力網絡有關。

「台商來大陸是國際分工與延續台灣競爭優勢的問題，我們出走也是忍了十年，再忍就走不下去了。當買主都已經到了大陸，不是台商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接不接得到訂單的問題。」經營電子加工產業為主楊姓頭家娘如是說。

從這位頭家娘的談話中不難發現，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不得不移往大陸發展的苦衷。一位經營塑膠五金製品曾姓頭家娘無奈地表示，

「我們是一九九二年來的，我們不能不來，因為我的客戶在東莞，對商人而言，客戶在哪裡，商機就在那裡。一九九二年時因為上游廠商都跑到大陸，台灣員工難請，有時徵人廣告登了一個星期還找不到人。」

與曾姓頭家娘一樣，在台灣經營模具廠，因為勞力難請只好把產業移往大陸的劉姓頭家娘說：

到大陸是因為，模具工廠找不到員工，大家都不願做粗活，加上與我們配合的上游廠商都跑到大陸了，不得已也只好把產業移往大陸，因為台灣實在生存不下去了。

在台灣做自行車零件，產業移往大陸後轉投資做熱處理廠吳姓頭家娘則感慨地說，

我們投入自行車零件廠(約75、76年)時正好是國內產業轉變，自行車起飛的高峰期，那時候訂單很多，每天都很忙，一天大約只睡四、五個小時而已；但隨著國內環境的改變，雖然自行車零件廠的景氣還不錯，但卻請不到人，貨交不出來，訂單漸漸消失，公司的業績也直線下降，無法在台灣生存了，只好出走。

也是因為訂單太多找不到工人而將產業移往大陸，經營熱溶膠、熱溶膠槍產業羅姓頭家娘表示，

九二年因為訂單太多，找不到工人，只好把產業移往大陸，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只有我先生自己一個人在大陸，我則在台灣繼續接訂單及照顧小孩；那時候我是一個月到大陸一趟，因為當時政經環境不是很好，所以我先生在大陸做的貨都是經由台灣出貨，台灣收錢，這種兩邊跑的生活維持一、兩年，最

後因為員工一個個走，找不到不員工才把工廠結束，九六年才將整個產業移往大陸。

羅姓頭家娘進一步強調：「雖然台灣產業結構轉變但我們這一行還是很多訂單，但找不到工人，你說怎麼辦？只好到大陸找尋機會，這是不得不的選擇。」F姓頭家娘也覺得將產業移至大陸是不得不的選擇，她說：

在台灣幾乎所有的電子產業廠商都外移至大陸，雖然我們工廠還可以生存，但利潤有限，我先生看到一些廠商到大陸都有不錯的發展，也想把產業移來大陸，所以在十年前我們就一起到大陸設廠。

第二節 生產成本降低

從上述頭家娘講述到產業移至大陸的原因中，與前面提過的「推拉理論」有密切的關係。大多數資本家將資本移出主要原因是因為本國勞力及土地成本上漲，生存空間愈來愈小，而為擴大資本積累，產業必須移往至可以提供更廉價勞力的地區，以賺取更多的利潤。由於大陸勞力及土地成本比台灣便宜好幾十倍，所以大多數移往大陸的傳統產業規模都比在台灣時大上好幾十倍。

一、勞力便宜，要多少就有多少

一位在台灣從事鞋底加工蔡姓頭家娘認為，

以前在台灣從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可以管理這麼多員工，到了大陸之後，幾乎每個廠規模都是上千名員工，我們廠裡雖然有一千多名員工，但在台商裡算是小規模了，像寶成鞋業員工數更達上萬人，根本不能比。

二十九歲就做頭家娘，個性率直，因先生包二奶今年初才與先生毗離的張姓頭家娘也表示，

在大陸不僅勞工便宜、土地、水電費都很便宜，到這裡投資的廠商，投資額都沒有增加，但員工數都比在台灣時增加 10 左右。

大陸的勞力及土地租金到底有多便宜？一位到大陸十多年從事手袋加工產業的頭家娘說，以一般勞工而言，在台灣，一位工廠勞工的最低薪資是 1 萬 5600 元；在大陸頂多 300-400 元人民幣，折合台幣約 1200-1600 元，台灣一名勞工的薪水在大陸可以雇 9-10 人左右；而且在這裡又沒有勞健保及休假的問題，大陸勞工一個月大約休兩天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很甘心情願加班，不會有罷工的問題(附表 1-2)。在這裡設廠的產業，幾乎工廠都是燈火通明的，機器很少停過。這也難怪，大多數企業的營業額都比台灣多好幾倍。

■表 1-2 台灣勞工與大陸勞工薪資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元)

	台 灣	大 陸
平均薪資	—	630 元(人民幣)合台幣 2520 元
一般勞工	1 萬 5600 元	300-400 元(人民幣)合台幣 1200-1600 元
領班(小組長)	2 萬 3000 元-3 萬元左右	1000-1500 元(人民幣)合台幣 4000-6000 元
管理階層	4 萬元-5 萬元間	3000-5000(人民幣)合台幣 1 萬 2000 元-2 萬元

備註:因為大陸員工包含吃、住,所以表中所列舉之費用不包括食宿費用。

因為勞工及土地成本大幅下降,許多台商基於成本較便宜的考量,將產品製程分工愈加細分,以使用更多勞力的生產方式。一位模具工廠劉姓頭家娘就無奈地表示,

雖然勞力便宜,我們可以用最少錢請很多勞工,但其實還是台灣勞工好,吃苦耐勞、頭腦又靈活;不像大陸勞工,說一做一,不會自動自發找工作做,就是因為他們腦筋很死,所以我們才把工作分得很細,用很多的勞力。

大多數頭家娘也與劉姓頭家娘有相同的感覺。不過,她們一致表示,不管怎樣到大陸投資還是比留在台灣好,因為至少產業規模變大了,就較具競爭力,營業額也大了好幾倍。除了這些原因外,最大的原因是為積累更多的資本。

二、廠房租金

「在東莞每一家工廠都比台灣規模大過十倍，走完一個廠區等於打完高爾夫球的四個洞。」(投資中國，2000)這話一點也不誇張，筆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走訪十幾家位於東莞市幾個鎮的台商，發現其廠房少則上萬坪，大則數公頃，光是巡視廠區可能得花上半天的時間。一位在台灣做自行車零件到大陸之後轉投資做熱處理廠的吳姓頭家娘更指出：

到大陸設廠處處是生機，不僅土地、勞工成本低廉，連水、電費也比台灣便宜許多，所以大多數到大陸設廠的企業，工廠規模都比原來在台灣大上好幾倍，甚至十幾倍，產量也是台灣的三、四倍。其實最吸引台商到大陸投資的誘因是「人事成本」降低，以前我們公司 200 名員工約需 800 萬元，現在在大陸我們公司共有 1000 多名員工，人事成本只需 150 萬元。

一位從事熱溶膠生意羅姓頭家娘表示：

「在這裡一平方米廠租不到十元(合台幣不到四十元)，台灣簡直無法比，以前在台灣租一百坪的廠房租金，在大陸可以租到上萬坪以上，光是這個誘因就足以吸引人了，加上大陸的勞力成本也比台灣低十幾倍。」

經手袋加工產業的張姓頭家娘也表示，

這裡的廠房租金真的很便宜，如果妳問我，我的廠房有多少，說實在我沒有什麼概念，我只能告訴妳，我媽媽在這裡住每天早上起床只要在廠房走一圈運動，差不多就快中午了，妳就可以想像有多大。

張姓頭家娘進一步指出，大陸的土地租金也比台灣便宜好幾十倍以上。以東莞工業區為例，土地租金算是華南地區較貴的地區，但還是比台灣便宜，所以到這裡投資的企業工廠規模至少都有 1 萬 8000 平方米(5445 坪)。她說，以前東莞每平方米廠租不到台幣四十元，這幾年比較貴，而且不同區域價格也不同。以我們工廠為例，佔地 1 萬 8000 平方米(5445 坪)，每月租金約 11-12 萬元人民幣，合台幣 44 萬-48 萬元間，若以 44 萬元計每坪約合台幣 80 元左右；而在台灣工業區每坪土地的租金至少也要 2000-3000 元左右。

第三節 小結

在前面已經提到，台灣資本向外移動，在 1980 年中期以後明顯增加。過去台灣投資主要投資標的以美國地區為主，但從 1991 年開始大陸地區吸收了台灣鉅額的資本，統計顯示，1991-1996 年間台灣對大陸地區的投資金額達 56.4 億美元，其中又以廣東、江蘇為最主要的投資地區，投資行業別則以製造業、電子電器、食品及塑膠為主(經濟部網站)。

台灣資本的外移，代表著台灣的經濟已逐步踏上全球化經濟下的自由化傾向。台灣不僅是貨物的主要進口國，亦是資本輸出國(宋，1993；彭，1990；引自夏曉鶯，2002 頁 165)。造成台灣資本外移的因素除了前面所述的「推拉理論」有關外，國家也扮演很重要的推手，1987 年以後，政府為避免過多熱錢流向台灣，對台灣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於是放鬆台灣資本外移的限制，將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向外移動，並提昇國內其他產業技術升級。

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台灣工資上漲、工人意識抬頭，以及產品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將資本向大陸地區移動確實有利於產業發展。尤其是這些地區工資低、國內市場大，且與美國貿易享有同等的優惠(蔡明璋，2002，頁 458)。過去，台灣資本外移投資的地區以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為主，主要動機是為尋找原料市場或學習生產與管理技術，工資不是主要考量的因素。近年來前往大陸地區投資則是以工資為主要考量，因為這樣才能積累更多的資本，創造更大的利潤。

第四章 頭家娘角色轉換

背景說明

如前面幾章所述，台灣經濟發展是政府透過各種方式強化對婦女勞動的剝削，而「頭家娘」就是當時政府推動「客廳即是工廠」所形塑出來角色。她們與一般勞工階級婦女不同，除了要兼具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外，她們還扮演著廉價勞工、無酬家屬工作者，和無酬家事勞重者的多重角色(成露茜、熊秉純 1993)。

她們不像勞工階級婦女上班時間固定，只要在時間內完成自己的事情即可，除了煩惱小孩教育、家庭事務外，還必須與頭家一樣承受各種經營風險，當整體企業環境不好時，還必須苦惱員工生計……等，而最重要的是，當員工不滿罷工趕著交貨時，即使三更半夜也得加班把貨趕出來。也就是說，頭家娘同時具備生產與再生產角色，還得承擔經營風險。

國內相關研究指出，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將隨著產業、資本的外移或是企業規模的擴大而產生質變。在大多數人的觀念裡，總認為家庭企業裡的頭家娘在企業壯大後，就可以每天穿著漂漂亮亮，開著車、喝下午茶、逛街，過著少奶奶般的生活，尤其是產業移居大陸後，更是優哉連家事也不用做了。筆者田野訪談中發現，頭家娘隨先生移居大陸後，生活雖比以前輕鬆，不必從事再生產的部分，但因企業比原來企業大上好幾倍，頭家娘在企業裡扮演的角色並沒有降低，反而佔極大的比重。

台灣中小企業產業外移後頭家娘的角色確實產生變化，但到底產生了哪些變化？本章將從資本外移後，原在企業裡扮演重要角色的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將產生怎樣的變化？移居頭家與分偶頭家娘的差異在哪裡？

第一節 移居頭家娘的角色轉變

「頭家娘」因為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與「家庭場域」中，所以她所扮演的角色比勞工階級婦女來得多。但隨著資本產業外移，頭家娘的「角色」也將隨著「家事幫傭」的出現而有所改變，像家務及養育子女的工作，就由家事幫傭取代。筆者在進行田野訪查中，發現因為大陸勞工便宜，請一個阿桑(指家事僱佣人)只需人民幣 400-500 元，折合新台幣不到 2000 元，所以幾乎每個企業都有請二至三位以上的阿桑，做煮飯、打掃家裡，照顧年幼小孩。

也就是說，將工作場域搬遷到大陸後，頭家娘不用像以前一樣，每天早上先送小孩上學，再到公司上班。還沒到下班時間又得匆匆忙忙趕至學校接小孩下課，教小孩功課、洗澡及做洗衣、煮飯等家務勞動；如果工廠忙著出貨，晚上哄小孩上床睡覺後，還得到工廠幫忙出貨。到了大陸之後，只要花一點小錢就可以解決這些家務，即使小孩也不用操心，因為多數父母都把小孩送到國際學校，天天住校只有假日才回家。兩者相較之下，頭家娘到大陸之後比在台灣的時候還輕鬆。

一、每天不用再像陀螺一樣打轉

移居大陸頭家娘在產業移居大陸前，在台灣都是相當忙碌，一天二十四小時幾乎只晚上睡覺的時候，才有休息時間，其他時候都忙得團團轉。第二個小孩才剛出生沒多久就隨先生到東莞另闢事業，目前在東莞經營塑膠五金製品的曾姓頭家娘想起以前就怕，她說，

我還沒有嫁給我先生之前原本是在銀行上班，嫁給我先生之後，因為公司缺人手，先生就要我辭掉工作回家幫忙。就這樣我由拿筆桿變拿手板，在工廠除了管帳外，還要煮飯給員工吃，打理廠內的事情，請不到工人時還得下場幫忙。到了大陸之後，雖然也是很辛苦，但至少不必再像以前一樣，再到現場幫忙，我只要管理財務、採購及業務連繫就可以了。

很早就隨先生將產業移至大陸，以經營手袋加工產業為主的張姓頭家娘也表示，

我 29 歲時即與先生一起創業，那時候真的很辛苦什麼都做，不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要忙，回到家還要照顧小孩，做家事、洗衣服，那時我老大才唸小學一年級，老二唸幼稚園中班，所以非常的忙，幾乎沒有假日可言，一天二

十四小時只有睡覺時才有休息時間。剛開始來大陸時，也是很辛苦，雖然不用下場工作但還是要盯著員工，怕他們吐草。

在台灣時，原是做鞋底加工，產業移至大陸後轉型做皮革的蔡姓頭家娘談到自己剛開始創業時的日子，就覺得可怕。她表示，

我二十年前在做鞋底加工的時候比現在辛苦數十倍，工廠員工連我和我先生加起來不過七、八人，因為是自己的公司每天必須五點起床做到晚上十點，出貨時還要通宵，因為是自己的事業所以必須努力工作，不能偷懶，不然怎麼帶員工。即使工廠不加班出貨，下午四、五點又要匆匆忙忙接小孩下課，放在我媽媽家，再到公司看看有什麼事，如果沒什麼大事我通常會先離開公司，回家幫小孩洗澡啦！

過去這些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就像國內相關學者所論述，她們就好像「頭家的娘」，除了要關心頭家的身體健康外，還要校長兼撞鐘，什麼事都得管。說得明白一點，頭家娘在公司裡就是一個打雜的，打掃、煮飯外，只要任何一個部門有缺人，不論是操作性或是事務性的也好，頭家娘必須具有十八般武藝樣樣通的本領，這樣才能隨時遞補不足的人力。但從上述幾位移居頭家娘的講述中發現，產業外移後，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也產生相當程度的變異。

二、公司由「人治」管理走向「制度化」

前面已有提到過，台灣中小企業產業外移至大陸後，工廠規模都比台灣大上好幾十倍，這個轉變對頭家娘產生相當大的衝擊。70年代在台灣，中小企業規模最大也只不過100-200人，有些代工產業甚至只有數十人，甚至十人以下，也就是所謂「客廳即是工廠」。但到了大陸之後，產業規模一下膨脹好幾十倍，不但頭家沒有心理準備，一時無法適應，連過去掌管公司大大小小事務的頭家娘也不太能適應。

過去在台灣，中小企業由於資源匱乏，生存之道就是盡量壓低成本，自己湊和「頭家兼薪勞(雇員)」之外，老板娘也是最低廉穩定的員工(光華雜誌，1994)。在名義上頭家娘雖然只是公司的財務總管，實際上大小事她都必須張羅，從清潔、泡茶小妹、做帳會計、壓低成本與調頭寸的財務控管、補料的總務、出貨的盤點、生產線的品管、人事的管理等，無所不通。

但產業移往大陸後，由於土地及勞力成本低廉，企業規模都比台灣大號至少5-10倍以上，頭家娘不可能大小事都管，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企業才能壯大。一位從事手袋加工的張姓頭家娘就明白地指出：

以前在台灣大家的企業規模都不大，且大部分都是校長兼撞鐘，反正是家庭企業所以大家也不會計較，老板娘上班時間也都很彈性，有時候來個三小時，其他時間則回家帶小孩或是辦一些雜物；有時又得陪著員工加班。反正是自己公司且又沒領薪水，當然比較隨便囉！到大陸之後，就不一樣了，企業一下擴大10-20倍，員工多了，也不用像以前到廠裡幫忙了，只專注於做某些事，而且公司要朝企業化、國際化經營的話，就必須有一套制度。不然企業做不大啦！

九七年才追隨上游廠商到大陸設廠經營飾品產業的林姓頭家娘也認為，到大陸設廠比在台灣來得輕鬆。她說：

「以前在台灣廠裡大大小小的事，我幾乎都要管，到了大陸則是分層負責，訓練當地員工當小組長管理底下的人，我先生則負責廠內管理、產品開發及制度管理，我則負責業務及財務管理。起初我和我先在工廠裡也會有意見不合在員工面前吵架的時候，後來我跟我先生溝通，絕不能在員工面前吵架，有意見相佐的時候盡量忍耐，畢竟現在公司的規模不比在台灣只有二、三十人的公司，不能依靠人情要走向制度化。」

可能已經習慣家庭事業的經營方式，企業一下子膨脹好幾倍，不少頭家娘與頭家無法適應「制度化」的企業經營方式。一位燈管線圈的陳姓頭家娘就說，

剛開始時，我與我老公就講好公司的經營模式要改變，不能像在台灣一樣都講「人情」，所以他主管廠內員工技術指導，而我則負責財務、業務及員工請假等，公司有員工私下向他求情絕不能通融，必須依照公司規定，不能有私人的情份在，不然公司員工這麼多靠「人情」很難管理。

從事塑膠五金製品的曾姓頭家娘與先生到大陸發展已有十年的光景，十年來她們從無到有，公司也穩定下來，這一、二年意識到將來大陸的勞力及土地成本一定會上漲，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生存空間將愈來愈小，所以近年來積極將產業朝向機械化操作，至於勞力的部分則漸漸移往更落後的非洲國家。曾姓頭家娘表示，

現在我們把公司制度化，有請一些專業經理人打理公司，希望公司能朝大型企業方向走，不只是在大陸設廠，也要把廠擴展至西非、奈及利亞等更落後

的國家發展。大陸雖然現在勞工便宜，但再過幾年大陸就不適合傳統產業發展，必須再移往更落後的國家，現在我們公司已開始在非洲國家設立據點，為產業移往他處做準備。

一位原本從事電子產業加工後來轉型做鋼構的黃姓頭家娘就表示：

到大陸的前一、兩年我們還是以電子加工產業為主，因電子加工產業為勞力密集產業，很快就被取代，所以我們也正在尋找轉型產業，正巧在一次偶然機會裡，大陸這邊要蓋卡拉 OK 找不到建材，我先生就想到台灣鋼構，因此就找了幾位好朋友一起合夥做鋼構，由於鋼構需技術，專業人才很重要，所以廠裡請了幾位專業經理人負責廠裡技術指導、管理，我先生則負責對外業務，而我則是主管財務。雖然我和我先生一個是董事長，一個是財務主管，但我們仍是依制度做事，每個人都得依公司規定的「制度」走，沒有人可以例外。

黃姓頭家娘她進一步強調，以前在台灣工廠小、員工也少，所以操心的事也比較少，最大的煩惱是有訂單找不到員工，或是資金周轉問題，後來因為大環境的改變，有訂單找不到員工做變成最大的苦惱；到了大陸，雖然不必下場幫忙，但員工數比台灣多出好幾十倍，光是管理就得付出很大的精神及精力。剛開始時，員工常常「凸槌」，所以必須盯牢，不然一發生狀況，就完了。現在，公司建立制度化後，每個部門都有負責的人，我就不用擔心這擔心那了。

在國內相關研究中有提到，頭家娘在企業組織裡的位置不一定會隨著企業擴大、轉型而產生變化，這得看頭家娘所採取的是「家計邏輯」還是「事業邏輯」（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這裡所指的「事業邏輯」是指頭家娘應該「退位」或是「隱匿」在企業組織裡，扮演她財務大臣或是總務人員的行政角色，不能再干涉過公司其他部門的事，不然企業無法壯大。

其實，多數頭家娘也認知到企業要成長、壯大，公司必須建立一套制度，經營模式不能再依據台灣依賴人的信任運作策略。而隨著企業的發展可能需要發展正式的制度來規範雇傭關係以及工作活動的協調與控制。這在 Max Weber(1978)的科層化組織理論以及 70 年代以來勞動控制的理論(Burawoy 1979; Edwards 1979)，以至於近年來科層制度的省思文獻(Baron, Jennings and Dobbin 1988)皆指出隨著組織功能的擴展以及組織內部及對外關係網絡的複雜化，協調的需要增加，組織便愈趨向制度化(引自呂玉暇，2001)。

相對地，企業組織愈正式化，愈多依賴制度化的運作，制度化所帶來的權責劃分將使老闆娘的責任範圍減少，決策權力也隨著減低。在呂玉暇(1998,2001)的研究中發現，隨著家庭企業組織的制度化，老闆娘在家庭企業的角色會改變，有的專職(多數管理財務)，有的雖仍負責監督及檢核(看頭看尾)卻不如從前一般全面。筆者從頭家娘的訪談中也發現，大多數頭家娘在企業規模擴大後，幾乎都不再直接參與勞動，只專職於財務及總務的工作，有些頭家娘雖然還要看頭看尾，也不像以前需要全面參與，只扮演監督角色。

在台灣時原本只管理數十名員工蔡姓頭家娘即表示，

到了大陸以後，產業規模變大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從鞋子、手袋設計、採購、製造、接單全部自己一手包辦，必須轉交給其他人管理，我和我先生則只要負責接單、業務及財務就可以了。不然企業永遠也無法成長，只能停在原地打轉。」

三、頭家娘的煩惱

移居頭家娘在公司朝向制度後，比以前更輕鬆，但也有另一層的煩惱，就是公司百名甚至千名員工的伙食問題。經營燈管線圈的陳姓頭家娘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頭家娘是『校長兼撞鐘』什麼都管，但這些事情對頭家娘來說還可以應付，因為工廠員工不多，所以管理起來還好；到了大陸之後，頭家娘比老板還忙，老板只擔任現場管理及業務，頭家娘就不同了，掌管財務外，還得知道海關、稅金，員工糾紛、飯團的伙食……等統統都要管。」

陳姓頭家娘進一步指出，尤其員工的伙食更是頭家娘最頭痛的事，為降低成本，頭家娘們在聊天時也常常彼此交互心得，看誰最厲害用最少的伙食費，回去之後再調整自己的伙食策略。一位模具廠的劉姓頭家娘表示：

一個工廠 200 多名員工，每天的伙食費是很可怕的，所以必須斤斤計較，把成本壓至最低。

伙食費外，員工管理也讓頭家娘傷透腦筋，雖然多數台商都請大陸本地人士管理員工，但筆者進行田野調查從頭家娘們相互交談中發現，大多數的台商對於大陸員工的素質水準不太滿意，並覺得他們比台灣勞工還不靈光。因此，頭家必須在工廠裡待命，盯著員工做事。

上述煩惱外，頭家娘也擔憂產業未來走向。就像台灣經濟躍升時的狀態，現在許多大陸台商在台商工廠跟著學，一抓到機會就出去創業，然後「徒弟打師傅」，反過來跟母廠競爭。一位從事電子產業的楊姓頭家娘表示，

大陸的這些技倆台商都很熟悉，因為台灣當初也是這樣起家的，因此到大陸投資的台商本身除了要有危機感外，更重要的是產業、技術要升級。這是目前所有台商面臨最大的困境，不少台商除了在本業上轉型，從原本的下游廠，轉型成中上游廠，建立起一貫化的生產體系，或是在本業以外另外發展其他產業。

楊姓頭家娘更明白地說，有一天大陸員工在工廠裡學到一定程度時，一定會像當初我們一樣也自行創業，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為企業轉型作準備，不然以後沒有生存空間。

十年前，大陸為帶動東莞地區工業發展對台商有許多優惠措施，但近幾年來大陸政策轉向，對於台商的優惠措施不再，像去年六月，中共擬定「三十五號文件」的法規，將依據海關違規的紀錄及出口規模的大小，將企業分類管理，列為ABCD等級，被列為B級若干產業須在進口原物料時繳納百分之四、五十的保證金，這項規定使東莞台商大為恐慌。根據東莞台商協會的統計，百分之八十的台商可能被列為B級產業。所以台商必須朝轉型不然難在大陸生存。

原本從事自行車零件的吳姓頭家娘，產業移外大陸除了投資熱處理廠外，將再把產業擴展到汽車零件領域，她說：

在台灣有經營之神之稱的企業老板曾告訴她，未來大陸最有發展的產業是汽車產業，要做現在就要趕快做。因為他的這一句話，讓她想建議老公把公司的產業領域擴展到汽車產業這方面。

從事飾品廠林姓頭家娘也認為，

產業必須朝多元發展才有生機，前年開始她與先生把產業領域跨足建築裝潢業；她說，目前大陸裝潢業還不是很流行，以後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一定會有不錯的發展。

不過，從事手袋行業張姓頭家娘則持不同的看法。她說：

很多人都說傳統產業已是夕陽工業，沒有前景可言，這句話講了三十年還在講，我個人認為，傳統產業應走自己的路，開創自己的路就不會成為夕陽工

業，大家都不知道傳統產業造就了多少就業人口，不管是在台灣、大陸都一樣，以後甚至產業會朝非洲國家移動。

張姓頭家娘所指走自己的路，其實就是產業轉型，將產業的上、中、下游全部包起來，自己公司一手包辦，不再只是做下游的加工產業。由上述幾位頭家娘訪談資料中發現，產業轉型是目前台商面臨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在台灣曾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危機，幾乎前往大陸投資的中小型企业都特別有危機感，在產業移往大陸之初即想到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並積極佈署企業轉型。

在企業轉型過程中，頭家娘如果採取過去的「家計邏輯」的經營模式，可能會成為企業裡的包袱。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一書中曾提到：頭家娘最好「用」是創業的時候，「最不能用」，是轉型以後。在國內相關研究中也指出，頭家娘在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後，需在專業技能、知識上再訓練、再充實，這樣頭家娘才能再升級(卓越雜誌，1996)。

曾為女青年會管理學苑籌劃企業家夫人進修課程的東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沈筱玲曾強調，老板娘的問題往往會隨著先生事業發展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面貌。沈筱玲說：

「企業壯大後，高學歷人才或專業經理人進來，他們有最新的管理知識，更襯得本來缺乏專業背景的老板娘，在員工眼裡顯得落伍。沈筱玲就曾看過許多老板娘在企業壯大過程中，「由公司最珍貴的資產，慢慢變成公司擺脫不掉的負債。」(光華雜誌，1994，頁42)

移居大陸的台灣中小型企業的頭家娘也意識到在企業壯大過程中，自己不能再依據過去經驗來管理公司，在公司制度化之後，自己必須在專業技能、管理知識上再充實，不然自己將成為公司的包袱。頭家娘在心理也面臨極大的壓力，平時除了忙於公司業務外，還得利用時間學習經營管理及專業技能、知識，讓自己不致在企業壯大後成為公司擺脫不掉的負債。

由於大陸這方面的進修管道相當缺乏，頭家娘本身非管理專業出身，也只能依靠其人際網絡向其他頭家娘請教，或是遠從台灣信得過的親朋好友前往大陸工作。但這也不是解決之道，因為從台灣聘請一名台幹的薪資，可以在台大陸聘請好幾名專業經理人，而且產業要在大陸發展需本土化，廠內一些高級經理人還是要有當地人，才能處理海關、稅務等問題，所以頭家娘在公司裡還需有兩把刷子才能罩得住。

張姓頭家娘認為，

頭家娘到了大陸之後，雖然抓有財務大權但對於公司其他業務什麼都不懂，這樣很不好，以我個人為例，可能是我個性使然，我閒不下來，到大陸之後我對於公司的事樣樣都學，包括管理人員、業務．．等，雖然都不是很專，但大致上流程作業我都懂，這樣可以讓老公覺得他不在公司時，至少我還可以幫忙打理公司，他也可以安心外出打拚；而不是公司可有可無的附屬品，想去公司就去公司，雖然「錢」在妳身上但沒有實權有什麼用。

從上位幾位頭家娘訪談裡得知，在公司規模擴大後，頭家娘在公司裡只專責某個部門，也不用再到現場充當臨時的補充勞力；每天除了忙於公事外，不必再從事家務勞動，因為家事已有「家庭幫傭」取代。而且台灣中小企業外移至大陸後，企業規模及營業額都比台灣大上好幾倍，依據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公司的經營模式應朝制度化的經營，企業才能壯大。

受訪的每位頭家娘也有此概念，都覺得公司要朝制度化走，筆者實際觀察發現，頭家娘們所謂的「制度化」，就是建立一套標準遊戲規則讓員工遵守，與經濟學中所講的「制度化」不一樣。頭家娘雖然也覺得公司要壯大必須走向「制度化」管理，不能講究太多人情，但依照「制度化」的走的頭家娘卻不多，就像陳姓頭家娘在與吳姓頭家娘的交談：「公司要發展一定要走向制度化，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事事都講人情，這樣是行不通的。」當筆者進一步追問，頭家娘與頭家也照制度走嘛，陳姓頭家娘回答筆者：「怎麼可能，制度化只對員工，老闆當然可以自行調配囉！」

由這段對話可以發現，頭家娘在管理上，某種程度上採取「家計邏輯」，某種程度上則是採取「事業邏輯」。也就是說，在大陸她們是兩種制度並存，依人採取不同的方式，為了規訓大陸員工她必須用事業邏輯來打理公司，但對於一些高層台幹員工則是採取家計邏輯。頭家娘採用兩種經營模式，事實上對公司的發展有限。簡單地說，如果企業無法引進高學歷人才或是專業經理人進來，中小企業在大陸即使規模、營業額比台灣大好幾倍，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大型的「客廳即是工廠」而已，只不過把場域搬到勞力、土地便宜的大陸操作。再幾年，又得面臨產業無法生存的問題。

四、移居「頭家娘」仍掌握財務大權

頭家娘的角色往往會隨著先生事業發展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面貌。中小企業發展成一個階段之後，要朝大公司努力，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制度、專業分工。這種情形下，以前名不正言不順，靠著「人治、情治」掌理的老板娘，往往會面臨無法定位的困擾。其定位和角色，應隨著企業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改變；否則調適不好，自己不快樂，公司也會被拖累。

李文真，光華雜誌，1994

這是每位中小企業頭家娘可能面臨的問題，很多頭家娘也都深諳此理，知道公司要發展，一定要朝制度化發展，而且必須請專業經理人，用最新的管理知識，企業才能壯大。雖然大多數頭家娘都知道這個道理，但絕不會放手給專業經理人，即便是公司的帳務有請學有專長的人來做，自己還是掌控整個公司的財務。因為財務是企業營運的命脈，所以掌握財務等於掌握了公司的中樞神經(趙蕙玲，2000)。

原本到大陸之後就想退居幕後不再參與公司業務的羅姓電子廠頭家娘就指出，

本來我想退休不要再工作了，但這裡實在太無聊了，所以我跟先生商量讓我到公司上班打發時間，先生也一口答應並由我管理財務及採購，但我每天時間很彈性自由，有事隨時都可以出去。雖然我是上下班制，但每天待在公司的時間大約只有四小時。以前工作沒有薪水，現在因為公司走向制度化後，每個人都需要照制度走，所以我先生每個月給我領一萬元人民幣。

因為八字比先生來得有福氣，所以擔任公司董事長頭銜手袋加工廠蔡姓頭家娘也與受訪羅姓頭家娘一樣，只是看公司總帳，其他帳目則交給專業人員處理，有一部分則轉交給剛從國外留學回國的女兒。她說，

財務還是自己人管比較好，我們九一年把產業移至東莞時，東莞正在起步，一切都還不太穩定，當然自己人比較可靠。所以從以前到現在我一直都是在管公司財務，也沒出過什麼問題，頂多有關稅務方面的問題，花錢請專業會計師做就可以了。

另一位在大陸經營鋼構的黃姓頭家娘雖與前兩位頭家娘的情況不同，但原本不是商科畢業的她，到了大陸整個公司走向制度化後，也在公司裡擔任財務經理一職。她強調，

由於鋼構需技術，專業人才很重要，所以廠裡請了幾位專業經理人負責廠裡技術指導、管理，我先生則負責對外業務，而我則是主管財務。雖然我和我先生一個是董事長，一個是財務主管，但我們仍是依制度做事，每個人都得依公司規定的「制度」走，沒有人可以例外。

上述這幾位頭家娘雖沒有會計背景，但是她們卻憑藉著過去管理財務的經驗，擔任公司的中樞神經。產業移往大陸後，由於剛到大陸創業的頭家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頭家娘或是親友成爲最信賴可靠的人；在筆者訪談的十位頭家娘中，大約只有二、三位頭家娘具有會計、商學背景，對於公司壯大後煩瑣的海關、稅務等各種帳務，較爲熟悉外，其餘頭家娘還是得依賴專業人士的幫忙，但她們在公司仍掛名「財務經理」的頭銜。

不過，這種情況也可能隨著企業不斷地壯大及熟悉當地的文化之後，頭家娘在企業裡的地位角色會漸漸改變，有些人也可能將自己的棒子交給兒女，或是自己信得過的人，自己則退居幕後當「藏鏡人」。在呂玉暇(2001)的研究中也發現，企業組織愈正式化，愈多依賴制度化的運作，制度化所帶來的權責劃分將使老闆娘的責任範圍減少，決策權力也隨著減低。

第二節 分偶頭家娘的角色轉換

從上面的訪談中不難發現，隨先生移居大陸的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並沒有因為產業的外移而退位，反而還位居公司內要職，並且掌握企業的命脈—財務。但分偶家庭的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產生變動比移居家庭來得大，以下本節內容將從她們為什麼留在台灣以及她們是否乃掌握財政兩個問題面相進行分析。

東莞有三千多家台商，眷屬一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五，台商隻身在外，子女因乏人管教、配偶因長期孤單，造成不少家庭及社會問題。到大陸已有十餘年的一位台商感慨地說，台商眷屬為什麼不願意來，當然因素有很多，但大部分眷屬是因為大陸治安、醫療條件不佳及大陸教育品質不佳等原因。

光華畫報雜誌，2000

其實，很多頭家娘並不是不願追隨先生移居大陸，但為了小孩教育問題及家有年老父母需奉養，只好留在台灣形成分偶家庭。分偶家庭最早發生在中小企業的家庭，這些在台灣時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的家庭企業，因為國際分工形勢的改變及整體產業結構的改變，產業不得不隨著資本的流動而遷移；由於 80 年代初期，大陸政經環境不穩，加上小孩教育等種種問題，大多數家庭企業都是採取大陸製造、台灣出口的模式，因此，頭家娘留守台灣除了照顧小孩外，一方面也在台灣負責接單、出貨等工作。

原本頭家娘留守台灣還可以幫忙公司業務，但漸漸地，大陸公司業務上軌道之後，台灣的業務也結束，加上孩子大了也都送往國外唸書，一下子失去生活重心，許多頭家娘都不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筆者在針對國內五位未隨先生前往大陸之頭家娘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到這些過去做得要死要活的頭家娘，對於突然變得清閒起來，有點不太習慣，而且心裡也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在針對分偶家庭的研究上也發現，家庭成員各自發展出獨立的人際關係、不再分享共同的生活經驗以及婚姻關係的名存實亡等現象(Chang,2000，引自王君琳，2001)。

一、為什麼留在台灣

在探討這些頭家娘為什麼留守台灣問題前，在此先對分偶家庭做個解釋，分偶家庭是指夫妻兩人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區的家庭型態。它與一般家庭不同之處在於，共同生活家庭成員的改變如先生經常不在家，長期分離的情況下，

常面臨家人間因缺乏聯繫進而造成人與家庭斷裂的危機(王君琳, 2001)。

當初因為家中有老母幼兒需留下來照顧, 先生獨自一人前往大陸從事電品業的 S 姓頭家娘就表示,

我也知道夫妻不能分開隔兩地, 可是沒有辦法呀! 因為我們很早就把產業移至大陸去了, 那時候, 台海兩岸的情況很不穩定, 但為了生存不得不前往大陸。那時也有很多朋友勸我跟先生一起到大陸, 小孩再請託家人幫忙就可以了。這怎麼可能, 我娘家住在北部, 況且我婆婆又沒人照顧, 我先生很孝順怎麼可能放下她媽媽。

剛開始也隨同先生前往大陸設廠以經營玩具業的 L 姓頭家娘則無奈地說,

小孩還小沒有辦法, 雖然每隔二星期回來一趟, 但我看到小孩漸漸與我疏遠而且行為怪異, 就覺得很不忍心。記得有一次我回台灣看我小孩, 唸國小三年級的女兒告訴我「我們可以省一點啊! 我不要你們到大陸, 這樣都看不到媽媽。」聽到女兒這樣說, 我心都軟了, 當下就決定留在台灣照顧孩子, 等小孩大一點, 再過去也不遲。

另一位先生在大陸經營燈罩的 K 姓頭家娘, 則是因為婆婆認為女人就應該留在家裡照顧小孩, 先生出去打拚養家就可以, 不准她隨先生前往大陸。她指出,

幾乎很多女人會留在台灣還不是為了小孩及婆婆, 不然有誰願意讓家庭四分五裂。說實在的, 雖然我先生也是經常回來啦! 可是小孩與他之間的互動就不像以前這麼親密, 而且很多事也不太敢跟他講, 所以他也覺得自己在家裡的位置被我取代了。

其他兩位頭家娘留在台灣的原因也與上述三位頭家娘差不多。頭家娘留守台灣未隨著資本流動而移居大陸, 絕大多數主導權都是在男性身上。也就是說, 即使女性認為自己也很想到大陸, 但是男性就會認為, 女性應該回歸家庭以照顧小孩為主, 以前在台灣可以參與公司業務是因為女性隨時可以充當補充勞力, 替公司節省人力成本; 到了大陸之後, 因為勞力便宜, 頭家娘不必再參與勞動, 但礙於政經環境不穩, 頭家娘還是留在台灣比較好。

從這個邏輯來分析, 即使在工業社會裡, 女性的地位還是受到壓抑。隨著環境變遷, 雖然機器解放了婦女的傳統勞力角色, 理應婦女可以走出傳統, 以事實的需要要求男女平等, 但在觀念上、法律上、政策上、教育上、就業上仍阻礙著婦女新角色的發展(李元貞, 1983)。國內相關研究指出, 工業化的發展使得婦女

在社會上地位提高了，家務也趨向簡化及家庭部分功能專業化；相夫教子不再是婦女唯一的職責，男性也不是家庭唯一的負擔者。但從上述分偶家庭頭家娘實際的生活經驗來看，好像剛好相反，當家庭事業發展的某個階段，回到家裡當個家庭主婦才是她唯一的職責。

二、杯酒釋兵權

如前所述，移居頭家娘到大陸之後，因生活太無聊，或頭家還是覺得自己人較可靠，··等各種因素，大部分頭家娘還是掌控企業的中樞神經(指財務)，但對於分偶頭家娘來說，那可不一定，因為兩岸相隔這麼遙遠根本管也管不到，因此由台灣請親友到大陸管帳。目前在大陸有好幾家工廠以經營電器產業的 Y 姓頭家娘就說，

我先生剛到大陸時因為對大陸的政策不了解，所以我們是採取大陸製造、台灣接單、出貨三角貿易的模式，所以我就在台灣管理帳務；後來因為這樣很麻煩，於是我先生就告訴我乾脆找一位親友的小孩懂會計的到大陸記帳，而我則只要負責總帳就好了。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年，這幾年因為在大陸工廠愈擴愈大，加上公司營運方針朝多角化經營，必須請專業經理人，所以我先生就叫我安心當少奶奶不用再管公司的事。

這位頭家娘表示，「想想也是啦！我嫁給他十幾年，一直都忙於工廠業務，從來沒有好好享受過，現在公司穩定了，我只要把家裡照顧好就可以了。有時間還可以去學學東西也不錯，而且當初會這麼努力工作，還不是希望自己有這麼一天。」

先生在大陸做成衣業的 Z 姓頭家娘則認為，

我的學歷不是很高，也不懂管理啦！以前會做這些事是因為自己家裡的事業多少幫忙，而且人少記流水帳還可以；現在大陸企業這麼大，帳目這麼多，我實在無法應付；我先生也是這麼說，而且他都有把賺的錢拿回來給我，買土地也都用我的名字，這樣我就覺得很好了，不用一定要管財務。女人，最好就是把家裡跟小孩打理好了，這樣先生才能在事業上往前衝啦！

受訪 L 姓頭家娘則不認為自己在企業壯大時，無法勝任財務的工作。她說，

我一直有跟我先生溝通，請他讓我回到公司做事，雖然我們公司現在有一些小股東，但他總是拿他們當藉口，說這樣人家會說話，其實這些股東都是我

們自家人，有誰會說話。他又拿出別的理由來搪塞我，等孩子大一點再讓我回公司上班；現在孩子也大了，這下子他又說我太久沒有接觸，很難進入狀況。而他也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一定要工作，不在家裡當少奶奶不是很好嗎？因為每次談到這個問題我們都會吵架，最後就不談了。

從五位頭家娘訪談內容分析發現，分偶家庭中的頭家娘，過去雖然也具有某些才能，因資本移出而被迫留守台灣，但她們的生活情境並不若國內相關研究中指出，分偶家庭的婦女在先生遷移至大陸後，生活空間更大、自主權也較大(王君琳，2002)；而筆者所研究的分偶頭家娘的生活反而較像十七世紀歐美國家婦女的處境，先生在取得財富後，將中產階級及大資產階級的婦女趕回家，婦女則被禁錮家庭裡擔任家務工作及教育子女的角色裡。兩者研究有如此大的差異，筆者認為可能與取樣有關，因為筆者研究對象是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且都從事傳統產業，而且年齡上比較大、觀念上也較保守，與一般台商太太因為先生被派駐到大陸的境不一樣。

第三節 小結

由上述論述中發現，移居頭家娘與分偶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地位，隨著資本的流動而產生一些變化。就移居頭家娘為例，過去她在家庭事業裡的角色位置是家庭領域的延伸，所以她必須同時扮演多重角色及無酬的家屬工作者；產業外移後，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不再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也不再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及「家庭場域」，只單純立足於「經濟場域」，而且是個有酬的工作者。

移居頭家娘在企業裡不僅是個有酬工作者，她還握有經濟大權，在經濟上不需依賴頭家；在田野訪談中也發現，移居頭家娘即使因為公司與人合資，不再參與公司業務，但她將自己過去累積的經驗，自行開店當老闆。這個發現與國內相關研究論述推論的結果一樣。而這種角色地位的轉變到底是地位上升還是下降？從經濟支配的角度來看，雖然頭家娘與過去一樣具有握有經濟大權，但大部分的主要經濟決策力還是在頭家身上，頭家娘只是居於商量地位角色；產業移居大陸後，頭家娘雖也握有財政大權，但實際在企業裡經濟決策權包括企業擴張、購買儀器等還是在頭家身上，而頭家娘在家庭的經濟決策力上則具有一定的決策力。也就是說，產業移往大陸後，移居頭家娘在經濟決策力上比在台灣時來得大，就某種程度來看，其地位是上升的。

從事手袋加工業的張姓頭家娘就是明顯的例證。以前，在台灣時，張姓頭家娘雖然也管理公司財務，但也只是當「過路財神」，家裡要支配一些錢還是得經過先生，在經濟上並沒有絕對的自主權。移居大陸後，大陸勞工便宜，她雖然還管理財務，但也只是看總帳，其他的帳目則請會計小姐幫忙，所有的錢入她台灣的戶頭。張姓頭家娘表示，還好當初我把所有的錢入我的戶頭，不然現在他跟大陸妹跑了，那我不就人財兩失。

所以大部分移居頭家娘都會把帳轉入自己台灣的戶頭，以免先生包二奶之後，自己辛苦了大半輩子，等到享福時卻由別人接收。所謂的「經濟權力」是指女性(相對於男性)控制主要經濟來源，包括收入、財產或其他生產工具，以及控制所得的分配程度(Blumberg 1984)。從這個角度分析，移居頭家娘在經濟力上不需依賴先生，所以其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應該是上升的。

至於分偶頭家娘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位置，因時空的關係無法再參與及掌握公司業務，完全退居家庭當賢妻良母。過去她們在家庭裡雖沒有經濟決策力，但因握有經濟大權知道整個財務狀況，產業移至大陸後，因為相隔太遙遠，無法再掌握公司的財務，在經濟上只能依賴先生。雖然分偶頭家娘在地位上能享有高級的生活，但對經濟資源不再享有直接的支配權，從經濟支配權的角度分析，其在企業裡的角色地位是下降的。

馬克思女性主義者強調，女人在家中受到剝削有利於資本主義；而基進女性主義則強調，這種剝削有利於男人，因為在父權體制下，他們可以享受女人的無償勞動。但這兩派女性主義者都相信，家庭壓迫女人，女人在家中受到剝削與支配。她們認為，女人在家庭裡身為妻子／母親的地位，使得女人被男人／父親所支配；這種狀況至少有部分原因出在女人在經濟上必須依賴男人。(Abbott and Wallace, 1995)。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更認為，女人在經濟上依賴男人，從而使得她們在家庭中受宰制與剝削，正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但社會主義女性學者認為馬克思女性主義太過強調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沒有認知到性別體制乃是獨立於階級之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馬克思女性主義太過強調資本主義，無法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將女性分派於家庭，男性則分派於工作場域的原因(Tong, 1996)。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為女人之所以受壓迫，不只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同時也來自於父權體制的壓迫。依此據論，分偶頭家娘的處境則是資啞流動及父權體制共同壓迫衍生的結果。

第五章 生活起了什麼變化？

由一群來自台灣台商太太成立的「太太俱樂部」，平日除了開辦國畫、書法、插花、韻律操等才藝班外，也會帶一些日用品到鄉下訪貧，或者去敬老院做義工，幫老人們剪剪指甲……這些太太們移居大陸後，不必再像一般家庭主婦下廚沾滿一身油，空閒的時候就與社區內的台商太太一起學壓花、打太極拳。

商業周刊，2001

關於台商太太到大陸生活情境的報導，近幾年來常見諸各報章媒體。一般人對於「台商太太」也總是投以羨慕的眼光，認為只要到大陸即使只是做個小生意，也可能讓自己的階級躍升。這種情況有點類似台灣早期人人都想當老闆的年代，為擺脫勞工階級只要身邊有一點錢，再藉由過去累積的社會網絡，自行出來開工廠當老板；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在各項成本上漲及市場有限的情況下，自行創業當老闆不易生存，因此想要階級翻身只好朝向市場比台灣大好幾十倍，勞力及土地成本便宜的中國大陸。

長期研究移民問題的台大社會學教授曾熾芬表示，相對於台灣，美國是經濟較好的國家，除了技術人才專業移民能在美國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較好的生活品質外，一般中產階級移居美國都有「向下流動」的現象，也就是成了下層社會的一員，很多大學教授到美國開餐館就是例子(商業周刊，2001)。而台商到消費、所得比台灣低的大陸，是否有「向上流動」的現象，也就是說，原本在台灣為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企業頭家娘到大陸後，其階級是否有「向上流動」的現象？這可能需從較多的經驗研究中才能知道，單從生活狀況來看確實有「往上流動」的現象，但這種流動純粹只是因為當地廉價的勞力成本所致，還是與資本結構有關，需做更多的研究才能發現。

從消費面來看，移居頭家娘到大陸之後，她們的階級確實有往上流動的情形。因為大陸的消費低，中小企業到大陸之後，可以用很便宜的錢雇請傭人，企業台商在大陸每個家庭裡至少都有一位廚師、一位管家及一位司機。對許多女性而言，成為「主婦」，意味著階級地位的提昇。而對男性來說，建立一個雇請傭人，妻子不必再做家事的家庭，也成為其所屬階層的地位象徵(status symbol)。日本即使在今天，對於想結婚成為主婦的女孩子來說，「成為主婦」意味著階級地位的提昇(上野千鶴子，1997)。Finch(1983a)也曾表示，女人經常迫於經濟需要

而結婚，男人則是從婚姻中得到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優勢。這與台灣傳統價值觀念認為，女人最好的八字就是擁有美好的歸宿，婚姻可以讓女性擺脫原有自身的階級。

移居頭家娘到了大陸之後，雖然不用工廠、家事兩頭忙，但她們在精神上也面臨極大的壓力如社會網路的斷裂、生活環境的不安定、生活苦悶．．等。以下本章節將從頭家娘到大陸後生活上起了哪些變化？及其所面臨的困境，等面向作進一步分析探討。

第一節 移居頭家娘的生活變化

家庭企業主的另一半頭家娘放棄自己原來的職業，投入非自己本業的技術工作，為企業勞心勞力，無非是希望有一天先生能爭氣，等事業成長、有錢有閒了以後可以喘一口氣，那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而產業外移至大陸的頭家娘，雖然仍須看頭看尾看管公司，但因大陸勞力便宜，幾乎所有的企業家裡都有二至三位的阿姨為其代勞家務及照顧小孩的工作，不僅如此，出門也有專屬司機陪同。一位受訪的張姓頭家娘即對筆者表示，到大陸之後，我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

一、家務勞動有人代勞

無論是中小企業頭家娘或是台幹型的台商太太，移往大陸後最大的改變就是不用再做家事，可以過著如少奶奶般的生活。受訪黃姓頭家娘即表示，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到了大陸之後，因為勞力便宜所以可以請很多幫傭，不用做家事變得更好命了。與台灣比確實到了大陸比較好命，但因為在台灣剛創業時，正好是我剛懷孕、生產階段，加上公司又忙請不到員工，所以每天從早忙到晚，很累很辛苦；到了大陸之後，最明顯的變化是不再做家事，出門有司機幫妳開車，一些需要勞力負擔也比台灣少很多。

因公司與人合資為避嫌而不必再到公司幫忙吳姓頭家娘，比其他頭家娘更好命。平日除了睡覺睡到自然醒外，偶而則到自己開設的茶園走動走動，她說，

我剛到大陸時，生活很輕鬆、自由，不用做家事，出門又有司機，過著少奶奶般的生活，可是很無聊，生活裡除了老公、小孩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不像在台灣心情不好，或是想透透氣時可以找個朋友出來喝下午茶、逛街，但在大陸沒有地方可去，加上治安不好，每天除了待在家裡還是家裡。

在公司也擔任財務經理的陳姓受訪頭家娘也表示，

我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一星期偶而二、三天待在公司處理事情，其他時間則跑出來找人聊天。她說，在大陸比在台灣輕鬆多了，小孩也大了，不需要妳操心，家裡又有人幫妳打理得好好的，至於公司，只要打點好有重要事情員工會用手機連絡我，所以沒事時要多出來走走，不然在這裡生活是很苦悶的。

第一節 移居頭家娘的生活變化

家庭企業主的另一半頭家娘放棄自己原來的職業，投入非自己本業的技術工作，為企業勞心勞力，無非是希望有一天先生能爭氣，等事業成長、有錢有閒了以後可以喘一口氣，那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而產業外移至大陸的頭家娘，雖然仍須看頭看尾看管公司，但因大陸勞力便宜，幾乎所有的企業家裡都有二至三位的阿姨為其代勞家務及照顧小孩的工作，不僅如此，出門也有專屬司機陪同。一位受訪的張姓頭家娘即對筆者表示，到大陸之後，我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

一、家務勞動有人代勞

無論是中小企業頭家娘或是台幹型的台商太太，移往大陸後最大的改變就是不用再做家事，可以過著如少奶奶般的生活。受訪黃姓頭家娘即表示，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到了大陸之後，因為勞力便宜所以可以請很多幫傭，不用做家事變得更好命了。與台灣比確實到了大陸比較好命，但因為在台灣剛創業時，正好是我剛懷孕、生產階段，加上公司又忙請不到員工，所以每天從早忙到晚，很累很辛苦；到了大陸之後，最明顯的變化是不再做家事，出門有司機幫你開車，一些需要勞力負擔也比台灣少很多。

因公司與人合資為避嫌而不必再到公司幫忙吳姓頭家娘，比其他頭家娘更好命。平日除了睡覺睡到自然醒外，偶而則到自己開設的茶園走動走動，她說，

我剛到大陸時，生活很輕鬆、自由，不用做家事，出門又有司機，過著少奶奶般的生活，可是很無聊，生活裡除了老公、小孩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不像在台灣心情不好，或是想透透氣時可以找個朋友出來喝下午茶、逛街，但在大陸沒有地方可去，加上治安不好，每天除了待在家裡還是家裡。

在公司也擔任財務經理的陳姓受訪頭家娘也表示，

我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一星期偶而二、三天待在公司處理事務，其他時間則跑出來找人聊天。她說，在大陸比在台灣輕鬆多了，小孩也大了，不需要你操心，家裡又有人幫你打理得好好的，至於公司，只要打點好有重要事情員工會用手機連絡我，所以沒事時要多出來走走，不然在這裡生活是很苦悶的。

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問到這些頭家娘認為到大陸之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幾乎每個頭家娘說是家務勞動。她們並認為，「頭家娘」這個稱號在台灣跟「老媽子」沒有兩樣，每天忙得團團轉，累得要死，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到了大陸之後才真正享受到當「頭家娘」的滋味。張姓頭家娘率直地表示，

很多頭家娘到大陸不到一星期都快瘋了，根本呆不下去；雖然我也不太適應大陸的生活，可是想想既來之則安之，而且在大陸回到家不用做家事，過著慈禧太后般的生活，不像在台灣名為頭家娘，回家後還要當老媽子做家事，在大陸才能當真正的頭家娘，回到家可以指揮別人做事。

受訪蔡姓頭家娘也覺得，到大陸之後生活上最大的改變就是，回家後不用再做家事。她表示，

到大陸以後命比較好，因為這裡人工便宜嘛，所以家裡的事有人代勞，不像以前在台灣每天從早忙到晚，回家後還要幫小孩洗澡，餵小孩吃飯，煮飯、洗衣……等，有一堆家裡的事等著妳回家做，幾乎沒有什麼休閒時間。現在孩子也都大了，可以幫忙公司業務，家事也有人代勞，也不用下廚做飯，只是偶而小孩想吃點台灣口味菜，我就下廚露兩手，其他的時間我幾乎都是很彈性、自由。

因為在大陸可以享受上層社會的生活，而已經在大陸置產的羅姓頭家娘及林姓頭家娘則把大陸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了，現在回台灣則是回去渡假。林姓頭家娘表示，

我已漸漸習慣大陸的生活，妳相信嗎？我一年回去不到兩次，不像一些台商太太每個月回去一次；在這裡雖然很忙，但也比較有時間從事休閒活動，像我先生更自由，因為他董事長嘛，不像我總經理還要負責業務及財務，沒有他來得空閒。現在我們每個星期三上午都會和朋友一起去打高爾夫球，其他時間則是自行調配，如到婦聯會參加一些活動，找朋友喝茶、聊天交換心得。以前在台灣那有這麼好命，即使不用再參與勞力工作，因為工資較貴，回家後還得自己帶小孩、洗衣、燒飯；在這裡，回到家後可以指揮別人做事，而且溝通上不會有什麼困難。

但並不是每一位頭家娘都覺得自己在大陸過著如少奶奶般的生活。劉姓頭家娘即表示，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來這邊當少奶奶，人工便宜所以可以請好幾個阿桑，每天翹著二郎腿指揮阿桑就可以了，其實剛來頭幾年是很辛苦的，比在台灣時還

累，唯一的好處就是回家後不用再做家事，不過也得在一旁監督，因為這些阿桑都是從內陸來，根本不知道如何用電鍋等電器用品，還得要我教她們如何用呢？

上述幾位頭家娘講述她們在大陸生活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必再參與家務勞動，而在前面論述中也提到，傳統女性對於自己能成為「主婦」，不必做家事代表其階級地位的象徵。所謂的「主婦」是指原本需在「私領域」及「公領域」從事生產及再生產的工作，當有一天另一半事業有成之後，就可以回到家庭做少奶奶。十七、八世紀歐洲婦女中產階級婦女由職場回歸家庭，就是因為資本主發展為其先生積累大量財富，男人為彰顯其階級地位希望另一半遠離商業活動，回到家庭裡專心擔任「主婦」的角色。

在傳統價值裡認為，男性可以經由教育改換出身，但女性則只能靠結婚這個機會，才能重新選擇自己所歸屬的階級。頭家娘就是屬於這類型的女性，期望有一天先生事業做大後，自己就能享福，擺脫勞工階級。因此，創業初期頭家娘為降低人事成本，原本擔任只是扮演「家庭領域」角色的頭家娘，再把角色由「家庭」裡再延伸至頭家的「事業領域」中，同時扮演生產及再生產的角色。

二、生活苦悶

不像別的頭家娘住在工廠裡，自行蓋別墅，家裡聘請二位管家，三位保全人員及一位司機的羅姓頭家娘表示，「我在大陸簡直過著少奶奶般的生活，到公司上班只為打發時間而已」。她說，

雖然家裡有兩個管家，可是剛到大陸時，我很不習慣，因為我先生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應酬，我一個人在家很無聊，每天晚上就面對電視，時間多到不知要做什麼，即使一個人想出去逛逛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每天就無所事事，除了電視還是電視，先生白天忙公司的事，晚上則是應酬。本來我想退休不要再工作了，但這裡實在太無聊了，所以我跟先生商量讓我到公司上班打發時間，先生也一口答應並由我管理財務及採購，但我每天時間很彈性自由，有事隨時都可以出去。

受訪的羅姓頭家娘說出了許多頭家娘的心聲，到大陸的頭家娘因為與原本的社會網路切斷，生活很苦悶，不像在台灣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以到百貨公司逛逛，在這裡頭家娘白天除了面對工廠裡的員工外，晚上還要擔心員工是否是會發生事情。

劉姓頭家娘指出，

來到東莞的台灣婦女有很多委曲是說不出來的，精神壓力很大，生活很苦悶，除了擔憂自己的先生跑掉外，還要擔心員工的安全問題。有時下了班還要陪客戶，嚴格算來一天上班的時間很長的。所以啊！在別人的眼裡我看起來可能很輕鬆，實際上精神壓力很大的，盯訂單、帳款催收、員工吃飯等都要找我，還有其他廠房設置，每天忙得根本沒有什麼空閒時間，還好小孩已經大了，不然很對不起他們。

婦女到了大陸之後，不像在台灣時到處都能去，又可與親朋好友聯繫，加上東莞市工業區分散各地，交通不便，加上資訊匱乏，婦女幾乎所有對外聯絡全仰賴先生，除了跟有生意往來的中上下游廠商認識外，幾乎很少與其他人往來。不像上海、蘇州等大城市地區，交通便利，即使先生每天忙於工作，太太還是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隨先生到東莞創業的頭家娘剛到大陸時，大多不太能適應當地枯燥乏味的生活，所以大部分頭家娘投入工廠主要是爲了打發時間。

原本也是爲打發時間而到公司上班的張姓頭家娘表示，

來這裡的婦女更是可憐，因為這裡近幾年才發展起來，較有地方逛，剛開始時，來這裡的婦女簡直是被關在工廠裡，沒有地方可去，一個人整天待在家裡不知要做什麼，除了工廠還是工廠，加上治安不好很少人會出去逛，除非到一些台商家裡串串門子。

已漸漸將事業交給小孩的蔡姓頭家娘則強調，雖然我對於廠裡的事已不太插手，但因為實在太無聊了，她每天早上還是到各個廠區巡視。她說，我小孩都勸我說：

不要這麼累了，可以去學一些東西，但是沒有辦法啊！我是勞碌命以前忙慣了，一下叫我不做事怪怪的，而且這裡沒有地方去，只好待在工廠裡，這樣腦筋也較不會生鏽。而且我現在時間較彈性、自由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偶而與幾個姐妹淘約了就出去逛逛或是串串門子，彼此交換心得。

頭家到大陸後，雖然在精神上比在台灣時承受更大的壓力，但他們晚上與客戶出去應酬時，可以藉由喝酒、唱歌紓解壓力。但頭家娘只能被關在工廠裡，不知找誰聊天、訴苦，所以剛開始時常會與先生發生口角。

個性活潑的林姓頭家娘即表示，

很多隨先生來這裡的太太都常跟先生吵架，因為先生常應酬自己一個人待在廠裡很無聊，其實生活空間是需要自己找到。在這裡最重要的是要有朋友，所以我們經常邀一些夫妻檔一起出遊，一來可以減少先生到酒店應酬的機會，兩來可以增進夫妻感情。

三、移居頭家娘精神壓力大

頭家娘在大陸除了生活苦悶外，在精神上也面臨很大的壓力。以前她們可能擔憂請不到員工、資金調度，現在則操心沒有訂單、業務等問題，尤其是管理更是一門大學問。以前在台灣是硬著頭皮學技術，現在則學管理，不同的階段所學的事物也不同。劉姓頭家娘強調，

以前在台灣是勞力，現在在大陸則是勞心，精神壓力很大，雖然大陸勞工便宜但他們做事效率真的很差，台灣一個人可以抵他們四個人，而且大陸勞工不好管理，在管理上需花相當大的心思，有時把他教會了，他就跳槽到別處去，有時即使是熟手隨時也會給你吐槽。他們必須用軍事化的管理，因為他們不會變通常常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且產品品質無法保證，隨時都得盯緊，不然有時吐槽品質不好不但交不了貨，還會影響到廠商下訂單，所以在品質把關上要做得很好，在台灣就不用有這方面的顧慮。

員工管理讓頭家娘感到壓力大外，另一個最令頭家娘感到「驚驚」的是大陸政策搖擺不定。羅姓頭家娘表示，

以前在台灣是勞心、勞力，現在到大陸則是精神壓力大，婦女們在此都很苦悶，所以大家常聚在一起尋找樂子，不然日子怎麼過啊！我所說的壓力不只是指生活上不若台灣方便而已，而是這裡員工管理及治安常是令人感到惶恐不安，所以我們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談談去哪裡玩外，也交換一些工廠管理，海關稅務上的問題，或是大陸又有什麼新政府。訊息掌握是很重要的，不然在大陸做生意很可怕也很危險，在這裡常聽到 xxx 進關時，突然就被海關帶走不能碰面。．．．平日大家相互交流可以提供訊息，才知道公司在運作時不能做哪些事，以免重蹈覆轍。

受訪蔡姓頭家娘也有同樣的感覺，她說，

我以前總是擔心公司沒有訂單、錢周轉不過來或是找不到員工、公司沒賺錢、小孩會不會學壞等，現在小孩都在身邊，公司也穩定下來，沒有什麼好擔憂的，唯一要擔憂的怕大陸政策搖擺不定，資金收不回來及公司未來的經營方向。其實我們精神壓力也很大，怕不知何時隨便被亂扣個罪名，而被抓去關。而且受到全球景氣不佳的影響，來到大陸的產業也受影響，大家都覺得生意愈來愈難做，加上大陸政策非常嚴格，一旦公司周轉不佳，馬上就會封廠，所以每位台商的壓力都很大。

第二節 女人撐起半邊天？

人家說「女人撐起半邊天」，這句話用在中小型企業頭家娘身上再恰當不過。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頭家娘到大陸之後雖然生活上比較好命，不用再操勞家事及照顧小孩，但她們在大陸所承受的壓力並不亞於頭家。她們不像頭家下班後，可以與公司其他管理階層到酒家尋歡作樂或是與其他台商打打高爾夫球；頭家娘下了班如果小孩不在身邊，則是一個人關在工廠住家內看電視，哪裡也不能去。因為頭家認為，社會治安不好而且婦女本來就應該待在家裡，男人出去是為事業打拚。

上一個章節中也提到頭家娘到大陸之後必須忍受生活苦悶及精神等雙重壓力。有些人因無法承受壓力而罹患憂鬱症。到大陸前在高雄大社開西裝套、洗衣網等加工廠的張姓頭家娘即表示，「在台灣，我們工作忙雖忙，但假日我們一定會陪孩子出去玩。但到大陸之後，全家沒有一起吃過一餐，認為到大陸設廠，對家庭親情絕對是犧牲的。」這位頭家娘有感而發地表示，在台灣，頭家娘不需任何專業知識，到了大陸之後，頭家娘雖然不必參與現場工作，但擔心的事情更多，反而是頭家比以前更輕鬆。

因為婦女在大陸無處可去，生活苦悶、精神壓力大，又找不到宣洩管道，東莞台商協會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大陸第一家台商婦女聯誼會組織「東莞台商協會婦女聯誼會」，為台商太太提供一個出口。該會成立會後婦女發揮「半邊天」的作用，協助市台協會展開了多項重大活動，包括廣東省台商投資洽談會、廣東省招商會、海基會大陸台商座談會、市台協周年慶典、組織義工隊參加子弟學校建校、組織會員參加各種才藝研習等。

一、頭家娘為打發時間，學習才藝

頭家娘到大陸之後，時間變多了，雖然有時還要負責公司業務，但因為自己不用再大小事一手包辦，而且家裡的事又不用自己做，加上這裡很無聊，大家就更有時間學習一些東西如插花、國畫、彈古箏、舞蹈．．等。婦聯會幫婦女生活增添樂趣，紓解壓力也開辦一些課程讓婦女學習。

一位前婦聯會理事長表示，

幾乎參加婦聯會的婦女都要學習這些課程，除了打發時間，增加生活情趣外，最主要的是台商協會在舉辦活動時，婦女可以將平日所學的才藝搬上檯

面。讓大陸官方知道頭家娘不為人知的一面。

對插花、彈古箏等才藝不太感興趣的楊姓頭家娘坦言，

學這些東西純粹是因為我是婦聯會發起人，自己不得不帶頭做。其實，我每天忙得要死，哪有時間學這些東西，但我每星期還是得抽出時間到婦聯會學東西。

在一旁的黃姓頭家娘則接著說，

來這裡的台商太太很辛苦也很能幹，要忍受寂寞外，還得學習各種事物，除學習國畫、插花、跳舞外，也要學習企業管理課，畢竟企業管理是以前從不會碰到的問題，到了大陸之後，幾乎所有人的公司規模都變大了，管理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不然很難管。其實婦聯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處理婦女心理及情緒問題。

從小就想成爲一位鋼琴家的羅姓頭家娘，沒想到這個夢想到了四十歲還能實現，她說，

平日我到公司上班外，也去學鋼琴、插花、打高爾夫球、跳交際舞，完成自己以前的夢想。像彈鋼琴，從小我就很想學，但當時的環境不允許，沒想到四十幾歲了才有機會實現。剛開始時，我原本不敢嚐試，我看到一位企業老板娘在彈琴，也很想學，我就問她已經四十幾歲了還可以學嗎？她說：爲什麼不可以，只要你有心多大年紀都可以學。於是我就報名去學鋼琴，還買了一台高階才用得到的鋼琴回家放，激勵自己學習。

受訪林姓頭家娘與羅姓頭家娘一樣也曾夢想當個多才多藝的才女，但因家境環境不允許，她只好認命，並把小時候的這個願望轉嫁到她女兒身上。移居大陸後，因爲時間變多了，她也跟其他頭家娘一起去學習才藝。她說，

到了大陸之後，我比較好命，也比較輕鬆，隨時都可以出國玩或到國外找小孩，私人生活空間比以前大許多，閒來沒事則找朋友出來喝喝咖啡，或是學學古箏、國畫，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不過這些事都是自己的興趣，以前則是爲賺錢。像我從以前就想當才女，這個夢想到現在我才有能力一一實現，如果我是個家庭主婦永遠不可能實現它。

她並進一步強調，幸好婦聯會成立，讓這些婦女更有自己的空間，大家彼此相互認識、幫助，無聊時出來一起聊天解解悶。或是辦一些活動，讓婦女學習一些如跳舞、古箏、插花、國畫等活動，展現女性柔性的一面。

黃姓頭家娘認為，到了大陸以後真的比較輕鬆、好命，以前台灣比較辛苦，剛開始三、四年還得親自下場教導員工模具技術的劉姓頭家娘則表示，

剛開始來時，我根本不知道要到哪裡逛街，也沒有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班還是上班。剛來前幾年我幾乎都是在工廠裡，然後每隔一、二個月回去一趟看小孩，等到公司員工都比較穩定，並請了一些台幹來做廠務管理之後，人家才告訴我：「台商協會底下成立了一個婦女聯誼會，妳可以去參加學一些東西，交交朋友，才不會無聊。」我才開始走出去參加台商協會成立的婦聯會學插花、跳舞等，增加生活樂趣。

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至少我還有時間可以去學英文及跟我女兒一起學鋼琴，在台灣連看報紙的時間都沒有。蔡姓頭家娘則再三強調，大陸實在太無聊了，大部分頭家娘都會學習一些東西，像插花、國畫、跳舞等啦！以前在台灣想學都沒有時間，到大陸之後，時間太多，才有消磨時間，機會學。

剛開始三、四年還得親自下場教導員工模具技術的劉姓頭家娘則表示，

剛開始來時，我根本不知道要到哪裡逛街，也沒有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班還是上班。剛來前幾年我幾乎都是在工廠裡，然後每隔一、二個月回去一趟看小孩，等到公司員工都比較穩定，並請了一些台幹來做廠務管理之後，人家才告訴我：「台商協會底下成立了一個婦女聯誼會，妳可以去參加學一些東西，交交朋友，才不會無聊。」我才開始走出去參加台商協會成立的婦聯會學插花、跳舞等，增加生活樂趣。

爲了打發時間，大部分到大陸的婦女都會參加類似的組織，學習一些東西，增加生活樂趣。由於外界對台商太太在大陸成立的「聯誼會」解讀是爲監督先生，避免先生「包二奶」的一支掃黃隊，爲婦女提供才藝學習只是一個表面藉口而已。對於外界的批評，現任婦聯會會長黃素妙表示，

當初婦聯會成立的宗旨是讓婦女有一個交流的場所，並不是外界所言是「掃黃隊」？「坦克車」？我們只是站在輔助台商協會的立場，展現女性柔性的一面，並不是外界所言我們成立婦聯會主要目的是監督先生的行蹤。

她並進一步強調，幸好婦聯會成立，讓這些婦女更有自己的空間，大家彼此相互認識、幫助，無聊時出來一起聊天解解悶。或是辦一些活動，讓婦女學習一些如跳舞、古箏、插花、國畫等活動，展現女性柔性的一面。

黃姓頭家娘認為，到了大陸以後真的比較輕鬆、好命，以前台灣比較辛苦，剛開始三、四年還得親自下場教導員工模具技術的劉姓頭家娘則表示，

剛開始來時，我根本不知道要到哪裡逛街，也沒有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班還是上班。剛來前幾年我幾乎都是在工廠裡，然後每隔一、二個月回去一趟看小孩，等到公司員工都比較穩定，並請了一些台幹來做廠務管理之後，人家才告訴我：「台商協會底下成立了一個婦女聯誼會，妳可以去參加學一些東西，交交朋友，才不會無聊。」我才開始走出去參加台商協會成立的婦聯會學插花、跳舞等，增加生活樂趣。

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至少我還有時間可以去學英文及跟我女兒一起學鋼琴，在台灣連看報紙的時間都沒有。蔡姓頭家娘則再三強調，大陸實在太無聊了，大部分頭家娘都會學習一些東西，像插花、國畫、跳舞等啦！以前在台灣想學都沒有時間，到大陸之後，時間太多，才有消磨時間，機會學。

剛開始三、四年還得親自下場教導員工模具技術的劉姓頭家娘則表示，

剛開始來時，我根本不知道要到哪裡逛街，也沒有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班還是上班。剛來前幾年我幾乎都是在工廠裡，然後每隔一、二個月回去一趟看小孩，等到公司員工都比較穩定，並請了一些台幹來做廠務管理之後，人家才告訴我：「台商協會底下成立了一個婦女聯誼會，妳可以去參加學一些東西，交交朋友，才不會無聊。」我才開始走出去參加台商協會成立的婦聯會學插花、跳舞等，增加生活樂趣。

爲了打發時間，大部分到大陸的婦女都會參加類似的組織，學習一些東西，增加生活樂趣。由於外界對台商太太在大陸成立的「聯誼會」解讀是爲監督先生，避免先生「包二奶」的一支掃黃隊，爲婦女提供才藝學習只是一個表面藉口而已。對於外界的批評，現任婦聯會會長黃素妙表示，

當初婦聯會成立的宗旨是讓婦女有一個交流的場所，並不是外界所言是「掃黃隊」？「坦克車」？我們只是站在輔助台商協會的立場，展現女性柔性的一面，並不是外界所言我們成立婦聯會主要目的是監督先生的行蹤。

二、扮演親善大使

台灣中小企業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建立在社會網絡的關係上，亦即是人情關係的運作和制度化。俗語說，「見面三分情」就是指中小企業的社會關係，再從人情關係中去發展潛在的合作關係，而達到經濟利益追求的目標(蔡明璋，2002，頁453)。中小企業頭家娘則在人情關係網絡裡扮演重要的角色，產業外移後，這條緊密的人情網絡被切斷，雖然上中下游廠商都來了，但大陸地大物大每個人選擇登陸地不同，所以頭家娘必須重新建立「社會網絡」。

婦聯會的成立剛好為移居頭家娘提供了這個機會。以前中小企業在台灣做生意講究的人情，到了大陸之後，一切講求「法」，凡事依法行事，企業無法與大陸高層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在處理一些事情上就顯得比較棘手。婦聯會成立後，移居頭家娘發揮過去在台灣洽談公事的能力，並在台商協會舉辦各項活動裡，展露其才藝，讓大陸官方知道頭家娘的另一面。不僅博得大陸官方的喝采也為先生打通政商人脈。

因為參加婦聯會找到自己價值的吳姓頭家娘即表示，

剛來第一個年我悶得快發慌，每天都覺得時間好長，也經常跟先生吵架；小孩上幼稚園後，更覺得無聊，我就開始學插花打發時間，並找找自己興趣。學插花時，意外發現有個台商婦聯會正在籌組中，我看到與我一樣追隨先生到大陸的婦女，好像遇到多年的老友一樣，覺得好快樂，好像看到希望一樣。剛開始我並沒有正式加入婦聯會，只是偶而她們舉辦活動我會參加。

有一次，剛好台商協會舉辦第一屆招商活動，須要一些義工，婦聯會姐妹們就把我拖去義工，可能是因為我個性及過去工作性質的關係，見過不少大場面，看到來自各地的廠商及當地官員，總是能招呼的很好，而且我一個人可以同時應付很多人；當時的台商會長就覺得我是不錯的對外公關人選，於是推薦我擔任婦聯會分會祕書長。這次的活動這些頭家看到娘子軍與高層互動的這麼好，於是想藉娘子軍的力量拓展這層關係。參加婦聯會之後，也讓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變化。

吳姓頭家娘進一步指出，「不過，自從我參加婦聯會之後，我覺得視野跟前不一樣，自己接觸的生活層面更廣了，眼界也更大。想想幾十年前，想參加慈濟、扶輪社、獅子會等活動都沒有時間，現在反而有更多時間投入主要是因為有錢又有閒了。」

三、解決分偶家庭問題

婦聯會除了提供婦女一個交流場所外，也幫婦女解決分偶家庭子女教育的問題。目前國內前往東莞設廠的台商高達一萬多家，固定居住在東莞的台商及眷屬更達5、6萬人，約有900個家庭是小孩還小時就來台灣，而定居幾年後面臨就學問題，為減少分偶家庭的家庭糾紛，婦聯會說服大陸官方給予台商成立「東莞台商子弟學校」⁷。

當初這個構想提出來後，一直卡在大陸官方遲遲沒有核准下來，婦聯會則以女性的角度出發，打動大陸高層的心，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才能順利成立。現在可能還沒有著落。這個願望是十幾年來台商的願望，但一直沒有對話窗口。一直參與學校籌辦業務的吳姓頭家娘說，

有一次，我去拜訪東莞市一位官員，在談話間這名官員說，台灣人現在在東莞發展不錯，希望大家都能在此「安居樂業」。我一聽機會來了，馬上展開女性訴求告訴這位為人母的官員，台灣人在此是安居但不樂業；官員一聽為什麼不樂業。我說，小孩到東莞都沒有身份，所以就學上發生問題，父母必須把小孩送回台灣就讀，但先生又在大陸創業，心總是懸在兩邊，原本全家團圓在一起的希望，又將隨著小孩回台就學而破滅。台灣有很多婦女常因為照顧小孩、老母無法前來，與先生分隔兩地而感情生變的案例，這樣我們怎麼樂業？

有很多頭家娘因為擔心小孩教育問題，所以未跟隨先生前來大陸，但台商小學成立後很多婦女就不必煩惱小孩教育問題，可以全家一起到大陸生活，不必再分隔兩地。黃姓頭家娘則對因擔憂小孩教育問題，留守台灣的婦女提出誠心的建議，

我要奉勸這些頭家娘，能來最好來，小孩子的教育問題不是問題，現在這裡已經有台商子弟學校，不然也可以讓小孩唸國際學校。分隔兩地不是辦法，這裡真的誘惑很多，尤其是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男人就會展現出他大男人主義的性格，這是過去傳統遺留下來不好的觀念。

⁷ 東莞是大陸第一個設立台商子弟學校的地區。

在東莞住了十年，跑遍東莞地區的張姓頭家娘也用相當嚴肅的口吻告訴仍在當空中飛人的頭家娘：

「如果你還愛你先生，東莞現在已有台商學校，台北有的東西在這裡幾乎都可以買得到，嫁雞隨雞，隨遇而安，何必一個人死守台灣；若擔心小孩教育銜接不上，你就得趕快說服他把財產登記在你名下，或是要求他去結紮，不然你跟他辛苦大半輩子，最後卻是別人跟著他吃香喝辣的。」

第三節 隱憂

頭家娘不僅要面對大陸生活環境裡的種種不安，還要面對先生可能包二奶的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遷，百萬台商太太逐潮流被動地改變了命運；運氣好的，能與先生共赴大陸，雖然遠離熟悉的台灣家鄉，不過夫妻仍在一起；運氣不好的，就只能在家中苦守寒窯，等待先生三個月一次放假，這些台商太太彷彿重現九〇年代中國大陸的「留守女士」命運。」

今周刊，2002

大多數中小企業頭家娘在產業還沒有外移時，其最大的隱憂時資金周轉不靈及找不到勞工，現在隨著產業外移，她們的隱憂已由過去的實質面轉到精神層面。過去幾年來，大量台商西進，除了帶動產業結構變化外，連帶也炒熱了二奶行情。對於台商們在大陸尋求另一種性愛寄託，部分隨先生移往大陸的頭家娘則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她說，80年代未過來的台商，獨自在內地拚，工作壓力大和離鄉背井的孤苦心境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自控能力較差的台商做出這種行為是很正常的。

另一位頭家娘也認為，早幾年前，台商一個人單槍匹馬到東莞創業時，夫妻長久分離，精神空虛和生理需求促使他們在工作之餘想尋求某種寄託，不過他們對髮妻絕沒有移情別戀的意思。聽多了台商在大陸另結新歡的事件，不少頭家娘在頭家決定要將產業移往大陸時，這些頭家娘們，不管家中小孩還小、小孩正值青少年叛逆期，或是小孩的不諒解，隨先生前往一個完全自己陌生的環境，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看管先生。

一位經營模具工廠的劉姓頭家娘就不諱言地表示，

我們到大陸時最小的兒子才二歲，家裡還有四小孩分別唸國中、高中；他們對於我拋下他們到大陸非常的不諒解，雖然我跟他們說，現在我不跟爸爸過來，以後爸爸可能就跟別人走了，可是他們還是無法理解。現在他們比較大了，也較能諒解我當初的苦心。

香港時報(2001)報導指出，一位將產業移往大陸的頭家娘，剛開始時，每半個月回台灣一趟，後來實在太累了，她就與兩個女兒溝通說：「媽媽要到大陸陪爸爸，妳們在台灣住奶奶家，再過幾年我們全家就可以聚在一起了。當時她女兒雖然已經十七歲了，但是還是很不諒解，她就跟她們溝通，並告訴她們，如果媽媽現在不去，以後爸爸可能就是別人的了。」

但並不是每個頭家娘都能隨先生前往大陸創業，有些頭家娘因為小孩還小仍在台灣受教育，所以難免內心上對小孩有愧疚感，並擔心他們可能學壞等等。以下本節將從移居頭家娘及分偶頭家娘在產業外移後，所產生的隱憂做進一步探討。

一、移居頭家娘的憂慮

有不少中小企業主的另一半，當初忍心將小孩留在台灣寄養在親友家裡，最主要的目的無非是看管先生，因為先生一個人在大陸創業，心理及精神上都面臨極大的壓力，如果夫妻倆一起打拚至少可以分擔工作上所面臨的壓力。但並不是頭家娘坐鎮大陸就可以避免先生在外面尋歡，今年才與先生仝離以經營手袋工廠的張姓頭家娘表示，

當初，把小孩留在台灣隨先生到大陸創業，就是怕他一個人孤獨寂寞，沒想到，當我們事業有成時，老實的他因受不了朋友笑他沒用、怕老婆，為了展現男子氣概，他開始逢場作戲，最後則醉倒在大陸女子的溫柔懷抱，不惜拋家棄子，與二奶共組家庭。

這位頭家娘進一步指出，事實上，隨先生前往大陸先生多少會收斂些，但頭家娘的心裡多少還有隱憂。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怎麼與大陸的妙齡女孩比呢？研究者在與多數頭家娘交談中發現，雖然她們嘴裡不說，但卻對先生的行蹤掌握的滴水不漏，有些頭家為避免誤會甚至各種大大小小的應酬也帶頭家娘出席，避免不必要的爭執。

但弔詭的是，受訪的頭家娘對於台商包二奶的事都有所保留，認為是媒體誇大其詞，但言談中無意中又會透露，其實那些台商有包二奶我們都知道，有時為了保護頭家娘不會把實情告訴她而已。研究者並觀察到，移居到大陸的頭家娘雖然每天看到先生，也能掌握他們的行蹤，但她們還是擔憂先生被大陸年輕女子所誘惑。

像以經營髮飾品的林姓頭家娘即對筆者表示，我對我先生很放心，因為他已經免疫了，他年輕時已經玩太多了。話才沒說完多久，剛好一位頭家娘來她家玩，兩人談到一些近況，那位頭家娘告訴她：「最近我先生好忙常常至非洲國家出差，我都一個人回台灣。」聽到她如此說，這位頭家娘馬上說：「千萬不要讓你先生一個人出差，像我跟我先生現在幾乎形影不離，連他與朋友相約去打高爾夫球，我也一起去。」

從她們的對話中可以嗅出，即使跟先生到了大陸頭家娘還是會怕先生逃不過大陸女子的溫柔陷阱。張姓頭家娘表示，

人生變化無常，誰會想到自己與老公打拚了大半輩子，最後他選擇愛情而拋棄家庭、事業。所以我要奉勸女性朋友要多愛自己，不要以為你跟隨先生到大陸就能掌握他的一切，他就會比較收斂，除非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他在外面的風流視而不見，等他回頭，不然就跟我一樣。她覺得女人應創造自己的價值，不要依附在男人身上，隨時自我成長，這樣才能過自己的生活。

最大小孩才三歲，最小的小孩剛出生不到幾個月，即隨先生到大陸經營塑膠五金製品的曾姓頭家娘則表示，

有很多頭家娘因為擔心小孩教育問題，所以未跟隨先生前來大陸，我要奉勸這些頭家娘，能來最好來，小孩子的教育問題不是問題，現在這裡已經有台商子弟學校，不然也可以讓小孩唸國際學校。分隔兩地不是辦法，這裡真的誘惑很多，尤其是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男人就會展現出他大男人主義的性格，這是過去傳統遺留下來不好的觀念。

看到很多台商太太爲了先生外遇而自殺，很多人把這種情況說，這是一種輪迴、報應，過去大陸人逃難拋妻棄子，現在台灣人也需面臨同樣的命運，換成台灣太太獨守空閨。這種說法，完全是從男性的角度爲出發，也是爲自己外遇找一個脫罪的藉口，而女性則是被男性宰制的，把女性當成其附屬品而已。

「傳統以來，女性受到父權體制的壓制，理想的女性應該表現得柔弱，具有維多利亞式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女性要被動，要順從丈夫，要謹言慎行，尤其還要對男性具有吸引力。」(卡拉·亨德森等著，1996)

就是說，家庭企業裡的頭家娘即使不同於一般女性，但在傳統文化下，女性仍是受到父權體制宰制，當男人有外遇時，往往將責任歸因於妳不夠溫柔體貼，妳個性太好強，一點女人味都沒有等因素。所以研究者在進行田野時意外發現，不少頭家娘爲展現自己也具有女人味，而回復較具女性化的特徵，如留長髮等。張姓頭家娘即向筆者表示，

自從跟我先生創業以來，我一直都是把頭髮剪頭，但我覺得還是長頭髮比較有女人味，所以我決定再把頭髮留長，雖然我也覺得長髮不太適合我。

爲了看顧先生，不少頭家娘將小孩留在台灣，雖然人在大陸工作，可是一顆心還是擔心小孩的教育問題。在大陸經營鋼構產業的黃姓頭家娘即表示，

我們到大陸時，因為小孩剛好在台灣受教育，所以沒有帶過來，在台灣給阿媽照顧；雖然小孩給阿媽顧很放心，但想到小孩的教育問題，還是有點擔心，所以我每個月一定得回台灣一趟，在別人看來覺得我們到大陸發展得不錯，很風光，但我總覺得很對不起兩個小孩，雖然兩個已經懂事：一個上大學，一個已經高中，但還是覺得愧對他們。

她向筆者進一步指出，「有好幾次我的小孩都問我，為什麼人家的爸爸媽媽不用到大陸，妳們卻要到大陸，我們家省一點就好了，幹嗎到大陸發展。聽到小孩這樣說，我無法回答。早期到大陸的時候，想到兩個小孩在台灣就會掉眼淚。」

確實移居頭家娘最擔心的是台灣小孩的教育問題，像從事電子生意的陳姓頭家娘即後悔地表示，

以前我和先生到大陸時，因為大兒子剛好上小學想到這裡的情勢，把他託給親戚照顧，因為我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發現他行為上有偏差，等到我們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現在我們對他非常的頭痛，現在連國中也唸不完，最近我們把他接來大陸一起住、盯緊他，想在大陸幫他找技藝學校唸，不然以後怎麼辦？

二、分偶頭家娘的憂慮

「每年七、八月孩子放暑假，是台灣太太帶著孩子到大陸的尋夫潮。」一位曾擔任東莞婦聯會會長的頭家娘如是說，台灣女人真的很可憐，在台灣替先生照顧老小，讓他在衝事業的時候無後顧之憂，先生自己卻在大陸逍遙享受，看了很替這些婦女打抱不平，辛辛苦苦幫先生打拚事業，當事業有成可以享受的時候老公卻嫌妳是黃臉婆。

誠如上述移居頭家娘所說，分偶頭家娘最大的擔憂及壓力來自於先生可能在大陸包二奶。根據一項針對「台商在大陸發生婚外情及對家庭之影響」的問卷調查中，發現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台商發生過婚外性行爲，雖然因外遇而與元配離婚、分居的比例低，但對家庭已經構成潛在的危險(林萃芬、邱彰，1994，引自王君琳，2001)。這裡所指的台商太太並不只包括傳統產業中小企業主的另一半，還包括各類前往大陸工作的企業主及台幹。

本研究中的五位分偶頭家娘也有這方面的憂心，雖然心裡有極大的不安全感也不能說出來，先生在大陸從事成衣業的 Z 姓頭家娘則不太願意說，只表示，

我有聽別人說，可是我先生對我很好，錢都有拿回來，即使有應該只是逢場戲而已吧！作生意嗎，難免會有這些場合，應酬應酬啦！

筆者進一步問，那妳有常到大陸嗎？她回答說，

「我是很少去，因為家裡有婆婆及小孩要照顧，走不開，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先生回來比較多。接著她又說：其實我覺得女人真的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管太多事情鬧大了，自己也沒有好處。而且現在大陸女子都很厲害，大家撕破臉對誰都沒有好處。」

這位頭家娘雖沒有明說，她先生在大陸有另結新歡並給她帶來極度的不安，但從她的談話中卻透露著傳統女性逆來順受的態度。但並不是每一位女性都受傳統禮教的束縛，女人應默默承受丈夫可以擁有三妻四妾，而不能吭聲。像 S 姓頭家娘就是覺得女人不應該委曲自己，應活得有尊嚴，她說，

「我告訴我先生如果讓我知道你包二奶，我就會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她表示，我的手段是比較激烈一點，但我要讓他知道不能有錢了就忘記與他辛辛苦苦把事業撐起來的妻子。

S 姓頭家娘除了口頭警告外，也常在先生回大陸後，出奇不意地到大陸查勤；但她還是懷疑先生對她不忠，覺得先生的言行舉止怪怪地，爲了查個水落石出，她還特地買付卡給替先生整理家務的阿姨，並請阿姨若發現先生有別的女人，立即打電話通知她。她不平地說：

「我在台灣幫他照顧四個小孩，他卻在大陸享福，這怎麼說得過去。」不過，我覺得阿姨也被他買通了，所以我想請徵信社幫我調查清楚。

因爲小孩都大了，所以這位頭家娘目前都把重心放在先生身上。即使先生給她再三保證，她心裡還是覺得先生在大陸有包二奶。另一位也懷疑先生在大陸有包二奶的受訪 Y 姓頭家娘表示，

男人怎麼可能逃得過大陸女子的溫柔，即使再老實的人也會在同儕的取笑下，爲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與其他人一樣也包二奶。其實，擔心也沒有什麼用，我們怎麼比得過年輕女孩，只要他按時拿錢回家就好了，我就對自己好一點。而且他不在家也好，小孩也大了，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只要自己會

過生活就好了，想太多自己反而不快樂。

雖然並不是每個到大陸的男生都會包二奶，但媒體報導多了總會令女性精神壓力大，感到極度的不安。台商包二奶除了原有的歡場生意文化外，其實還受到傳統擁有三妻四妾代表身份地位象徵的父權思想的影響。在國內相關研究中指出，包二奶其實是人在寂寞下追求情感支持的一種方式。一般來說，赴大陸工作的台灣男性不是屬於管理階層的中高級幹部，就是獨資經營的創業者，工作壓力的往往比台灣高出許多。他們在面對一個新興市場時，適應摸索的過程讓他們耗費了許多精神與體力，因此決策和經營成敗的風險都必須由他們承擔，也因此每個人都肩負了比台灣更大的工作壓力(王君琳，2001)。

其實男人「包二奶」並不能單純地從生理需求面來談，最大的問題癥結應是，他可以展現自己的優勢。

一位已婚的梁姓台商說：「沒有到大陸投資前，自己也是個百分百的標準好夫；一到大陸，每天在這種五光十色的誘惑下，老婆又不在身邊，再堅強的防線也會失陷。」他進一步指出，和這些年輕女孩在一起，心也會變得年輕，「她們不像台灣女孩搬出一種高傲的姿態，在她們眼中我可以看到崇拜的眼神，不管是真是假，我得到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壹周刊，2001)

另一位在上海做廣告代理的小陳也說：

「大陸二奶之所以能夠討男人歡心，不僅年輕貌美，嘴巴又甜，不會惹你生氣；要不是二奶調劑，我早就和我老婆離婚了(壹周刊，2001)。」

從這兩篇文章訪談內容，與其說男人是為壓力、寂寞包二奶，還不如說這些男人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心態在作祟。而且從另一個性別位置的角度來看，男性在此可以掌握主要的權，不論在經濟上或是性別上；也就是說，台灣男性包二奶不僅只是生理上的需求，也是一種權力象徵。也是一種對落後國家女體的父權消費心態(王君琳，2001)。

第四節 小結

移居頭家娘雖在家庭企業裡仍握財務大權，也不用再參與生產、再生產的工作，原本無酬的家屬工作者也變得有酬；從另一個生活層面來看，家事有家庭幫傭代勞，出門有專屬司機，隨時想休息就休息，與三五好友相約打高爾夫球、做做臉；這些生活改變在台灣即使是小資產階級也不可能享有這樣的生活，在大陸因為勞力及生活消費便宜，讓這些在台灣還撐不上大型企業的中小企業頭家娘，在這裡享受社會地位往上流動的滋味。

但多數受訪頭家娘都表示，到了大陸之後生活更加苦悶，至於為何苦悶？她們將原因歸咎於沒有地方逛，社會網絡斷裂，其實從結構面來看，主要原因是過去原需擔任生產與再生產角色的頭家娘，產業移往大陸之後，其原本角色已被當地廉價勞力所取代，升格為經營者或是管理者的角色，也就是馬克思階級論中所指的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也因為這樣她們將自己的階級定為資產階級，與過去的小資產階級不一樣，所以她們必須過著像資本家般的生活，如出門有司機，回家後不用做家事，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

因為頭家娘認為自己在大陸屬於上流社會，與一般勞工階級不同，所以她們必須把自己建構成以前維多利亞式婦女生活情境，如學學古箏、插花、跳舞……等，把自己塑造為具有多項才藝的女性，以凸顯自己與其他階級的不同。頭家娘們把自己侷限於一個封閉空間，生活範圍只有先生及工廠，過著禁錮的生活，所以生活苦悶，為增加生活樂趣成立婦聯會，她們的生活模式與十七、八世紀歐洲大資產階級婦女一樣，也因為生活無聊而成立俱樂部，重新建構其已斷裂的社會網絡。

頭家娘自我建構階級身份，使其在大陸生活得很不快樂，一方面還要擔心頭家包二奶的問題，精神上面臨極大的壓力。在資本國際化下，台灣產業在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後，如同其他新國際分工體系的資本一樣，將產業移至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三世界國家婦女為改變「身份」想藉由「身體」而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這種情況與台灣在經濟發展時，中山北路總有一群以「身體」賺取工資的女性，以嫁給美國大兵為人生的職志，因為這是讓自己改變社會地位的途徑。台商抓準大陸女性這樣的心態，為展現其權力而包二奶，簡單地說，就是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心態作祟的結果。

而這些台商為了脫罪往往將責任歸咎於台灣女人不夠溫柔體貼、不會打扮，或只是逢場作戲，壓力大需要發洩一下等各種理由。移居頭家娘也覺得，男人會找女人除了個人自制力不夠外，自己不夠溫柔體貼，沒有大陸女孩年輕漂亮，也

第四節 小結

移居頭家娘雖在家庭企業裡仍握財務大權，也不用再參與生產、再生產的工作，原本無酬的家屬工作者也變得有酬；從另一個生活層面來看，家事有家庭幫傭代勞，出門有專屬司機，隨時想休息就休息，與三五好友相約打高爾夫球、做做臉；這些生活改變在台灣即使是小資產階級也不可能享有這樣的生活，在大陸因為勞力及生活消費便宜，讓這些在台灣還撐不上大型企業的中小企業頭家娘，在這裡享受社會地位往上流動的滋味。

但多數受訪頭家娘都表示，到了大陸之後生活更加苦悶，至於為何苦悶？她們將原因歸咎於沒有地方逛，社會網絡斷裂，其實從結構面來看，主要原因是過去原需擔任生產與再生產角色的頭家娘，產業移往大陸之後，其原本角色已被當地廉價勞力所取代，升格為經營者或是管理者的角色，也就是馬克思階級論中所指的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也因為這樣她們將自己的階級定為資產階級，與過去的小資產階級不一樣，所以她們必須過著像資本家般的生活，如出門有司機，回家後不用做家事，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

因為頭家娘認為自己在大陸屬於上流社會，與一般勞工階級不同，所以她們必須把自己建構成以前維多利亞式婦女生活情境，如學學古箏、插花、跳舞……等，把自己塑造為具有多項才藝的女性，以凸顯自己與其他階級的不同。頭家娘們把自己侷限於一個封閉空間，生活範圍只有先生及工廠，過著禁錮的生活，所以生活苦悶，為增加生活樂趣成立婦聯會，她們的生活模式與十七、八世紀歐洲大資產階級婦女一樣，也因為生活無聊而成立俱樂部，重新建構其已斷裂的社會網絡。

頭家娘自我建構階級身份，使其在大陸生活得很不快樂，一方面還要擔心頭家包二奶的問題，精神上面臨極大的壓力。在資本國際化下，台灣產業在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後，如同其他新國際分工體系的資本一樣，將產業移至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三世界國家婦女為改變「身份」想藉由「身體」而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這種情況與台灣在經濟發展時，中山北路總有一群以「身體」賺取工資的女性，以嫁給美國大兵為人生的職志，因為這是讓自己改變社會地位的途徑。台商抓準大陸女性這樣的心態，為展現其權力而包二奶，簡單地說，就是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心態作祟的結果。

而這些台商為了脫罪往往將責任歸咎於台灣女人不夠溫柔體貼、不會打扮，或只是逢場作戲，壓力大需要發洩一下等各種理由。移居頭家娘也覺得，男人會找女人除了個人自制力不夠外，自己不夠溫柔體貼，沒有大陸女孩年輕漂亮，也

是原因之一。移居頭家娘在面對資本國際化，產業需轉型及頭家大男人態作崇花錢找女人的雙重壓迫下，雖然社會地位往上流動，但其精神壓力相當大，過得很不快樂，時時都生活在恐懼、擔心害怕的生活情境中。

而與分偶頭家娘相比，移居頭家娘還比分偶頭家娘面臨更大的精神壓力。如前面幾位頭家娘在田野訪談資料中提到，頭家娘到了大陸之後最大的困擾的就是員工管理及公司轉型的問題。幾乎每個受訪的頭家娘都表示，以前在台灣是勞力，到了大陸之後是勞心；勞力有地方紓解壓力也就算了，這些移居頭家娘在大陸的減壓方式是偶而找其他頭家娘倒垃圾，其他時間則待在工廠內住家盯著電視看，或是到婦聯會學學東西。

從上述幾個面相來看，移居頭家娘到大陸之後在生活上雖然可以不像以前每天二十四小時忙得團團轉，家務也由家庭幫傭代勞，照理說每天可以過著悠閒的日子，在訪談中得知，她們並不快樂，生活得很苦悶、無聊，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現象，並不是大陸很無聊沒地方去，而是她們把自我劃分階級，覺得自己與一般勞工階級不同，在大陸她是屬於上層社會階級的人，所以她們無法融入當地的生活，把禁錮在工廠裡或是婦聯會。

第六章 我在研究裡發現了什麼？

在台灣，很多人都羨慕「台商太太」，把她們與「少奶奶」劃上等號，認為只要追隨先生移居到大陸，就可以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偶而找三五好友喝下午茶，學學國畫、鋼琴、書法完成年輕時想當才女的夢想。隨先生前往大陸的台幹型的「台商太太」，確實每天過著如此優哉的日子；但也被人稱為「台商太太」的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生活又不同於她們，雖然家務勞動有「家庭幫傭」代勞，但因在企業裡還須兼負經營者的角色，不像台幹型的台商太太完全退出職場，回到家庭場域擔任母職角色，過著維多利亞式的生活。

在前面章節中有提到，過去在台灣經濟起飛裡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小企業，60、70年代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的改變，原作為國際分工下的代工製造已愈來愈難生存，中小企業不得不轉型或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大陸等地區為產業尋找生機。筆者在進行田野訪談時發現，在中小企業裡扮演重要角色的頭家娘在產業外移至大陸後，其在家庭企業裡的角色也產生變化，不再是無酬「家庭角色」的延伸，在家庭企業裡扮演有酬的「管理者的角色」，成為馬克思資本主義中所講的擁有生產工具者，其在社會的階級地位某種程度而言是上升的，但就某些方面來說，其生活是被禁錮的，主要與頭家娘自我階級劃分有極大的關係。

一、階級劃分

幾位受訪的頭家娘即表示：「來這裡的婦女生活很苦悶，沒有地方逛街，社會人際網絡也斷裂了，連找個朋友聊天都沒有，目前大家唯一的連絡網絡則是婦聯會。」受訪頭家娘在言談中也提到的，雖然頭家娘們對於自己目前在大陸的生活還滿意，但她們生活很苦悶，並沒有想像中的快樂。為什麼她們到大陸之後生活會苦悶？難道苦悶的生活只是像頭家娘們所說：「沒有地方逛街，社會人際網絡斷裂」這麼單純嗎？還是頭家娘成為資本家後的一種自我建構。

過去，這些中小企業頭家娘在還沒有轉變為大資本家前，為了節省人力成本，在公司裡雖是頭家的另一半，但並不是閒閒沒事，除了負責工廠員工管理外，平日也要直接參與工廠裡現場工作及煮飯。她與員工間的互動如同朋友、姐妹，不像一般大企業頭家娘與員工之間有一段距離，員工難得見到頭家娘，只有公司裡的中高階級幹部才可能接觸到頭家娘，一般基層員工有問題只能向中、高階級主管反應。

但隨著資本外移到大陸之後，因為當地土地、勞力便宜，頭家娘不用再直接參與生產工作，只扮演經營管理者的角色，由小資產階級轉變為資本家。而當一個人要轉變為資本家的時候，常會劃分自己階級表示自己與一般勞工不同。這種情況就好像資本主義剛入侵歐洲地區時候，資本家為展現其階級，迫使許多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婦女回歸家庭從事家務勞動或是子女教育的角色一樣，雖然有家庭幫傭整理家務，每天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但因為「階級」不同，為突顯自己的身份地位，婦女必須強迫自己過著少奶奶般的生活。因為如果一位資本家的太太仍像其他階級婦女一樣，就無法突顯其所屬階層地位的象徵(status symbol)。

移居頭家娘在資本國際化的浪潮下，追隨這股浪潮移居大陸，也因為大陸低廉的勞動力及消費，讓她們在社會的階級地位往上流動，但她們在情感、情緒及生活上，類似十七、八世紀歐洲大資本家婦女的處境一樣，為了突顯自己是資本家與勞工階級不同，所以必須有資本家的生活情境，不能還是過著以前勞工階級的生活。就像佛麗丹(Betty Friedan, 1963)在《女性的神話》(Feminine Mystique)一書中描述美國現代女性被迫在家裡當賢妻良母，最後卻帶來「無名的煩惱」。

從上述陳述推論，移居頭家娘在大陸感到「生活苦悶」表面上看來是因為沒地方逛街、社會網絡斷裂，但更深刻的分析，則看到她們是因為成為資本家之後自我建構階級身份的認同。

二、父權體制 v . s 資本主義

隨著資本的流動，移居大陸的頭家娘在消費上雖是「往上流動」，但其生活上卻因資本家心態作祟感到苦悶，不僅如此，其精神壓力遠比在台灣時來得大，因為怕先生「包二奶」，這幾乎是所有受訪頭家娘的苦惱。過去在台灣只是小頭家的男性，在產業外移後身份地位遠比女性提高得多，他們在各種消費便宜的情況下，為展現其權力及資本主義心態作祟下，興起「包二奶」的念頭，但他們往往將這種行為歸為生理需求及紓解壓力。

一位受訪頭家娘也對筆者表示：「其實，大家不用把男人包二奶的事情看得太嚴重，只要從生理需求的角度來看，把男人當成是動物，隨時需要發洩就好了，終有一天他發洩完了，就會回到溫暖的家。」這幾乎是很多女性對男人外遇尋找的一個脫罪藉口。其實從性別位置的角度來看，男性在此可以掌握主要的權，不論在經濟上或是性別上；也就是說，台灣男性包二奶不僅只是生理上的需求，也是一種權力象徵。也是一種對落後國家女體的父權消費心態(王君琳，2001)。

台商到大陸「包二奶」文化，其實與傳統擁有三妻四妾代表身份地位象徵的父權思想有關。自古到今，無論時代如何更迭，男性為展現其權力身邊往往需要一群女人為他服務，而要擁有這些權力往往需要有錢。所以台商「包二奶」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兩者互為共犯結構所導致的文化。在資本國際化下，台灣產業在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後，如同其他新國際分工體系的資本一樣，將產業移至第三世界國家，剝削其勞動力。而第三世界國家婦女為改變「身份」想藉由「身體」而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這種情況與台灣在經濟發展時，中山北路總有一群以「身體」賺取工資的女性，以嫁給美國大兵為人生的職志，因為這是讓自己改變社會地位的途徑。台商抓準大陸女性這樣的心態，為展現其權力而包二奶。

Sobinet

三、頭家娘移居大陸後，情感上更依附男人

很多到大陸之後「包二奶」的男性，把包二奶的行徑歸咎於台灣女人不夠溫柔體貼、不會打扮，或只是逢場作戲，壓力大需要發洩一下等各種理由。移居頭家娘也覺得，男人會找女人除了其個人自制力不夠外，自己不夠溫柔體貼，沒有大陸女性年輕漂亮，也是原因之一。頭家娘在面對資本國際化，產業需轉型及頭家大男人態作崇花錢找女人的雙重壓迫下，雖然社會地位往上流動，但其精神壓力相當大，過得很不快樂，時時都生活在恐懼、擔心害怕的生活情境中。

筆者在進行田野時也發現，不少頭家娘為展現自己也具有女人味，而回復較具女性化的特徵，如留長髮等。不少頭家娘也對筆者透露，女人絕不能變老、變胖，而且還要學會跟先生撒嬌，因為男人都很吃這一套，大陸女人就是這一點厲害，把很多台商哄得團團轉。保持年輕外表外，也要會抓住先生的心，不能管太緊也不能不管，鬆緊之間要拿捏得當，讓他覺得妳還是比大陸女孩好，大陸年輕女好只不過是要她的錢而已。她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一定掌握公司的財政大權，不然如果哪一天先生跟二奶跑了，妳辛苦了一輩子，要享受的時候卻拱手讓人。

顯見，移居頭家娘在大陸雖過著如「慈禧太后」般的生活，也掌握公司的財政大權，但她們在情感上及情緒上還是有莫名的恐懼。而這種恐懼的產生有一部分來自於社會建構如社會治安不好，也因為這樣頭家娘們通常不太敢一個人出門，因為怕被搶、被偷；為什麼她們在大陸怕被搶、被偷？而在台灣卻沒有這方面的疑慮？難道台灣的社會治安很好？依據布赫迪厄在《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所述，社會上裡的宰制階級或上層階級，善於經營區別性以突出自己的身分，並將其對社會的觀點強加於所有人身上。中小企業頭家娘移居大陸後由於其社會階級在當地為上層階級，為彰顯其資本家的身分，因此她們很少到街上逛，社會治安不好只佔一小

部分原因而已。來自於情感上的恐懼則來自於「包二奶」文化。因此，移居頭家娘比分偶頭家娘在心理上、精神上面臨更大的壓力。

這股壓力不只來自於工廠規模變大後，員工管理問題，也來自於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共同的壓迫，讓移居頭家娘隨時處在恐懼的生活裡。頭家娘移居到大陸後，階級雖往上流社會流動，但她們卻為了成為資本家、上流社會的人，把自己歸類為資本家與一般小資產階級或是勞工階級不一樣，常擺出資本家的架勢，為了便於管理頭家娘對於大陸員工通常採取軍事化的管理，限制員工的自由，因此她們在精神上常感受極大的壓力，因為她們隨時都擔心員工不聽話，鬧情緒……等，這些現象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結構有關。

父權體制一直在宰制女性的地位。無論是傳統女性或是經濟發展女性參與勞動之後，父權體制一直透過各種形式控制女性，如利用各種文化、教育機構或政策等將女性地位壓制在男性之下(葉盈蘭，2002)。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雖在企業裡佔有一定的角色及位置，但當企業外移之後，原本在企業裡佔極重要地位的頭家娘有些則退居家庭過著「主婦」的生活；而隨著頭家前往大陸定居的頭家娘雖然每天都看得到頭家，但還是很擔心頭家包二奶，所以隨時處在不安恐懼的生活中。

四、以夷治夷的邏輯

雖然大陸與台灣同為華人，但大部分中小企業前往大陸設廠時，剛開始時，工廠裡的重要幹部大多從台灣高薪聘請到大陸，因為他們覺得大陸人不可信任，而且他們認為，大陸員工腦筋反應不夠快、靈敏，不會舉一反三。台商重用大陸員工只有在員工宿舍管理上，因為台商認為，由本地人管理本地人較了解他們的習性，也比較不會鬧事。

員工宿舍管理重用大陸本地人外，有些頭家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為積累更多的資本，想朝內陸發展，但依據大陸法令規定，台商無法做內銷，只有大陸人民才能內銷，腦筋轉得快的台商就與大陸員工採取合作方式，共同再成立一家子公司，由母公司提供子公司產品銷往大陸內地。

雖然頭家娘在管理上採取以夷治夷的方式，但其心境是很矛盾的，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到，頭家娘們把自己歸類為與大陸人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她們認為：「台灣與大陸雖同為華人但她們卻認為他們很笨、很不衛生、沒水準……等。」頭家娘對大陸員工有諸多批評，將別人踩著腳底下藉此提高自己的身價。忘記自己在勞工階級時也曾有相同經驗、走過相同的路，現在自己成為資本家之後，卻以他

們不符合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及工業化的節奏，衡量大陸員工的素質。主要目的是為突顯自己與他們不同，他們是勞工階級自己則是掌控他們生計的資本家；與過去在中小企業裡為了擺脫勞工階級，努力往上爬付出勞力、心力的時空不同。

五、 小結

台商前進大陸近幾年已成為不可擋的潮流，但大家在談論相關議題時，只著重於台商對大陸員工管理及包二奶文化，對於中小企業產業外移大陸後頭家娘角色，在家庭企業裡角色位置產生的轉變，目前國內並沒有相關論述及研究。本研究是一個初次嚐試，希望大家在關注台商前往大陸投資各種議題時，不要只著重於台商的經營策略及文化差異，等相關問題，也應對過去在家庭事業裡扮演重要角色的頭家娘，隨著頭家將產業移往大陸投資的同時其角色地位的轉變多一些關注。

由前面幾個章節所陳述面向來看，中小型企業頭家娘無論是移居大陸或是分偶頭家娘其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確實有產生變化，但這些轉變無法單從其生活面及消費面來解釋，必須有更多、更深入的觀察如她們與員工間的互動等才能判斷，目前筆者僅能從頭家娘口述及參與觀察中分析，這也是本研究缺憾不足之處。

■ 參考資料

- Baron, James N, P. Deveraux Jennings, and Frank R. Dobbin (1988) "Missio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nel Systems in U.S.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497-514。
- Blumberg, Rae Lesser (1984) "A General Theory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pp.23-101),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R. Collins.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Bonnewitz, Patrice (2002)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pbell, John 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1991)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S.L. (2000) "Real Life at Virtual Home: Silic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o Transcultural Home Identitie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Chapman, A.D. (1984) "Patterns of mobility among men and women in Scotland, 1930-1970, PhD. Thesis", Plymouth Polytechnic。
- Chisholm, Donald (1989) "Coordinational Without Hierarchy: Informal Structure in Multiorganizational Syste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u, Bih-Er (周碧娥) (1987)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Women's Status: A Reevaluation of Some Data from Taiwan". (pp.423-61) i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edited by Hsin-Huang M. Hsiao.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loe, Patricia M. (1993) "Women in Family Business: A Systemic Approach to Inquiry. Ph.D. dissertation".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Crompton,R.and Jones,G.(1984)"White-Collar Proletariat:deskilling and gender in manual work",London:Macmillan。

Crompton,R.and Sanderson,G.(1986)"Credentials and careers: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increase i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mongst women",Sociology,(20:24-42)。

David Jary&Julia jary(1999)《社會學辭典》(周業謙、周光淦合譯)。台北：貓頭鷹。

Edwards,Richard(1979)"Contested Terrain.New York",Basic Books。

Fellow(2002)《心經濟，愛無價？》(許慧如譯)。台北:新新聞。

Finch,J.(1983b)"Dividing the rough and the respectable:working-class women and pre-school play-groups,in E.Gamarnikow,D.Morgan,J.Purvis,and D.Taylorson(eds)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London:Heinemann。

Gates,Hill(1987)"Money for the Gods.Modern China"(13:259-277)。

Greenhalgh,Susan(1994)"De-Orientalizing the Chinese Family Firm.American Ethnologist" (21(4):746-775)。

Karla A.Henderson(2000)等著《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劉耳、季斌、馬嵐合譯)。雲南人民出版社。

Maria Mies(1986)"Colonization and Housewifization,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ichel(1989)《女權主義》(張南星譯)。台北:遠流。

Niehoff,Justin D(1987)"The Villager as Industrialist: Ideologies of Household Manufacturing in Rural Taiwan.Modern China" (13:278-309)。

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張君玫等譯)。台北：巨流。

Pollert, A. (1981) "Girls, Wives, Factory Lives", London: Macmillan.

Rosemarie Tong (1996) 《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譯)。台北:時報。

Seager, J. and Olsen, A. (1986) "Women in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tlas", London: Pluto Press.

Stanworth, M. (1984) "Women and social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159-170.

Tiano, S. (1987) "Gender, work and world capitalism: Third World women's role in development, in B. B. Hess and M. M. Ferree (eds) Analys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Ward, J. L., and L. Sorenson (1989) "The Role of Mom. Nation's Business" 77: 8-40.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上野千鶴子 (1997) 《父權體制與資本: 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劉靜貞、洪金珠譯)，台北: 時報。

王君琳 (2002) 《流動的家: 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2001) 《2002 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台北: 商周。

伊慶春、蔡瑤玲 (1982) 〈已婚職業婦女雙重角色: 期望、衝突與調適〉(陳昭南、江玉龍、陳寬政主編)，《社會科學整合論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25: 115-151)。

成露茜、熊秉純 (1993) 〈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四期)。

呂玉暇 (1980) 〈社會變遷中台灣婦女之事業觀—婦女角色意識與就業態度的探討〉，收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0 期)(P25-66)。

呂玉暇 (1983) 〈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之關係〉，收於《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6 期)(p111-143)。

呂玉暇(1997)〈婦女與家庭企業〉，收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1997 社會學研討會》。

呂玉暇(2001)〈性別、家庭與經濟:分析小型家庭企業老闆娘的地位〉，《台灣社會學》(第二期)(P164-217)。

呂玉暇、伊慶春(1998)〈社會變遷中婦女就業與家庭地位—以家務分工為例〉，《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p321-339)。

宋鎮照(1993)〈中華民國與東協四國之經濟依賴發展關係〉，《台灣經濟》(203 期)。

投資中國雜誌(2002)〈31 省台商投資排行榜〉。

李文真(1994)〈老板娘心事誰人知〉，《光華雜誌》。

李悅端、柯志明(1994)〈小型企業的經營與性別分工—以五分埔成衣業社區為案例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七期)。

谷蒲孝維(1992)《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

周添城、林志誠(1999)《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台北:聯經。

林芳玫、張晉芬(2002)〈性別〉，《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王振寰、瞿海源主編)。台北:巨流。

林美霞(1997)〈台商透過跨國策略聯盟進行大陸投資的可行性分析〉，《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第二卷第五期(86:05)。

林萃芬、邱彰(1994)《一國兩妻:兩岸婚姻白皮書》，台北:精美。

林麗雪(1996)〈台灣經濟成長的幕後功臣—頭家娘，您辛苦了!〉，《卓越雜誌》。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學研究叢刊。

- 高承恕(1999)《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
- 高長(2002)〈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第二卷第五期(86:05)。
- 陳介玄(1998)《台灣產業的社會學研究—轉型中的中小企業》，台北：聯經。
- 壹周刊(2001)〈上海直擊：台商二奶〉，(P29-32)。
- 彭懷恩(1991)《台灣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曾熾芬(1999)《資本跨國化的社會與政治機制：台灣產業外移東南亞的研究》，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結案報告。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黃佳琪(1999)《世界體系與台灣產業結構之轉型》，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 黃淑玲(2000)，《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女性主義》(顧燕翎主編)，台北：女書。
- 葉盈蘭(2001)《婦運團體挑戰國家機器與市場的例證：以婦女新知推動「兩性平等法」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熊瑞梅、黃毅志(1992)〈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收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小型研討會"客廳即工廠—台灣小型家庭企業研究》。
- 趙蕙鈴(2000)〈現代社會中已婚婦女的角色轉變與角色創新的歷程：以台灣中小製造業「頭家娘」的初步研究為例〉，《中國醫藥學院通識教育年刊》(第二期)。
- 趙蕙鈴(2001)《夫妻檔的企業經營與家庭關係的轉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 劉志明(2002)〈兩岸分偶時代來臨—百萬台商太太的憂慮〉，《今周刊》(309期)。
- 蔡明璋(2002)〈經濟與工作〉，《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430-462)(王振寰、瞿海源主編)。台北：巨流。
- 謝秀芬(1998)〈台灣女性的家庭角色觀與工作觀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4:P1-34。

謝其達(1998)《從台灣產業外移論國家角色—以自行車產業為例》，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謝國雄(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存活:台灣小型製造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研究〉，《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五期)。

嚴祥鸞(1996b)《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化分工的解析:1951-1994》，勞資關係論叢 5:147-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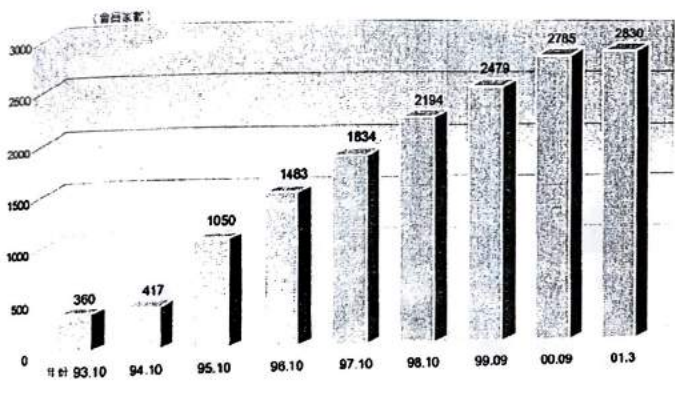
附錄一 經濟部核准對大陸投資—分布地區別

單位:千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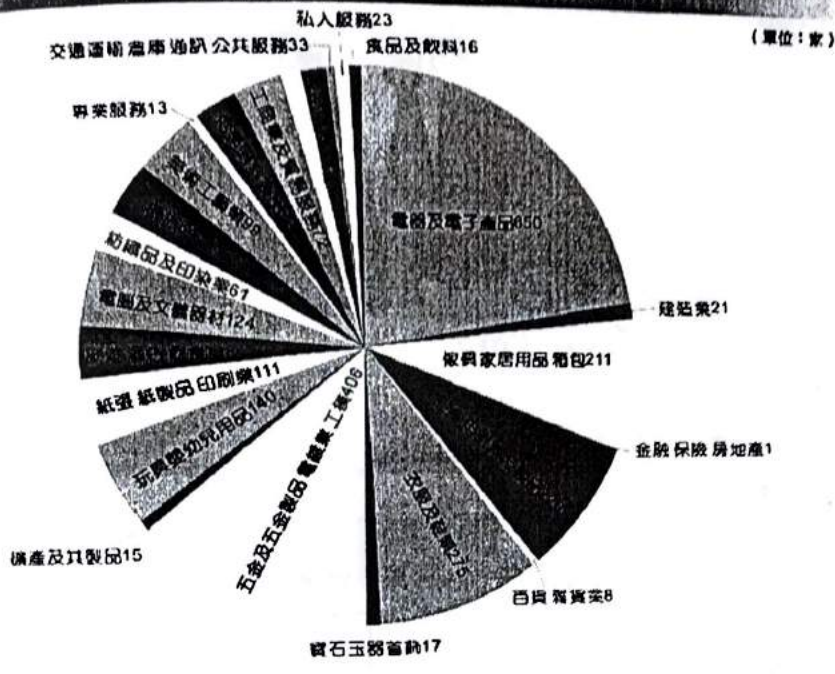
	廣東	福建	江蘇	海南	河北	東北地區	其他
1991年	733,325	55,961	24,398	412	7,475	455	12,132
1992年	122,038	29,584	34,389	1,535	22,271	15,839	31,336
1993年	1,047,811	437,800	833,307	61,954	194,299	68,345	488,895
1994年	230,927	96,624	391,814	9,115	56,814	11,488	165,427
1995年	222,748	121,656	394,772	649	83,194	43,539	226,155
1996年	282,816	110,884	541,991	--	132,903	26,269	134,378
1997年	1,720,900	472,229	1,247,297	37,984	233,565	62,768	559,570
1998年	824,419	150,793	694,751	12,997	92,421	10,499	248,741
1999年	500,114	58,899	475,008	388	57,281	10,289	150,801
2000年	1,019,703	99,486	1,251,623	1,595	92,630	14,380	127,725
2001年	787,971	120,122	1,422,590	2,403	125,228	18,950	306,833
2002年1月	44,462	7,750	122,980	--	7,638	--	23,386
2002年2月	17,848	3,550	28,366	--	5,950	--	15,387
2002年3月	58,035	3,780	191,060	350	18,206	1,142	18,200
本年累計數	120,345	15,080	342,406	350	31,794	1,142	56,973

資料來源:經濟部核准對大陸投資統計(2002)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會員增長趨勢圖



莞市台商投資企業產業結構分佈圖



附錄三 經濟部核准對大陸投資一覽表—產業別

單位:千美元

	核准對大陸投資總額	食品飲料業	塑膠製品業	金屬基本工業	電子電器業	精密器械業	其他
1991年	174,158	19,308	22,485	9,319	31,568	3,982	87,496
1992年	246,992	46,415	44,961	10,664	34,555	18,015	92,382
1993年	3,168,411	324,555	375,920	256,501	445,008	286,492	1,479,935
1994年	962,209	145,846	73,302	90,328	157,011	44,162	451,560
1995年	1,092,713	117,447	62,736	116,805	214,796	29,454	551,475
1996年	1,229,241	121,702	63,645	128,123	276,862	39,898	599,011
1997年	4,334,313	333,073	349,116	395,967	875,044	247,249	2,133,864
1998年	2,034,621	70,045	64,184	126,849	758,975	74,617	939,951
1999年	1,252,780	58,250	99,074	104,494	537,751	28,073	425,138
2000年	2,607,142	43,253	184,776	183,854	1,464,775	84,797	645,687
2001年	2,784,147	58,420	156,067	193,797	1,254,834	125,997	995,032
2002年 1月	206,216	500	5,598	17,276	110,867	10,792	61,183
2002年 2月	71,101	--	8,115	9,186	22,151	464	31,185
2002年 3月	290,773	1,442	35,000	16,150	160,562	8,109	69,510
本年累 計數	586,090	1,942	48,713	42,612	293,580	19,365	161,878

資料來源:經濟部核准對大陸統計表

附錄四 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四個波段

階段	時期	主要投資地區	投資產業	投資規模	代表企業	備註
一	1986-1990年	深圳、汕頭、廈門(珠江三角洲)	製鞋、玩具、食品	小	寶成、頂新	台商型態以自行創業者居多。由於當時兩岸關係緊張，政經環境不穩，基於安全考量，絕大多數中小型企业都是頭家單槍匹馬前往大陸設廠，頭家娘則留在台灣接單或是退居家庭照顧小孩。
二	1991-1995年	廣東、北京、天津	紡織、食品、化工、家電	中	統一、聲寶、遠紡	台商型態以自行創業者居多。由於當時兩岸關係緊張，政經環境不穩，基於安全考量，絕大多數中小型企业都是頭家單槍匹馬前往大陸設廠，頭家娘則留在台灣接單或是退居家庭照顧小孩。
三	1996-2000年	上海、江蘇、浙江(長江三角洲)	機械、IT、石化	大	明碁、華碩、奇美、台塑	以大型集團的投資為主，台商型態以台幹居多。
四	2001年以後	上海、蘇州(長江三角洲)	IC、光電、通訊、軟件傳統產業(第二波)	大	宏力、茂矽、華映、仁寶	以大型集團的投資為主，台商型態以台幹居多。

資料來源: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筆者再加以整理

代號	移往大陸時間	產業別	過去台灣員工數	移至大陸員工數	廠房規模	備註
吳姓	96年	自行車零件及熱處理廠	200人左右	1000多名	以前只有400-500坪，移至大陸則有60幾畝。	移至大陸企業採合資經營，頭家娘則自己經營茶園，家裡有一名廚師、管家、司機及保全。
劉姓	93年	模具加工廠	20多名員工	200多名員工	以前是在用家裡前面空地搭一搭，現在很大，有上萬坪。	家裡請一位廚師、一位管家、司機及保全。
蔡姓	91年	手袋加工及鞋底加工	50-60人左右	兩個廠加起來共1000多名員工	以前工廠只有一百多坪，現在則有8000平方米。	家裡有廚師、管家各一名，專屬司機一名及保全。
羅姓	92年	熱熔膠廠及電子廠	10多名員工	160多名員工	比台灣大好幾倍。	家裡有二位管家、一位司機及三位保全人員。

曾姓	92年	塑膠五金製品	8-9名員工左右	200多名員工	廠房比台灣大	家裡有一位管家、一位司機
黃姓	92年	在台灣原從事電子加工，到大陸轉型做鋼板、鋼構。	基本員工100人，外包200人	500多名員工	廠房上萬坪，比台灣大好幾十倍。	家裡有司機、管家、保全。
張姓	91年	手袋加工產業	20-30名員工	1000多名員工	廠房現在有一萬多坪，比台灣時還大。	家裡有保全、司機、管家及廚師。
林姓	96年	飾品及裝潢	30-40名員工	300-400名員工	比台灣大	有一名司機、一位褓母及一位廚師。
陳姓	97年	燈管線圈	10-20名員工	300-400名員工	比台灣大好幾十倍	司機、管家、廚師各一位，保全好幾個。
楊姓	91年漸將產業移至大陸，95年全部移到大陸	電子玩具等電子加工產業	35名員工	500名左右員工	20000坪左右	有司機、管家、廚師及保全。

附錄六 分偶頭家娘基本資料:

代號	移往大陸時間	產業別	過去台灣員工數	移至大陸員工數	備註
S姓	93年	電器加工產業	20-30人左右	500多名員工	因為婆婆、小孩沒人照顧留在台灣。
Y姓	96年	電器產業	20多名員工	上千名員工	以前負責台灣業務，後來因為產業規模擴大，無法管理，先生建議她好好照顧小孩好。二個到大陸一次
Z姓	95年	成衣業	30名員工	500名員工	因為大陸政局不安所以未隨先生前往。正好小孩上國中，所以留在台灣照料小孩。
K姓	94年	經營燈罩	10多名員工	200多名員工	婆婆認為女人應留在家照顧小孩，所以未先生前往大陸。
L姓	97年	玩具產業	10幾位員工	350名員工	因為小孩還小經常看不到媽媽，隨先生前往大陸兩年後，決定留下來照顧小孩。



東莞市政區圖

東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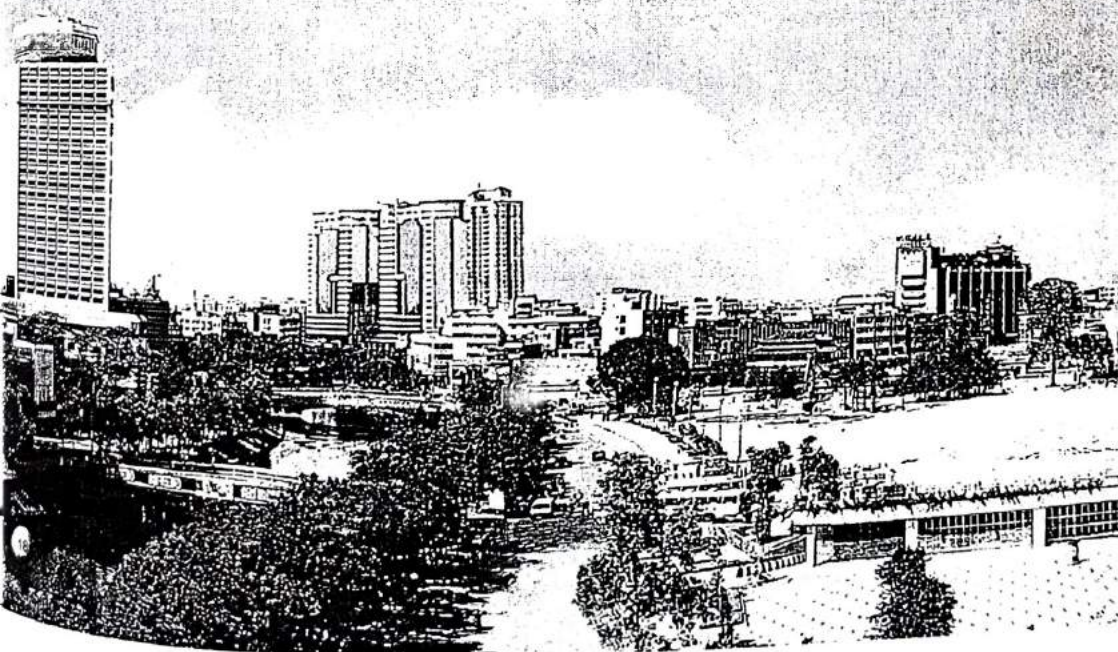
東莞市位於中國廣東省東部的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省的一級市。全市總面積2465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10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150萬，其中市區人口38萬人。東莞市是廣東省的一級市。

東莞市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東部，北距廣州80公里，南距深圳100公里，西距江門147公里，東距澳門48公里，是廣州與香港之間入核交通的動脈之路。

東莞是一個美麗富饒、人杰地靈的地方，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四季如春，氣候宜人，年平均氣溫22℃。依山傍水，平原廣闊，有豐富的土壤資源，森林資源和61公里長的海岸線。

本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東莞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吸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二十年來，東莞的經濟以平均每年20%的增長率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1999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12.8億元人民幣，出口總值達到151.5億美元。

目前，東莞已發展成為一座新興的現代化工業城市，是粵港澳經濟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至1999年底，東莞已與香港、台灣、日本、美國、英國、荷蘭、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



初國家和地區建立互利的經濟技術合作關係。目前，已有3800多個「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在東莞註冊，投資總額達110億元。此外，東莞一批國有企業也與外商合作，在東莞興辦了大型綜合工業區，如：東莞康樂、東莞康樂、東莞康樂、五金康樂等。東莞等企業在現代化工業區、初級工業區和後進工業區的發展性投資基礎。

近年來，東莞實行了穩健的先行發展戰略，先後投資300多萬元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建成了現代化的交通、通信、供電及供水系統，使基礎設施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先地位。

交通方面，全市公路總里程2357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等級公路96公里。廣深珠高速公路在東莞虎門交匯，使東莞成為珠江三角洲的重要交通樞紐。廣深、京九、廣梅汕三條鐵路在東莞常平交匯，並設立了鐵路口岸，使東莞成為中國南方的鐵路交通樞紐之一。虎門港為國家一類口岸，已建成投入使用的碼頭11座。在東莞市區50公里半徑範圍內，南有深圳，北有廣州兩個國際機場。

通信方面：東莞率先建成了全國第一個城鄉數字程控電話網，IDD電話裝機容量達到53萬門，建成了移動電話、無

線電話、數字傳真、用戶電報以及新興的互聯網等一大批現代化通信系統。1999年東莞郵電業務總量達7億元人民幣，位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

能源方面，東莞已建成了以火電網為主，水電、天然氣的能源供應網絡，並有11萬伏以上電壓的50萬、1999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供水方面，東莞目前有水廠300座，自來水普及率98%，工業生產、人民生活用水供應充足。

東莞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統籌全市的引進外資工作，承接有關開辦「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的手續，審批、審批、審批手續，還設立了外商諮詢服務中心，為外商來東莞投資辦廠提供諮詢服務和代辦各種開辦手續。在全市四個區和二十九個鎮及部分管理區設立了外經辦，協助辦理外國投資企業的日常具體事務，為方便外商出入境和貨物進出口，國家在東莞設立了東莞海關、太平海關、常平海關，以及鳳崗辦事處，實行集中報關，手續簡便。此外，商檢、衛檢、動植物檢等口岸設置機構一應俱全。中國銀行也在東莞設立分行和多個辦事處，使外商的投資，結匯快捷妥當。

今日之東莞正以快速、穩健的步伐邁向燦爛的新世紀！

